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新周刊》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作者:新周刊

ISBN:978750868095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一切都变了，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是从那里来的。

——张颐武



1992年8月22日，万宝路戴拿斯杯足球锦标赛，中国队与朝鲜队交锋中，9号高洪波踢进关键的第二个球后，主教练施拉普纳向他表示祝贺。（图/兰红光/新华社）



1990年，北京，地坛公园。（图/王文波/CFP）



1997年7月1日零时，深圳罗湖口岸，粤港两地警方和官兵共聚罗湖桥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图/安哥/FOTOE)



1991年，广州，第四届全国书市里读书的人群。（图/刘志纯/FOTOE1）



1993年，北京，罗丹的《思想者》雕塑运抵中国美术馆。（图/ 王文澜/FOTOE）



1992年，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正在创作的画家杨少斌。（图/李江树/FOTOE）



1991年，天津商家运用古老的吆喝手段促销，音响震耳欲聋，受不了的路人纷纷用手捂住耳朵。（图/ 安哥/ FOTOE）



1995年，广州海珠中路枣子巷，在这个连厨房在内只有8平方米的简陋房间里，住着8位外省来粤打工的环卫工人。（图/安哥/FOTOE）



1993年12月，香港“美容教母”郑明明在上海华联商厦推介化妆品，围观群众看得瞠目结舌。（图/于文国/CFP）

序一
一个被低估的年代

张颐武

这些年来，怀念八十年代（编者注：本书中出现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均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似乎是一个流行的风潮，一直有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人们往往觉得今天是一个并不浪漫和富于诗意的时代，但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力量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状况，其实是八十年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近四十年的光阴仿佛一晃而过，我们还没有抓住八十年代，现在已经是“90后”和“00后”的天下。

而在今天的“新世纪”和我们所缅怀的八十年代之间，有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关键的转折年代，也是我们回顾这四十年历史时需要时时关切的重要时期——九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期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被我们所感受到了。但人们似乎很不情愿提到这个时期，它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不少人觉得那个时期不太合乎他们的理想，仿佛这是八十年代向下坠落的时期，是激情和热情消退、平庸到来的时期。其实，这个时代的意义被低估了。这种低估，其实来自我们对于今天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这渴望导致了我们不愿意提及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其实是一个转变期，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九十年代在文化上的转变，我们才可

以进入一个新世纪，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才会有今天的成果。今天看来，九十年代正是四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过渡期，有了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九十年代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新周刊》就出现在那个时代，现在，这家杂志愿意出一本书，从当下对那个时代提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见证，这无疑具有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遥想当年，八十年代末的巨变刚刚过去，“南巡”所激荡的风潮和新的期望刚刚被诱发，下海经商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刚刚开始创业。今天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如马云、马化腾，都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未来；而王健林等人也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还珠格格》，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的记忆所在。当年《渴望》主题曲在大江南北流传，今天我们从其歌词中仍能感受到那种社会的集体意识：“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这是一个真正开启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的新时代。那些宏大的叙事远了，新的生活的欲望和情绪开始出现。这是新的以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它显然提供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景观，也超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它的形态是我们必须认知的关键。无论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电视剧，还是王朔的作品以及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小说，都提供了变化的轨迹。

那是知识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呼叫的时刻；那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那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

方向有了更多信心、更明智的分析的时刻。知识分子的大论战，正凸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思考和观察。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所谓“后新时期”，消费社会刚刚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关于中国发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所谓“后现代”“全球化”或“中产群体”早就是老生常谈，当年却受到了众多置疑和追问。这些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变化完全超越了“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竟然是“逆全球化”浪潮在发挥作用。

要认识九十年代，我们首先需要从八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件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需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召唤，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

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

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页）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是新的“现代性”展开的前提。八十年代具体地展现了这一“主体性”话语。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成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梦想。

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

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九十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避免急剧变化过程的社会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的雪崩式瓦解，以及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

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所谓“公共空间”也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下，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国际投资

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全球化之中无疑不再是一个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国家的象征，以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

九十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物质性”的出现。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八十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八十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的诱惑，但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撑了我们的想象和追问。所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虽然有极大的物质性吸引的背景，却在精神层面上展开，它依然是不及物的。这里的追求几乎忽略了“物质”的诱惑和吸引。但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却将八十年代的抽象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导演张暖忻点出了最初的消费诱惑的力量，也点出了当年抽象的“主体性”在现实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困局。这是将康德的玄虚的用头脑站立的状态，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

其实，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断裂中自有其连续性。九十年代将八十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八十年代的“主体”是以抽象的精神进入世界的，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真诚而单纯的愿望，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展开。其没有物质支撑的空洞性，正需要九十年代的填充。而九十年代的这些中国的“个人”，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加入世界，用自己的劳动和低廉的收入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世界。所以，正是九十年代给了抽象的八十年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八十年代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九十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具体化。八十年代康德的自由的“主体”，变成了九十年代黑格尔式“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

这些个人的成长和变化，其实是今天社会凝聚和发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开启了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全球的变化。全球化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必然带来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中国内部和外部所展开的“物质性”力量本身，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是中国最坚实的基础。九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终结了八十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并找到“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其实是历史的新一页。它一方面告别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它也超越了“五四”以来反抗西方的宏大叙事，而是在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中探寻新方向。今日中国丰富而复杂的形态，正是那个时代的结果。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或者所感叹的一切，其实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影子。今天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和力量，正是九十年代的开放所奠定的。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成了今天的主人翁。一切都变了，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是从那里来的。我想，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仍然活着，它仍然在我们之中发挥影响。

让我们从这部书回到九十年代，在回忆中领略那过去。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可以从这部书回到那个时代，那依然活在我们之中的时代。

是为序。

序二
我的九十年代，我们的九十年代

蒋方舟

联结一个世代的人的暗号，永远是他们共享的记忆。

对于美国婴儿潮一代来说，主导他们青年时期的社会想象，围绕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展开：从二战后的丰裕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越战到反文化与民权运动。不管政治和文化立场如何，同一代人总是在同一个记忆场域中成长并活动，这种共同记忆，展现出每个时代独特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的社会想象起源于九十年代。这并不是说中国庞大而沉重的过去没有发挥其无微不至的影响力，只不过，看惯进步、富裕和繁荣的国人所感知到的那个中国，只有相当年轻、浅近的历史。从打击“投机倒把”的中国到全民炒股的中国，从凭票供应的中国到电商疯狂打折的中国，并没有相隔一个世纪。对于已经是社会主心骨的60、70后来说，前一个中国是渐行渐远的遗迹；对我这样的85年后生人，后一个中国是我们出生、成长的理所当然。

在我们还蹲守电视机旁的年纪，《太空堡垒》和《新世纪福音战士》是所有孩子的共同话题。没有人质疑国家在一天天好起来。生活的改善不只在《新闻联播》里，也在每一年的生活里。这片土地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来就和动荡与不安无缘。我们懵懂地听到“亚洲金融危机”或者1998大洪水之类的名词，但举国一致的努力总是可以渡过难

关。1997年香港回归是许多人爱国自豪的最初记忆，我们的九十年代结束于中华世纪坛迎接新千年的焰火，以及2001年申奥成功。

九十年代对于我们更多的是模糊和混沌，一如所有人回望童年仿佛都隔着层磨砂玻璃。但对我们来说，更加光明、清晰的二十一世纪和之前模糊的十年并没有明显的断裂：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只是从不够好变得更加好。

在当时的我们无法感知到的幕后，九十年代是个更加粗犷、却从来不缺生气的时代。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它真正的开端。一切似乎都不允许了，但一切似乎都被允许了。冯仑和潘石屹开始炒房，瀛海威时空开通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王国，大学开始扩招，而毕业生开始自谋生路。世纪末的“野蛮生长”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被规范和整顿，为了满足“入世”标准并且为经济全面转轨做好准备，整个国家开始了一场痛苦的转型。许多家庭的生活从此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而后半部分并不都是美好。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努力拥抱市场经济和“国际化”，仿佛急切地要从上个十年突然结束的混乱与彷徨中找出道路和意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对八十年代的回答，也是对八十年代的判词。经世致用的最高律令下，法律、经管成了最新的时髦专业，生物学则是二十一世纪的学科。曾经统一在人文和启蒙大旗下的文化队伍愈发分化，一并坍塌的还有曾经坚不可摧的文化战线中的等级制，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不再是文化人单一的价值与认同的来源。

市场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但也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是文化和产业第一次并列的时代，也是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入“文坛”的特殊节点——到了文化产业真正繁荣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坛”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当年。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九十年代的主题无疑是“变化”。但变化——有时是激烈的变化——从来没有离开当代中国历史的字典。九十年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当代中国最为强大和持久的主题——“稳定、改革、开放、发展”——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九十年代的“变”，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如今“不变”的基础，为变革应该有的方向和模式设定了标准。也正是因为如今的繁荣无非建立在九十年代所开创的基础上，这段记忆才能够作为社会各个世代的社会想象，服务于当今中国的话语系统。

我们今天回忆九十年代，不是把它当作连接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插头，而是在怀念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某个黄金时代的起源。



1992年，深圳，深南大道上的邓小平巨幅画像。（图/ Ian Berry/Magnum)

“八十年代有很多人认领，九十年代好像变成了无人认领的年代。无人认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九十年代远未终结。”

——李敬泽

“我非常怀念九十年代，那个年代大家也都忙着赚钱，但毕竟没后来那么疯狂。九十年代对于情景喜剧和我个人而言，都是最好的年代。”

——英达

“九十年代是我们这一代电视人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纪录片、新闻、专题节目，非常繁荣。那个时候的电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介入，非常深厚。”

——刘春

“在九十年代，随便去请教一个企业家，他都会告诉你，如果企业要做大，必须要诚信。那个时代，诚信是排第一的。”

——胡润

“九十年代初的海南就是个大课堂，告诉你什么是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

——张宝全

今天的一切，
都可以在九十年代找到源头

文丨**肖锋**

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的遗书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尽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今天被传诵至泛滥，他的死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假如说火红的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娱乐的新世纪是消费主义的，那么中间的九十年代应该填个什么词呢？“讲求实际”的九十年代，它是这个小时代的预演，从关注世界与国运到关注个人境遇，与宏大叙事渐行渐远。

今天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在八十年代都被展现过了，无论多么短暂。九十年代全面转向功利化、世俗化，用1997年因心脏病突发在45岁辞世的作家王小波的话讲，就是“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2016年7月，南海、东亚局势紧张，在河北，某些人围堵肯德基店。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学生高喊：“中国人不吃美国饭，出来！出来！”但他们第二天就到美国领事馆门口去排队办签证了。这次的标语是“你吃的是美国肯德基，丢的是老祖宗的脸”。何其相似。这一次，我们的大学生还会到美国领事馆去排队吗？

1996年8月18日，《新周刊》第零期创刊号出街，封面人物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封面专题是“中国可以说不”，矛头直指美国。

中国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改革”，九十年代的关键词是“国际化”，新世纪的关键词是“互联网”。

1990年第一家麦当劳开进深圳，1999年第一家星巴克开进北京。1999年年底，中国与美国等国达成“入世协议”。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口号已被“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取代。九十年代，与国际接轨、国际惯例成为官员口头禅。竞争成为当今社会最漂亮的词，机场书店都在讲成功学。

然后，像世界各地后发展国家一样，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倾向，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只是中国人比其他后发展国家的人民更讲求实际，对全球化欲拒还迎，短短十年间就完成了心理调适期。

画家王广义的政治波普系列《大批判》最有象征意味，那些以“文革”形式批判跨国品牌的宣传画，最终被那些跨国公司高价收买，其中批判名表斯沃琪的作品还被做成表蒙子，斯沃琪和王广义都赚个盆满钵满。

九十年代最后几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跨国公司的全面进入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此，中国才正式进入“环球同此冷暖”的境地。

《新周刊》是传媒中的冲突论者，从第零期“中国可以说不”，到“阻击霸权”“红客游戏”，再到“你怎么看美国”，无不挥洒着民族主

义的荷尔蒙。而杂志后期转入理性探讨，如“中国缺什么”“规则的快乐”“还有多少中国味儿”“软中国”和“让全球化抱抱”。

《新周刊》全球观的嬗变，反映了这个国家主动开放后，对全球化的欲拒还迎、理智与情感交错的矛盾心态。欲拒还迎、欲迎还拒，理智终究战胜情感。

就现实层面而言，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初期提倡的现代化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朝向就是西方标准。西方是标准和技术的源发国和输出国，它们手中握有制定全球化规则的权力。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迎接的过程。

跨国公司是新时期的“船坚炮利”，凭国际资本和品牌效应攻城略地，将一众民族品牌，如“美加净”“乐百氏”“活力28”等，或排挤出局，或收入囊中。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只是个短暂的摩擦，其重要性抵不上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民族情绪虽被炸馆事件引发而短期高涨，但随即被波音大订单、互访与握手冲淡。中国改革开放一直以美为师，到“中美国”相爱相杀，美国成为中国全球化绕不开的“冤家”。

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相传在革命者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之间有一段对话：有段时间，切·格瓦拉每天都要向卡斯特罗递上一杯冒着泡沫的、咖啡色的饮料。最后，卡斯特罗终于摇着他的头。“切，这不好，”他说，“如果哪一天我们被可口可乐的配方打倒了，那么革命就失败了。”

整个九十年代都在完成这类心理调适，为中国拥抱世界、最终站在世界中央作准备。之后的加入WTO让中国成为全球化近十几年来最大的受益者。

对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种脚踏实地；对于新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飞跃前的助跑。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但上海不是深圳，提不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类口号。上海人精于服务，敏于勾兑，将外来土豪和跨国公司等伺候得熨熨帖帖、妥妥当当。上海才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首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宣告中国改革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切又是与南方相关，确切地说不是上海而是深圳，那个被划圈的小渔村。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一锤定音，终止了改革是进还是退的争论。

每次大的改革，落到实处，都会关乎某个特殊群体的利益，先是农民，然后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这次是体制内下海者，即“92派”——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谈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陈峰、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92派”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

1992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原常务副区长武克刚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

1984年年初，邓小平第一次南下特区视察，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创业者应运而生，如今仍活跃在商界的代表人物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他们被称为“84派”。1984年因此被称为“企业家元年”。本次“92派”更懂得利用体制与市场之关系，利用政策之便为自己闯出一番天地。相对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而催生的“15派”，“92派”作为父辈一代则更显沉重、更具使命感。换句话说，“15派”只想改变自己，80后、90后自由追逐梦想，而“84派”“92派”则更多家国情怀，改变社会，改变国家，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以为的。而“15派”顶多认为改变自己顺便改变国家。

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国有企业尾大不掉，改变极其艰难。不少试水者甚至身陷牢狱。1998年，中国企业界最大的争议是一个叫褚时健的企业家该不该被判处死刑。

褚时健将西南边陲一间默默无闻的小烟厂，做到业界老大，到九十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造利税达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褚时健任职的17年间，红塔集团总计纳税800亿元。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该企业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1996年年底，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匿名举报，对褚时健展开调查。一手缔造了“红塔现象”的褚时健锒铛入狱。褚时健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他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见国企改革的一系列困境，这一困境仍困扰至今。

2000年后，褚时健因身体有病被保外就医，与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两千亩山地种植甜橙。之后，褚橙的故事令中国企业家以与老人合影为荣。

国运关乎企业命运、个体沉浮。九十年代，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完成入世谈判，北京办成了亚运会，神舟飞船飞天，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民生——房改、医改、下岗和下海将人们一把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民间编排国企下岗潮：“七十年代下放，八十年代下海，九十年代下岗。”由于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劲上升期，那轮下岗潮对社会整体冲击不大，很快就被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机会消化掉了。而2016年则遭遇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困难要远大于九十年代。

房改开启了中国房价二十年上涨之路，并且没有终止的意思。被房价击破了一代人梦想的80后抱怨说，至少60后、70后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商品房房价也还不算高，so，请别跟我谈什么伟大理想。

医改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以药养医的方针将医护人员与患者推到矛盾的焦点上，医患关系紧张至今。难道九十年代医改市场化的路子走错了吗?

九十年代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年代，伴随打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浦东）”，这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黄金时代。

1991年一部电视剧《外来妹》热播荧屏，一代打工妹支撑起“中国制造”的半壁江山。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带走一丝城市福利。他们的子女农二代、三代就没有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品性了，于是，人工成本上升，工厂招工难，九十年代的“中国制造”模式难以为继。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

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刷新了年轻一代的娱乐方式。年轻人避重就轻，远离政治话语、宏大叙事。

对，经济第一，政治第二，尤其是个人经济上的成功。

我是1992年到的广州。彼时满大街放着《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等伪伤感的流行歌曲。没有了摇滚的激烈，也没那么惆怅，大家都忙着挣钱呢。

我初步落脚在海印桥下的一间广告公司，那里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猛吸一口，喔，一个时代开始了。

普通百姓只想着怎么发财。至于怎么迎接新时代，让文人骚客自行去伤感吧。

九十年代，新的阶层分化正在演进，有人不适。中国是个“忽然”阶层化的社会，30年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或阶层标签可能几经变换，要形成西方成熟阶层社会的所谓“阶层共识”和“利益代言人”是困难的。这便是中国的“阶层之谜”。

中国阶层的演进仿佛一幅快进的清明上河图，西方三百年历程，中国短短几十年就完成，许多人肯定有不适感甚至幻灭感。肇始于八十年代的社会结构剧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分化运动。这场分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一个家庭在分化，一个班级在裂变，社会各群体间拉开了距离。人们终于明白“只有身份不同，没有财富积累”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人们还明白了，曾经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运动，对于不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路程，这个过程是压缩的、仓促的、冲突的，也是迷人的。

九十年代，以《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时尚》等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传媒开始引领和培养“新中产”的生活品位。“新中产”，与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老中产区别开来，他们在住宅、衣着、谈吐等方面也与新兴工商阶层的“暴发户”不可同日而语。大家纷纷愿意“跟土豪交朋友”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虽然文化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向上奔”和“穷忙族”才是新中产的两个基本特征。

美国专栏作家保罗·穆尼（Paul Mooney）赞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职员、CEO（首席执行官）、学者、科学家，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

这种全民进取心使整个国家步入一个上行社会。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即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中高层职业人员30年来呈持续增长趋势，形成“向上流动的潮流”。

从1999年开始，英国年轻会计师胡润开始编制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中国正颠覆西方“三代造就贵族”的阶层更替节奏，像潘石屹这样的新富阶层一代之中就换了三次身份——从农民到知识分子、经理人、富豪。

新世纪初，社会学家邓伟志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61%的上海人“愿意和比自己阶层高的人打交道”。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上行的”社会结构中，势利是其必然的产物。所以，你只能铆足了劲儿向上奔，如果你还想出人头地、占个好位置的话。当前“与土豪交朋友”、喊王思聪为“老公”，源头都在九十年代，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延续至

今。人们选择默然接受这个现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是成功主义导向的，意识形态被放在了一边。

九十年代，新世代还未上位，90后刚刚出生，80后还在成长，而他们的父母正在阶层之路上打拼。

1996年春，北京一个名叫“瀛海威”的公司在中关村竖起了一个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句广告语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到来了：点击、娱乐、漂移、全球一体。而你的位置在哪里？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上演大型团体操《相聚在北京》。(图/何惠飞/新华社）

九十年代
断代史

九十年代是城市化的十年，也是全球化的开端。

九十年代我们结束了配给制，尝到了经济转型的苦与乐。

九十年代我们告别理想主义，走进了现实主义的新世界。

九十年代我们接入了互联网，对世界说Hello world。

九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终章，也是另一个时代的伏笔。

1990 开启炒股狂潮，洋货狂袭中国

文｜**朱人奉**

1990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一。

秒针跨过1989年的最后一秒，民众点燃了新年的烟花，跳上柏林墙尽情欢呼，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

这时的北京已是早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今年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

过去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八位。未来十年，中国要进一步开放经济。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鹏总理说，改革开放要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沿着这条“健康的轨道”，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风水轮流转，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心从珠三角转到了长三角。

7月，《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总结了1990年上半年中国的施政方针，认为“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它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

10月8日，麦当劳在深圳开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分店。肯德基早在三年前就在北京开了三家分店，从来没有吃过洋快餐的中国人挤爆了这家连锁店。

当时最时尚的事，还是穿皮尔·卡丹的时装。自1979年第一次来华举办时装秀，皮尔·卡丹成了奢侈的象征。北京专卖店里，一件衣服卖到1500元，几乎是当时城镇居民家庭两年的收入。1990年9月，皮尔·

卡丹经过特许，把时装秀开进了紫禁城。香港《文汇报》连续两日以《洋货狂袭中国》为题撰写评论。

这一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风靡全国，雀巢咖啡的广告语诱惑了全国人民。从前清一色“蓝黑白”的国人，开始穿上牛仔裤、西装套裙、羊绒衫、T恤，洋字号的领带和皮鞋闪耀各大百货商店。

洋轿车遍地跑，五十铃横冲直撞，永久牌自行车眼看销量就不行了。从白色家电到打火机，都是舶来品独领风骚。中国孩子的玩具迅速跟上国际潮流，“任天堂”和“小霸王”的游戏机成了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1990年，深圳证交所和上海证交所陆续开始营业，显示了中国向资本开放的决心。一开市就出现炒股狂潮，深圳一度出现“万人空巷”、连机关干部都翘班跑去炒股的境况。

1990年中国十大事件

- 1月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 2月5日，国务院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
- 4月4日，人大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4月7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商用人造卫星。
- 4月23—2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苏联。
- 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 10月2日，广州白云机场发生空难。
- 10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间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幕。
- 11月10日，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征购。

-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1 人口降下来，经济搞上去

文｜**朱人奉**

“二十世纪的最后10年，有些教训显然已经被汲取。”这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为二十世纪写的总结陈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最大的特点便是“计划”，九十年代却是一个去“计划”的现代化过程。

1991年，中国告别计划经济，只有一项国策仍以“计划”为名——计划生育。民间有人质疑：现在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生育是否也应该由市场来调节呢？这个建议很快被否定了，中央政府取得的共识是：人口降不下来，现代化也难以实现。从1991年到1998年，国家主席每年都会在两会期间亲自主持计划生育座谈会。

地方上更没有松懈，现在农村残存的计划生育标语，大部分是1991年之后刷上去的。然而，再猛烈的计生标语，也拦不住“超生游击队”。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何伟）1996年到涪陵支教，发现农村超生以及重男轻女的情况非常普遍：前面一连串女孩，直到生了男孩才踩住刹车；不少人为了要个男孩，还得顶着巨额罚款的压力。

弃婴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大部分是女婴和残疾婴儿。199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于1993年出台细则，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2014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从九十年代开始，超过12万名中国孩子被西方家庭收养。

人口政策越抓越严，私有经济却狂飙突进。1991年，广东实现了21%的经济增长率。乡镇企业成了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中国也变成民营企业家的天堂。据学者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记载，乘

坐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奥迪汽车的当地党委书记，对自己新角色的认识变成："这儿的人都说，经济上去了，你就是好领导，要不然就不是。"

人人想赚钱，人人有钱赚。个体户经过八十年代的发展，完成了资本积累，开始创办企业，投身股市。温州90%的经济实现了私有化，并在1993年被《纽约时报》称为"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城市。

1991年，国内有一场大讨论：私有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中国到底姓"资"还是姓"社"？次年，邓小平不得不用一场南方谈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1991年中国十大事件

- 1—2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指示要大力开发浦东。
- 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
- 4月15日，"希望工程"开始实施。
- 5月16日，江泽民访苏，中苏双方就中苏边界东段划界问题签署了协定。
- 5—6月，华东水灾。
- 7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
- 10月12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通航。
- 11月，首届女足世界杯在广东举行，美国队夺冠。
- 11月27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工程国家竣工验收会议在宜昌召开。

- 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2 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文｜**罗四鸰**

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起便争论不休。1992年，邓小平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清晰的答案：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原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

从1月18日起，88岁的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广州、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视察，并发表一系列讲话，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确立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即以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10月，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路线”被写进党章。自此，邓小平理论成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

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三天，中国发行了第一只人民币特种股票（B种股票），于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相比，这个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脚步、专门为国外投资者建立的B股市场，已不再有姓“资”姓“社”的政治风险。股票，这个姓“资”的东西已经让全民为之疯狂。这一年，潘虹主演的电影《股疯》反映的正是中国人最初接触股票时的疯狂。

热播电视剧《外来妹》则首次将打工者的生活带入中国人的视野。在解决好姓“资”姓“社”问题之后，中国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开始兴起，涌进城市的农民工以每年约2000万人的速度增加。这一从未有过的人口流动潮流大大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1%提升至2000年的36.22%。

然而，户籍制度的存在让这个数据含有大量水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为经济创造巨大“人口红利”的同时，却因户籍制度被排斥在城市之外。他们无法在城市买房，他们的孩子无法在城市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甚至无法在城市长期居留。农民工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之后的中国越来越明显。

1992年中国十大事件

-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
- 3月8日，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
- 4月3日，人大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 4月5日，实行了6年的夏时制暂停。
- 5月22日，上交所股价全面公开。
- 6月1日，一元、五角、一角金属人民币发行。
- 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 6月28日，深圳悬挂邓小平画像，以宣传改革开放。
- 8月10日，深圳发生股灾，史称“8·10”事件。
- 12月21日，我国发射第二颗澳星，卫星升空后爆炸，原因不明。

1993 “马家军”震惊世界

文｜**萧铁**

1993年的春晚，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与中央电视台首次实现节目对传，打破了以往晚会现场的封闭格局。5月1日，央视开启杂志型新闻节目《东方时空》，改变了大陆观众早间不看电视节目的习惯。国家电视台开始松动正襟危坐的话语修辞，通过通俗的话语表达，改变了电视的新闻语态，被誉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先河。

当年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讲述着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梦。多年后，那一代人回忆起那部电视剧时，这么写道：有一种情怀，叫美国梦；有一种生活，叫在别处；有一种灵魂，叫在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回不去的故乡。

由于前一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再掀热潮。下海经商的那部分人就像《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个冒险家的时代呼之欲出，有时谚嘲讽那个年代的巨富是“喝着蓝带，开着现代，搂着下一代”。

那一年，中国第一次表明自己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官方对市场经济不再羞答答，全民经商的潮流开始席卷大江南北，量入为出的观念开始松动，借贷生活成为潮流：“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由于投资热的兴起，物价不断上涨，部分市县呼吁重返粮票时代。

最令国人兴奋的是贯彻全年的体育盛事。“马家军”横空出世，连破女子中长跑世界纪录，成就了一代神话。马家军发言人将这一奇迹

归结为“喝龟血”，“世界纪录想怎么破，就怎么破”。直到2015年，赵瑜在长达3万字的《药魔重创马家军》章节中，把1998年发表时被删掉的内容补充进去，才揭露了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便给队员服用或注射兴奋剂的事实。

也是在1993年，Beyond乐队的黄家驹从舞台上摔下来，成为后人年年悼念的对象。

1993年中国十大事件

- 1月8日，广州赛马场开幕。
- 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公布，提出要在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 3月27日，江泽民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 5月9日，上海举行第一届东亚运动会。
- 6月26日，中国首次在国内发行外币债券。
- 8月21日，王军霞夺得世界田径锦标赛一万米金牌。
- 9月4日，北京举行第七届全运会。
- 9月24日，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失败。
- 10月28日，“马家军”所破世界纪录全部被国际田联批准。
- 12月20日，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4 看美国大片，听流行音乐

文 | **冯柒**

1994年7月14日，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在香港上映，所有年轻人说话都学着片中阿武的文艺腔调。同一个夏天，与王家卫合办泽东公司的刘镇伟，到达宁夏外景拍摄基地开拍《大话西游》。

1994年是神奇的一年。外国大片开始正式引进中国院线，这一年产出的电影经典之多，即使是奥斯卡金像奖遗珠也倍有荣光：《阿甘正传》《低俗小说》《肖申克的救赎》《燃情岁月》《狮子王》……那一年，买不起电影票，还能去录像厅窝着，津津有味地把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看。

八十年代中国摇滚热到达巅峰，随即陷入沉寂。直到1994年崔健推出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摇滚新人指南针乐队、王磊、郑钧、唐朝乐队等陆续登场。12月17日，窦唯、张楚、何勇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参加“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把中国摇滚推向不可思议的高潮。盛势的顶点却是颓态的端倪，酒吧业的繁荣让摇滚从边缘走向主流，从此之后，中国摇滚只剩虚火。

商业大潮汹涌澎湃，熄灭了摇滚的理想和乌托邦，却带来中国本土流行音乐的时代狂欢。1994年，港台歌手退烧，中国“流行音乐圈”正式诞生，造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广州率先成为流行音乐重镇，八家音像制作公司先后打造了杨钰莹、毛宁、林依轮、李春波、陈明、甘萍、高林生、李进等名震一时

的歌手。北京、上海不甘寂寞，那英、刘欢、王菲等巨星都在此时崛起，年底，孙悦为全国老百姓祭出了朴素的年度金曲《祝你平安》。

民谣的日子过得更滋润。这年6月，央视组织了一场大学生毕业晚会，老狼怀抱一把木吉他，坐在高台上安静地唱着《同桌的你》。此前三个月，大地音乐推出了《校园民谣1》，专辑青春的爱与愁唱得满校园的男男女女泪眼婆娑，霸占草坪撩妹金曲排行榜长达数年之久。

1994年中国十大事件

- 1月1日，中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
- 2月8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 3月31日，千岛湖事件引起轰动。
- 4月，《校园民谣1》专辑发行。
- 4月20日，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
- 5月15日，中国科学院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
- 5月，“魔岩文化”正式推出张楚、窦唯和何勇三位歌手的专辑。
- 8月19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
- 9月3日，俄国与中国同意不再以核武器互相瞄准对方。
- 12月14日，三峡工程开工。

1995 手持大哥大去逛街

文 | **冯柒**

“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全市有十几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今天我休息’，一大早照常赶到单位。”《青岛日报》1995年5月7日的“双休日”报道中写道。

突如其来的假期，初始的不适应实属正常，兴奋的还是大多数。青岛一位公务员回忆当时的情景：“1995年5月，当传言中的双休日成为现实时，我身边的人都处在一种亢奋的情绪中。男职工开始相约一起喝酒、打牌，女同事则约着一起逛街购物。”

中国的现代都市生活风貌初现，“你买领带，我购首饰”成为商业时代的城市符码。移动通信缩短人际距离，BP机是当时最流行的灵巧装备；而“高富帅”的时尚标配，则是入网费6000元、预存话费1000元、电话本身2万元的“大哥大”。

1995年，大街上闲逛的女人们互相对视，谁先穿上踩脚裤或松糕鞋，谁就是fashion icon（时尚偶像）。她们的时髦主张，一般来自电视上的明星着装。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国已有彩电企业98家，国产品牌彩电年产量达到3000万台，普及率相当高。

茶余饭后，人人追看电视剧。《白发魔女传》《刑事侦缉档案》《刀马旦》等港剧陆续热播。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引进中国，每个女孩都争相模仿赤名莉香，“莉香style（风格）”的针织衫、围巾、oversize（超大廓形）外套是当年最热时尚单品。

对美的索求，单有电视还不够。如果说《ELLE世界时装之苑》和《时尚》的先后创立还是中国时尚杂志发展的萌芽和摸索，到1995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和日本主妇之友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瑞丽》杂志，则在实用、时尚、大众化上更符合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

在时尚杂志的推波助澜下，“小资”“白领”“生活方式”等词语成为时代显学，优雅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从此，中产阶级趣味涌现。

1995年中国十大事件

- 1月30日，江泽民提出对台八项主张。
- 2月26日，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避免了贸易战。
- 3月18日，人大通过《教育法》《中国人民银行法》。
- 5月1日，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 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 6月6日—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 7月21日，台海导弹危机爆发。
- 9月3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 11月10日，国家反贪总局正式挂牌成立。
- 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涉外税制的三项重要改革。

1996 铁路大提速的前夜

文｜**朱人奉**

1996年8月底，何伟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到涪陵支教。在重庆开往涪陵的慢船上，这个局外人对目的地一无所知。但他敏感地察觉“全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譬如涪陵城的一部分将会因为三峡工程而被淹没。

这列名为“中国”的列车越开越快。1997年和1998年完成两次大提速之前，多条线路在1996年进行了提速实验。低速、低效的中国铁路，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庞大的打工潮。

1996年1月，人事部向全国印发《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正式终结，大学生从此自谋出路，这对当年的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在梁晓声的小说《表弟》里，八十年代末期大学毕业生“表弟”找工作未果而上吊自杀——作家把人物的死看作“一种宿命性质的错误”。

分配制度结束了，“宿命”仍在继续。在铁路大提速的前夜，长途列车缓慢地行驶在剧烈变动的土地上，每一列都挤满了打工者。1994年第11期的《铁道运输与经济》杂志发表了调查报告《“兰新线怪病”现象的特点、原因及解决途径》，详尽记录了那几年在列车上频发的“旅行性精神病”。

该报告披露，当时在客流高峰期，定量118人的车厢挤下了410人，连一个小小的厕所都挤了11个人。叠罗汉一般的拥挤，造成车厢内严重缺氧，轻则体力不支，重则精神崩溃。1992年，兰新线全段共

有77名旅客因“旅行性精神障碍”跳车，多数是在厕所或边门窗户纵身跳下。更有人情绪崩溃、发疯行凶，导致31名乘客和21名乘务人员被刺伤，1人致死。

外出打工之路是一条畏途，可中国人只能拼命挤上这辆严重超载的列车，未来的希望遮蔽了困难的现状：贫穷了几十年，这几天火车的辛劳算得了什么？

何伟发现，所有人都在谈钱。在乡民和学生之间，流传着很多打工致富的传说，吸引了上亿内地人离乡别井。人们相信，在南方的广州和深圳，他们不用靠关系，甚至不用读书，脑子灵活再加点运气，来年便可以开着奥迪回家。现实是一地心碎的声音：大多数人踏上打工之路，把青春都耗在了车间里。

他们成为人们口中的“农民工”，建成了规模庞大的“世界工厂”。

1996年中国十大事件

- 1月1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开播。
- 2月4日，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开幕。
- 3月8日，中国在台湾沿海进行导弹演习。
- 4月8日—1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会议。
- 4月24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俄联合声明》。
- 7月13日—14日，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7月29日，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中国政府宣布从次日起暂停核试验。

● 8月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组建工作拉开序幕。

● 9月1日，京九铁路通车，它是当时仅次于三峡工程的第二大国家工程。

● 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达到世界第一位。

1997 小平逝世，香港回归

文｜**萧轶**

这是有史以来出伏最早的一年，北京遭遇百年未遇的亢旱。尚处在春节的喜庆中，三年未曾公开亮相的邓小平，在301医院安静离世。“姓资姓社”争论随即卷土重来。三个月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些话语最终成为“十五大”的主旋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1997年最重要的事情当数香港回归。6月30日23时42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英国国旗和香港旗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0时整，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中国政府对香港开始行使主权。

在内地，整个社会陷入了欢天喜地的庆祝狂潮，连幼儿园和小学学生都在校园中接受香港回归的思政教育，纷纷别上了香港回归纪念徽章。金庸后来说：“7月1日起床，发现香港什么都没有变化，当时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回归后的第二天，亚洲金融风暴开始，香港社会情绪陷入不安，预告了香港回归后的情绪基调和影视文学的叙述情结。

1997年，长江三峡大江截流成功，成为当年的第三大事件。这项包含着百万移民、扶贫开发、社会重组、建设三峡新型经济带等系列世界性课题的社会工程，日后将对整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影响。

这一年的开头，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民营互联网服务和内容提供商——瀛海威全国大网开通了。这一年的结尾，《泰坦尼克号》横扫全球，风靡中国。

王小波，用诙谐的智性诠释自由精神的作家，在1997年走完了短暂的人生。

1997年中国十大事件

- 2月19日，邓小平病逝，享年93岁。
- 3月14日，《国防法》审议通过。
- 4月29日，京广铁路荣家湾站列车相撞，造成126人死亡，230人受伤。
- 5月8日，南航3456号班机发生空难，导致33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死亡。
- 6月18日，重庆划归直辖市。
- 6月27日，北京东方化工厂爆炸，9人死亡，3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亿元，全部损失达10亿元。
- 7月1日，香港回归。
- 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正式施行。
- 10月2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 11月8日，三峡大坝截流成功。

1998 长江抗洪，工人下岗

文 | **萧铁**

这年夏天，长江及淮河遭遇了特大洪灾，截至8月22日，造成300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元。新官上任的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怒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然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在朱镕基的铁腕下，1998年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始于九十年代的中国下岗潮，在1998年达到高峰，这一年被称为"大下岗时代"，国企工人阶层愁肠百结。

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各地政府开始疯狂卖地，国民借贷购房，并将购房作为投资项目。日后，"房奴"成为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身份，北京五道口因不可思议的房价被称为"宇宙中心"。

在流行文化界，这一年堪称"赵薇年"。10月28日《还珠格格》开播，打破了中国电视剧收视纪录。疯疯癫癫的"小燕子"成为全民偶像，开创了中国娱乐圈的巨星时代。小虎队与"四大天王"在内地风生水起，偶像文化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而来。那英和王菲在春晚合唱《相约1998》，庆祝她们的黄金时代。

前一年丁磊创办网易之后，搜狐网、新浪网和腾讯网相继成立。这四大门户后来拉开了互联网进入中国民众生活的序幕。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将互联网使用者定义为"网民"，一种新型身份开始

向每一位中国人蔓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开放力量，重新定义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个等级森严、秩序僵化、封闭分裂的传统世界正在崩溃。

这年年底，“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逝世。

1998年中国十大事件

- 1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 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人大审议。
- 4月28日，实行政企分开，放手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
- 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
- 6月30日，国家防总发出《关于长江、淮河防汛抗洪工作的紧急通知》，全国抗洪拉开序幕。
- 7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
- 8月13日，江泽民赴湖北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
- 10月1日，中国铁路实施第二次大提速。
- 10月28日，国航905号班机被劫持至台湾。
- 11月，腾讯公司成立，中国互联网四大门户形成。

1999 跨越世纪，高校扩招

文｜**朱人奉**

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

在全球媒体开始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和教训时，赵本山也在春晚上和崔永元、宋丹丹表演了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赵本山的台词传达了这一年的主旋律，“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

洪水退了，时代大潮汹涌而至。1月，国务院批准转发了教育部提出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拉开了高校扩招的大幕。据统计，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达47%，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高考成为全方位的社会运动，涉及教育、经济、社会、家庭乃至学生个人，首批80后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和互联网进入公共视野。

十年后中国的社交网络文化，在1999年便可预见。2月10日，腾讯公司推出即时通信服务，并发布第一个测试版本QQ99b0210，简称腾讯QQ。这家公司及其产品将会在未来十几年里，起到比彩色电视机更为重要的作用。

1999年12月31日，全球告别二十世纪。超过2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迎接新年，超过10亿观众通过电视观看了这场跨年活动。在中国，民间最大的跨年活动出现在香港，80万人聚集在尖沙咀。北京为了迎接新千年，建造了“中华世纪坛”以及重达50吨的中华世纪钟。12月31日晚，江泽民带领数万名各界人士，在2000年的第一秒，点燃了“中华圣火”。

在“明天就是下世纪”的跨年夜，所有媒体都在展望未来。1999年中国经济放缓，但中国人对未来的经济仍然高度乐观，中美两国于11月15日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已成定局。

在悲观与乐观的中间地带，也散布着迷惘的阴翳。摇滚歌手张楚曾认为九十年代有一种追求颠覆的力量，让平庸的人一直处于不断精进的状态中。但是，到了1997年，唱着充满隐喻的《造飞机的工厂》，张楚也觉得迷惑了。

他的同伴可能更清楚时代的变化。1999年，窦唯、何勇等歌手突然决定去复兴门地铁站卖唱，架子鼓的节奏足以“掀翻”整个车站。此后十多年里，他们多次对人回忆起那次“行为艺术”：“没人管，随便唱！”

1999年中国十大事件

- 2月10日，腾讯公司即时通信服务开通。
- 5月1日，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 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飞机轰炸，三名中国记者被炸死。事件引发全国范围的反美示威活动。
- 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引发强烈抗议。
- 8月15日，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移交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
- 9月28日，国务院发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共十七条。

- 10月1日，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及群众游行活动。
- 11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
- 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升空。
- 12月20日，澳门回归。



1995年，青岛中山路，一队纠察人员从巨幅牛仔裤广告牌前经过。(图/吴正中/FOTOE)

九十年代语录

辑｜**谭山山**

1990

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随着钱锺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出，揭示婚姻关系复杂性的这句话也流传开来。

好人一生平安。

——引发万人空巷的热播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名，也是剧中刘慧芳扮演者凯丽从此背负的箴言。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汪国真的诗歌先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学生中流传，随后，他的多部诗集得以出版并迅速畅销，使得1990年被出版界称为“汪国真年”。

1991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1991年年初，《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大胆吹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

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

——1991年2月出台的《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可以用这25个字概括。1994年，城镇“房改”在全国展开。

你们下笔客气些。这是中国农民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的不平等。

——进城务工的农民最早被称为“盲流”，上海政法委一个负责遣送“盲流”的副秘书长则对媒体这样表示。

别理我，烦着呢。

——这个年代流行文化衫，而文化衫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一句了。它就相当于网络时代的签名档。

一卡一拉就OK。

——卡拉OK于1991年进入中国，迅速风靡全国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有形态，沾上了黄色，以至于有人这样比喻卡拉OK。

好了遭人嫉妒，差了让人瞧不起；忠厚的人家说你傻，精明的人家说你奸；冷淡了大伙儿说你傲，热情了群众说你浪；走在前头挨闷棍，走在后头全没份。

——1991年播出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张国立的台词。

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

——刘震云发表于1991年年初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的开头。多年后，刘震云在答读者问时表示："小林认为，他们家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台湾歌手潘美辰凭一首《我想有个家》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1992

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被总结为这一句话。

"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1978年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被西方媒体形容为"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1992年他成为《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人物"，并得到这一评价。

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电影《秋菊打官司》让"给个说法"成为流行语。

1993

有事呼我。

——1992年12月28日，北京无线局“127”自动寻呼台正式运营。此后，BP机成为九十年代最流行的通信工具，“有事呼我”（珠三角则为“有事call我”）也成为流行语。

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宣传语在这一年出现在大街小巷。但北京最终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申奥失败。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脑体倒挂”，而这个热词在这一年开始流行。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

——赵本山春晚小品《老拜年》中的台词。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热播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台词。

就算你感到万分无奈，也别开始怀疑人生啊。

——1993年开播的情景剧《我爱我家》中，宋丹丹扮演的和平的经典台词。

世界纪录想怎么破，就怎么破。

——马俊仁带出“马家军”，连破女子中长跑世界纪录，这是他发下的豪言。他把破纪录诀窍归结为“喝龟血”和“母鹿式跑”，日后证明这全是胡扯。

1994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这句令人耳熟能详的警示语出自电影《股疯》。

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1993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发生火灾，导致323人死亡，其中288名为中小学生。出自《中国青年报》报道的这句话，从此成为这场大火的最大标签。至于现场是不是有人说过这句话，至今仍存在争议。

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

——因为农村“白条”问题严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产生了这句顺口溜。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老狼在1994年大学生毕业晚会上唱响《同桌的你》之后，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1995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1995年5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行五天工作制，有了双休日的人们终于可以告别上述流行语描述的困境。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大话西游》1995年在香港上映，票房惨淡。两年后，《大话西游》才在内地年轻人中流行，其中这段台词也在日后被反复引用。

出来混，错了要认，被打也要站稳。

——电影《古惑仔》中靓坤的台词。

1996

中国可以说不。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热销，使得“说不”成为当年最为掷地有声的流行语。此后，“××可以说不”的表述比比皆是。

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

——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种说法。改革势在必行，但人们对改革仍抱有恐惧心理，缺乏勇气。

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担心的是物价上涨。

——1996年的顺口溜。1996年，“下岗”成为人人关注的话题。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名言，后来被反复引用。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英特尔前总裁安迪·格鲁夫的名言，被包括张朝阳在内的很多人奉为座右铭。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1996年秋天，瀛海威公司在中关村竖起了写有这句著名广告语的广告牌。如今瀛海威虽然已黯然谢幕，但当时提出的命题已经无需回答。

科技以人为本。

——诺基亚品牌宣言。和爱立信的“一切尽在掌握”相比，诺基亚这一中文品牌宣言不仅超越了英文原文（Connecting People），而且更人性。

各位观众，现在站在跳台上的是英国裁判！

——据传是韩乔生在主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的口误。有好事之人把属于或者不属于韩乔生的话语编成韩乔生语录以充笑资，多年之后人们才明白，其实韩老师是最富有娱乐精神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 一则丰胸产品广告语。女性对完美身材的渴望成为商机，丰胸产品应运而生，也产生了“做女人挺好”“做一个无法让男人一手掌握的女人”等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其实，男人更需要关怀。

—— 一则药品的广告语。受“男主外”观念主导，男性总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比女性大，因而立即对这句广告语产生了共鸣。

1997

小平同志您走好。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北京人民给他送别时打出这样的横幅。老人家以92岁的高寿辞世，人们虽然悲痛，但平静接受。

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香港回归后的首个赛马日，几乎所有香港报纸都以这句话为标题，显现政权交接后的平稳过渡。

有话好好说。

——出自张艺谋同名电影。对于面对“世纪末”躁动，神经越来越敏感、脆弱的人们来说，“有话好好说”是解决问题屡试不爽的百搭良方。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

——凤凰卫视当红主持人吴小莉在个人宣传片里这样说。

1998

严防死守、死保死守，咬紧牙关、背水一战。

——1998年长江抗洪标语。严防死守的不仅是长江大堤，还有8%的GDP增长率。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朱镕基当选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他这样表示。

网络就是新生活。

——网络从1998年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但是当广州一个路牌广告打出这个旗号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谁能真正明白网络新生活的真义。

香港不是提款机。

——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动用1180亿港元狙击国际金融大鳄，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这样说。

你算哪根葱?

——1998年热播的《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的口头禅。小燕子的没心没肺、浑不吝的劲头正好切合了人们新的审美要求，所以异常受追捧。

该出手时就出手。

——《水浒》主题曲《好汉歌》中最提劲的一句歌词，深得人心。

你跳，我也跳。（You jump, I jump.）

——1998年风靡全球的《泰坦尼克号》的经典台词。迄今为止，《泰坦尼克号》全球票房仍居世界第一。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凭此片大红大紫，他在现实中的爱情表白也同样动听：“亲爱的，我什么都不能给你，除了整个宇宙。”

请别克林顿我。

——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档子事一出，“克林顿”这几个字由名词演变为动词、形容词。后来还出现了克林炖（顿）莱温斯鸡（基）这道菜，有人甚至用他们的名字注册安全套商标。

愈堕落愈快乐。

——源自1998年香港电影《愈快乐愈堕落》，但新世代就喜欢反过来说。他们嘴里的“堕落”，可能仅仅是懒得起床、懒得上班，但要的就是这种颠覆的感觉。

1999

谈了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终于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朱镕基的这句话成为媒体引用最多的语录。

常回家看看。

——继《新周刊》在1997年以《过年就是回家》为题报道春节后，一首《常回家看看》在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唱响，撩起了人们对家的久违的温情。

知识改变命运。

——张艺谋等人在央视播出的大型公益广告系列中现身说法，演绎“知识改变命运”，也使得这个口号深入人心。

看上去很美。

——1999年王朔推出小说《看上去很美》。很快，“×××很美”成为流行句式。

农夫山泉有点甜。

——这句乍听上去不太明白的广告词成全了农夫山泉这个品牌，它也成为1999年最具标识特征的广告语。

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市场反应平平，倒是成全了借用他的片名做广告的恒基伟业。

所谓选择，都是虚幻。

——《黑客帝国》中的台词。这句话在1999年带来的震撼远不及网络日益普及的几年之后。

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

整个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吗?

可以。

所以，是的。我爱你……

——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的经典段落，理科生会对小说中BASIC语言式的表达感到亲切。在总结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没有人能够跳过这部里程碑式作品。

将爱情进行到底。

——这部1999年上映的电视剧捧红了李亚鹏和徐静蕾，“将××进行到底”也成了流行句式。4年后，王菲把“将爱情进行到底”简化为“将爱”，作为专辑主打歌的名字，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九十年代，回归之前的中英街。（图/何煌友/CFP）

九十年代
社会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 只记今朝

苍天笑 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 天知晓

江山笑 烟雨遥

涛浪淘尽红尘俗世 几多娇

清风笑 竟惹寂寥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苍生笑 不再寂寥

豪情仍在 痴痴笑笑

——歌曲《沧海一声笑》

一个属于上海的黄金时代

文丨**张金平**

谢国平14年来一直在书写浦东。

他是《浦东样本》及《浦东故事》的作者，先后担任《浦东时报》副主编、《浦东杂志》主编——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采访报道者。

最近二十多年，浦东石破天惊地在世人面前崛起，它经历了欧洲发达地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浦东像一只马力强劲的引擎推动上海走出困境。”谢国平形容道，“一个单纯的特大工业城市上海，转型成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它就像一只头雁，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共同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九十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从东部到中西部，全方位打开。

今天，迪士尼和上海“相恋”10年后顺利“完婚”，唐老鸭在上海筑造新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在写作《浦东故事》时，谢国平常站在地图前审视浦东——“平心而论，浦东是一个一马平川的好地方，东临大海，西靠黄浦江，由长江夹带的泥沙经历千万年积淀而成，日照充足雨水适宜，被称为‘长江之子’。”

公元1525年，一道“销毁出海船只”的圣旨禁锢了这里。海浪周而复始地洗刷海滩，面朝大海的浦东人，日日劳作，大海彼岸却与他们毫无关联。

故有作家写道：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真是有点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弯了一下腰，把繁荣送给了浦西，把落后留给了浦东。

在上海老居民眼里，未开发的浦东是乡下，“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在上海市民中流行，也是浦东落后的城市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1990年新年，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人们，随着清洁工长长的吆喝声，纷纷睡眼惺忪地拎着木马桶出门，水哗哗地流，呛人的煤烟吹起又消散，人们匆匆赶着上班。

在刘金田、张爱茹合著的《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用一个章节记述了1990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力挺”朱镕基搞改革的来龙去脉。

上海下起罕见大雪，西郊一座宾馆内，邓小平正在度过他在上海的第三个春节，他在思考，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彼时，国际局势出现大动荡，邓小平急切要向世界打出一张政治王牌，告诉西方世界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则希望建设一个新上海；深圳特区的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历史合力聚于浦东。

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去邓小平下榻的宾馆拜年。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鼓励道：“不用怕，报嘛。”

2月13日晚，前往火车站途中，邓小平对朱镕基说：“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

2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郑重地嘱托江泽民等新任的几位中央领导：“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他还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3月3日，邓小平和江泽民、李鹏谈话：“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下，浦东开发从纸面讨论进入实际性启动，只用了45天。至此，浦东的命运开始转变了。

历史决定浦东承担起国家战略。浦东如何开发？是步深圳之后尘，还是另选一条路?

6月2日，党中央、国务院给了上海《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批复，在批复中，强调要利用上海的三个优势：人才、区位和对外联系。

但这份批复并没有战略上更详细的构想，还是比较原则和宏观的。

同年，在深圳特区10周年纪念大会上，市委书记李灏宣布：“今天，在这里，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对于浦东来说，争论的焦点是把它建成新的工业基地，还是发展成多功能综合经济中心。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功能单一不可取，浦东要建设成为既有发达的金融贸易产业，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综合经济中心。

1990年是上海经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年份。

在上海得到批复的同一个月，在海外访问的朱镕基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之后，浦东四家国有开发公司相继上市。这意味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式启动。

1991年春节，“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带来了一场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思想界引起震荡。

2月15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皇甫平”的评论，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第二篇提出要搞市场经济；第三篇则直接以《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一些》为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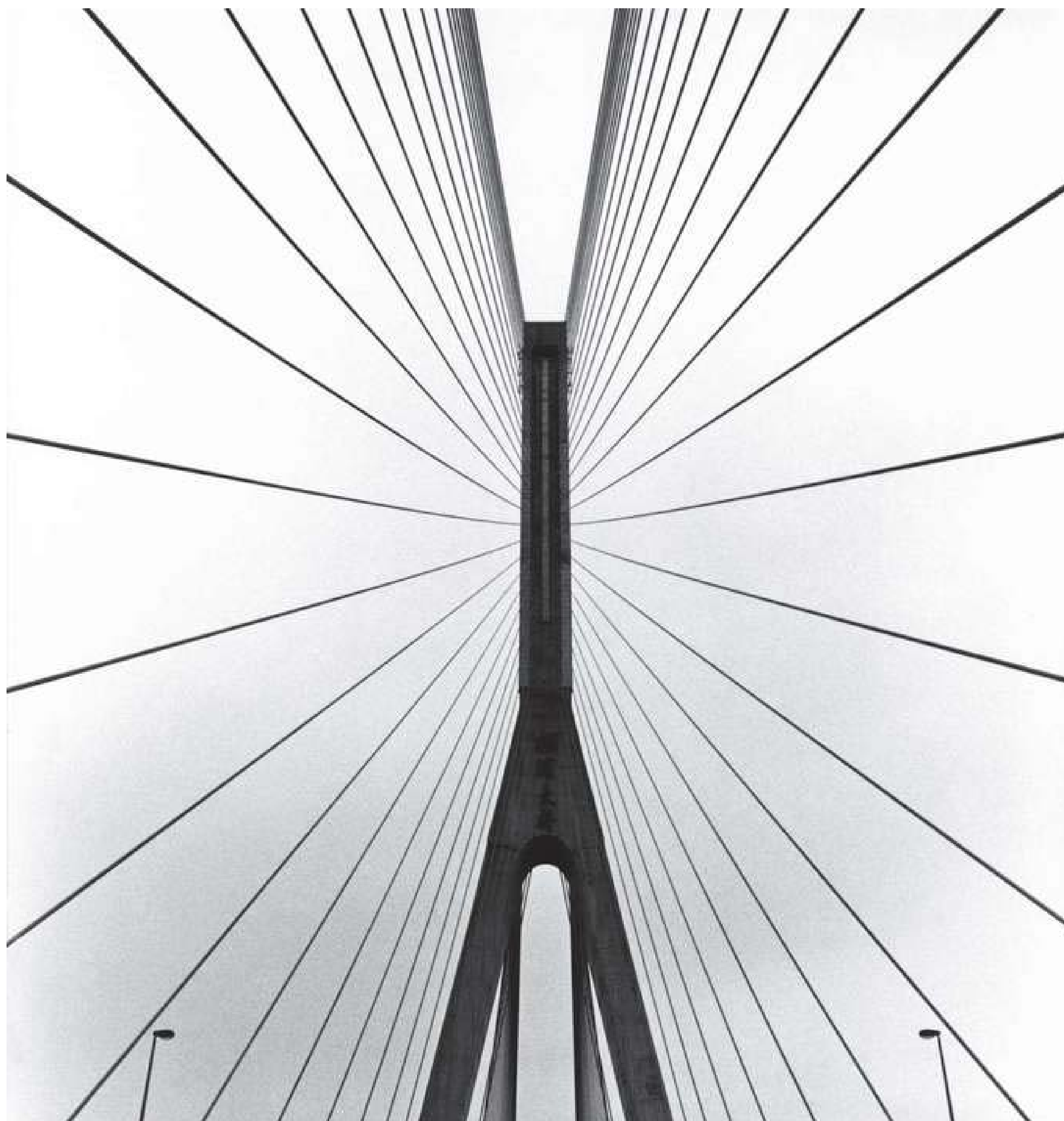
当年北京某杂志一篇题为《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的末尾写道：“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人们才倏忽明白老人的用意。

秋天，江泽民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开始迸发，上海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景象——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股民们席地而坐，每5分钟听一次广播里播报的股票行情——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市场经济元年”。

1994年春天到次年秋天，特区政策受到了一名叫胡鞍钢的学者的挑战，他在一份国情报告中建议：必须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又一场论战爆发。





1993年，上海，杨浦大桥。（图/Marc Riboud/Magnum)

当然，浦东也不例外地享受着政府的优惠政策。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重申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1996年4月1日，经济特区的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取消，浦东从九十年代由“政策红利”带动的区域增长优势成为历史。

争论最终像一场春雪一样很快消失了。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普惠理念的实行，浦东转向功能性政策。

在谢国平的《浦东故事》里，九十年代的浦东，是伴随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而让人明确感受到它的发展的。

谢国平采访过一个叫沈入群的浦东人。自1991年起，沈入群开始绘制浦东地图，最初是为了给浦东人提供方便，但之后几乎每年都要绘制一张升级版地图，他曾经一一标明浦东新造的450多幢20层以上高楼。

“浦东变化太快了，有时你几个星期不出门，就会不认得路。”沈入群得知谢国平在写关于浦东的书，硬是要送谢国平一幅地图。

这时，沈入群已两鬓斑白。

浦东开发之初，招商人员常常指着五颜六色的规划模型告诉外商，哪一座是金茂大厦，哪一座是环球金融中心。

有外商听完后会哈哈大笑，这时窗外都是吊车，漫天尘土，道路泥泞，破破烂烂。此时，浦东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开工建设的工地最多达到2000多个。

1991年和1993年，黄浦江上接连建成了两座大桥，之后越江隧道和地铁也建成通车，土地价格提升，浦东开发者通过土地批租得到了丰厚资金。

截至2001年土地空转制度基本结束时，浦东共计转让土地88.6平方公里，政府投入61亿元撬动700亿元资金。

1993年，中外合资企业日立电器投资5500万元开建厂房，日方代表谨慎地问浦东新区领导人赵启正：新厂房多久可以完工？6.4万平方米的农田，要建起4.3万平方米厂房，安装200多套设备，正常需要840天。赵启正告诉他，一年。

日方代表认为他在开玩笑，赵启正没有开玩笑——“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日方后来连续追加11次投资。

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火车即将出发之时，又把上海市领导叫进去，一再叮咛，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会，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此时，浦东开发已经从上海地方的愿望和设想上升为国家战略。检索《邓小平年谱》会发现，在九十年代，邓小平提及浦东26次。

1997年，高速发展的浦东被亚洲金融危机狠狠地撞了一下腰。正在建设的环球金融大厦面临撤资窘境，工程不得不叫停；世纪大道建设到一半出现了资金困难，领导鼓励建设者：再大的困难也要咬咬牙顶过去，杀出一条血路！

一封建议把位于浦西的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东迁至浦东的信得到了采纳，启动了上海要素市场从浦西到浦东的“东进”。

随着房地产交易中心东迁至浦东，紧接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等7个国家级交易所也相继迁至，国家级钻石交易中心也在陆家嘴建立。在这种要素市场的集聚效应下，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渐成气候，金融中心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

有外国人批评，陆家嘴的房子造得太多了。赵启正则说：“在中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些，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有人形容，陆家嘴的每一幢摩天大楼都是一条“站着”的金融街——亚洲金融危机后，情况开始好转，2000年时，小陆家嘴全部租出，百幢楼里的灯逐渐亮了起来，入夜璀璨的灯火成为上海最迷人的风景。

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这种变化：1990年，浦东的经济总量仅为60亿元，1993年财政收入11亿元；到200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150亿元和310亿元。

2008年8月28日，时为上海最高的大楼环球金融中心开业，也由此夺去了金茂大厦“中华第一高楼”的头衔。此时，大洋彼岸袭来金融危机的寒意，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2009年，全球金融界依然风声鹤唳。上海经济出现了减速，连续16年实现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代过去了。2009年以来，上海经济增速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2011年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仅为7.5%。

事实上，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生产国、第二大资源消费国，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明显。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能够为之服务、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中心迫在眉睫。上海以其无可争议的优势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好选择。

在国际金融风暴中，浦东迎来了米老鼠和唐老鸭。

2010年11月5日，迪士尼公司与上海申迪集团签署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合作协议。早在1994年，迪士尼公司总裁弗兰克·韦尔斯在洛杉矶总部接待了赵启正，在赵还未归国时，韦尔斯派出的先遣小组已经来到浦东。当年4月3日，韦尔斯因飞机失事不幸丧生，已经萌芽的合作被终止。中美不同的文化根基让这场合作曲曲折折，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迪士尼高层频频造访，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2010年世博会落幕，给了迪士尼更大信心，一定要到上海成为“伟大城市的一部分”。上海一家报纸以《上海和迪士尼领证了》为标题，来报道二者的合作。

金融危机给浦东人上了一课，浦东开始追求新的制度试验。

2013年9月29日10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开张，微软拿到了“001号”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这一年，浦东的面积已经扩大到12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多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开放倒逼改革，媒体发文称：“上海自贸试验区也恰如一个支点，它将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谢国平现在依然要每天去《浦东时报》上班、写稿子，有时还要出去采访。“思想的表达，在目前看来，还是文字最精准。”他每天早晨上班都会看到一群群进入陆家嘴高楼大厦的年轻白领，因此感叹：这里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的一本书业已杀青，书名为《龙头传奇：浦东发展史》。

通过近二十年对浦东的观察和书写，谢国平发现，浦东进入了经济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但也进入了“矛盾突显期”。他在思考，浦东的奇迹将怎样继续下去，浦东将怎样延续更长的黄金时期。

一座大坝和它背后的百万移民

文｜**赵渌汀**

一艘轮船的甲板上，一个汉子脚趿拖鞋，赤裸脊背，卧扶栏杆，侧目两岸。江水在面前划过，群山从两岸退去。

这是摄影师晋永权所著《出三峡记》的封面背景图。图中的轮船被冠以“移民轮”之名，赤裸上身的汉子，属于那群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三峡移民中的一员。

九十年代起，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的三峡大坝在湖北宜昌三斗坪开建，这也注定了湖北、重庆21个区县的120万人口不得不挥别故园的稻菽和江水，前往未知的新家园。改变了自然生态和社会形态的三峡大坝背后，始终有一群与故土无处告别的特殊群体，他们被贴上“三峡移民”的标签，他们的存在，为飞速发展的九十年代标下一个离别的注脚。

摄影师颜长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在湖北省秭归县。年少时，他最爱眺望离家三十里处的长江峡口的巫山之美与飞瀑之壮。1992年，他因采访途经三峡时，拍下了期待已久的三峡山水风景照，他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被改变。“三峡给我的印象，总是那种人间烟火繁盛、一派纯朴自然的感觉。”

三峡的命运在这一年同样被改变。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关于三峡建坝的设想，最早源自孙中山。他认为有必要在长江上建坝以期“改善航运，利用水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发生两次特大水灾，近30万人因此丧生。1954年，长江流域爆发了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洪灾。毛泽东之后拍板上马三峡工程，但工程建设随后因“文革”的到来而搁浅。

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当时提出的蓄水水位范围在150—200米之间，但150米根本无法解决重庆航道问题，200米又有淹没重庆朝天门的危险，于是最后定在175米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175米，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将193公里的长江三峡的前世深埋于长江水下。

“防洪、发电、航运”被视为三峡工程的三大功能。在这三大功能中，“防洪”被视作项目的最核心效益。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刘雅鸣认为，三峡工程的200多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每年都会拦蓄洪水；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工程每年发电900多亿千瓦时；另外，工程还能对鄱阳湖、洞庭湖在非汛期进行补水，保证了中下游库区的用水。“任何工程都有利有弊，目前看来，三峡工程的利大于弊，但因此而产生的弊也显而易见。”

自九十年代起，关于这个总投资近2500亿元的大项目的讨论和争议就一直不断。除去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用大坝拦截如此大片水域可能带来的地质风险也不可预知，而那些即将被175米水位线淹没的珍贵文物就此沉底。

三峡文物保护由此在国家层面得到重视。1994年3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共同组建“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全面负责三峡淹没和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资料显示，共有1137处三峡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包括772处地下文物和365处地面文物；原地保护项目63处，搬迁保护项目132处，留取资料169处，仿

古新建1处，其中既有白鹤梁水文题刻、石宝寨等原地保护项目，也有张桓侯庙、无名阙、大昌古镇等搬迁保护项目。

不过，与三峡文物的保护比起来，湖北、重庆境内的百万三峡移民的安置问题显然才是重中之重。

1992年起，伴随三峡工程建设在国家层面的正式确立，生活在长江水边的人们开始了搬离。

居于175米水位线下的人们，起初与万州、涪陵、巫山和奉节这些城市一样，“身体后挪并就地后靠”。与发生平面位移而移居别处的外迁相比，他们显然更愿意接受就势垫高而居的安置方案，好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在同一空间纵轴上守住对故土和江水的最后情谊。

1999年5月，国务院对原先的三峡农村移民政策进行调整，从过去强调“以土为本、就地后靠”为主，调整为“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安置”。这使得原本就地小规模的搬离，逐步上升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因国家项目而离开故土的大规模迁徙。

2002年，当摄影师颜长江再次来到三峡时，水坝工程的建设已经进行得有条不紊。在他的老家湖北省秭归县，诞生了第一个三峡移民——60岁的韩永振。1992年三峡还没开工建设时，韩永振一家七口便被定为搬迁的第一户人家。按当地的俗话，“睡好了不翻（翻身），住好了不搬（搬家）”，挖土机拆除了他家4间大瓦房的宅基地，也在长江流域开始了一段关于别离的雄浑史诗。

九十年代末，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曾亲眼目睹一个家庭的外迁经历。“一家五六口人，年轻的都打算走了（被移往广东），家里80多岁

的老头子拗着就不走。当然，他也走不动了：他得了重病。后来他说：好在我得了病啊，不然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谁受得了啊？”



2006年9月，重庆市云阳县下岩寺。下岩寺始建于唐朝末年，地处长江边的悬崖洞壁，属三峡二期135米蓄水淹没遗迹。在2003年5月以前，下岩寺作为县级保护文物被整体搬迁。

“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的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李世权说。

三峡工程在全部竣工后，水库淹没区涉及湖北省、重庆市21个区县的277个乡镇、1680个村、6301个组，淹没城市2座、县城11座、集镇114个，需要搬迁安置移民120多万人。从1993年到2005年，三峡工程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05.33万人。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晋永权记录在《出三峡记》中，恰如所有外迁的三峡移民的真实写照。

1999年，摄影记者晋永权来到三峡。他拍拆迁，拍别离，拍纠结，拍无奈。七年后他出了本《出三峡记》，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下因为三峡工程而外迁的移民。他说：“叙述是为抗拒遗忘。”

2003年，画家刘小东来到三峡。他画老人，画小孩，画棒棒，画民工。后来他把这些集结成册取名《三峡大移民》。他说：“这里的商店、楼房、城市，慢慢被水淹没。”

2003年，导演贾樟柯来了。他先是跟拍刘小东并打算做一部叫《东》的纪录片，后来贾樟柯把对三峡和移民的思考及感悟合起来套拍了一部叫《三峡好人》的电影。他借电影中摩的佬之口说：“一个两千年的城市，说拆就拆了。”

2005年，纪录片导演高嵩来了。晋永权拍三峡移民，他就跟拍晋永权，不过到最后他不自觉地将镜头对准那些搬离故土的人。“很多移民到了安置点后不肯下船，新住地和他们原住地完全不一样，他们拒绝被迫进入一段新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曾在2007年对外表示：“三峡工程120万库区移民目前基本做到搬得出、稳得住，并初步

展现了逐步能致富的前景。这是中国人民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创造的一个奇迹。”

但奇迹背后藏掖着三峡移民们对远离故土的无奈。高嵩曾回访不少迁至外省的三峡移民。“中国人自古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中国人骨子里对土地的感情也极深。在那些外迁的三峡移民身上，我看到了适应力极强的中国人远离故土时的那种无奈。”

这种无奈使得不少人在外迁后自发回到故土。“有些人回来以后没户口，小孩上学反而困难了，但还是要回来，还是必须回来。”高嵩说。

纪实作家卢跃刚曾在《出三峡记》序言中写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水库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自1949年至1999年，全国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86000多座，包括在建的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在内，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含竣工蓄水前的自然增长人口）总计约1750万人。”

而在高嵩看来，包括三峡在内的水库项目给中国社会，尤其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最根本影响，便是农村宗族链条被基本割断，以往通过土地牢牢维系的归属感开始缺失。

高嵩举了个例子：三峡移民政策按照水位线移民，但是一般山区的村庄很少像东部地区那样家家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样就会发生如下情况：某个处在135米线以下的家庭，属于一期移民，要移到某省某县；但他同村的父母的房子在145米线，属于二期移民，要移到华南某省某县；他的叔叔家在156米线，就会跟随三期移民到另一个省。

根据水位线高低分批安置移民的方案，曾导致不少惨烈事件发生。“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离开便再不能回，于是在移民日期的前一周开始不吃不喝，然后要求儿女将自己葬在175米线以上（三峡蓄水的最高水位线）。很多移民村移民镇，在一段时期内集中出现两件事，一个是大规模的乡村宴会，另一个就是葬礼。”高嵩说。于是，在三峡的许多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

“2005年去三峡拍纪录片时，令我最震撼的是一个背着门、拿着锅的年轻人。他是三峡移民，要去附近的市场把家里仅剩的门和锅卖掉。最后他卖了不到5块钱。对一般家庭来说，门象征安全，锅代表生计。当你把安全抛弃，把生计弄丢，最后换回的不是新生活，而仅仅是不到5块钱。”高嵩说。

“大水来临时/下面的一切都成了从前/从前的一切都成了留言/我在这里/没有了起点。”

这是《出三峡记》中收录的一首关于三峡移民的诗。不过卢跃刚显然更愿意合上书回看一下那个封面：光脊的三峡移民手扶栏杆，故乡远去。“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猜他在想什么。我真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左手内地，右手香港

文｜**阿饼**

“中英街一日游”是九十年代初一代内地游客的“集体记忆”。

同样的一条街，20年前去逛和今天去逛，到底有何不同?

从深圳市区搭公交车去中英街，在“三家店”这个站下车最近了。“中英街一日游”旅程从这里开始。

据说在解放前，这里真的只有三家店，一家卖可口可乐，一家卖万宝路香烟，一家卖书。下车，相比九十年代的巅峰时期，如今的沙头角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路上走着的，像是来深的打工族，商铺播放着九十年代红遍香港的《红日》，让人恍惚身处内地小城。一会儿，《红日》换成了《春天的故事》……从主干道拐入后街，走着走着，拉小拖车的人越来越多，在路边兜售金表的小贩也越来越多，中英街就在前方。

当地一位记者回忆说，几十年来，这里最不寻常的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黄昏时分，天下着小雨，中英街两侧所有店铺大门都关上了，街上没有一个人影，“出奇的安静”。

那个午夜暴雨倾盆。习惯了早睡的沙头角村民早已进入梦乡；除了白天就插好的一些国旗和区旗外，空荡荡的中英街上并没有举行特别的庆祝。香港警员刘天伦和另一位同事冒雨巡逻中英街。“警察总台

通知我们更换帽徽，没有刻意安排，全港的警察都在做市民治安这件事情。只是我们碰巧负责的是中英街。”

第二天清晨，中英街的居民都起得格外早，就连许多平常看不见的老人都走出了家门。人们在中英街上组成庆祝回归的游行队伍。

原盐田区文联主席李宜高记得，回归前他亲眼见过港界巡逻的警察主动和内地的警察聊天，但大家还是小心翼翼，怕被人看见。而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我们本就是一家人”。回归不仅仅是在名称上起了变化，也拉近了中英街两侧居民的关系。

70多岁的刘马央老人是中英街的历史见证者，儿子刘伟强是中英街居委会主任。刘伟强透露了一个秘密：这里的居民从来不承认“中英街”这个街名，认为这是耻辱，他们称之为“中兴街”。刘伟强指着屋前的门牌说：“不信你看。”

回归第一天，刘马央老人一家吃了一顿特别的团圆饭。老人说，这餐饭可比过年重要啊！是啊，一个小镇上的乡亲，被一条街隔断，一隔就是99年。何马生老人住新界粉岭，在回归第一天戴着几枚胸章来看老友。他是东江纵队老战士，说是打走了“日本仔”（当地人对日本侵略者的称谓），打走了老蒋，现在，终于让英国人把殖民者的十字架背回老家的坟墓去了。

在广东边防办证中心的大厅里，两三百人拥挤着在等待武警官兵派发的一次性边防证。带上身份证和20块钱，等15分钟左右就能拿到边防证。与香港自由行的简单便利相比，中英街的关口居然还卡得这么“死”？广东公安边防第六支队主任冯立峰说，中英街是沙头角特别管理区，特区中的特区，它首先是作为一个边防管理区存在，而非为了方便人们购物。

中英街，长不到250米，宽不过5米，是世界上最短、承载历史信息最多的一条小街，它与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越南的贤良桥一并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史上最有影响的四条分界线。

中英街可以说既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1899年，它是一道耻辱的伤口，朝廷在这头，老外在那头；1949年，它是敌我斗争的前沿，社会主义在这头，资本主义在那头；1978年，它是落后与发达的分野，穷亲戚在这头，阔太太在那头……直到香港回归之前，中英街都流传着一个谜语：1997年之后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条南国小街，在八九十年代，从改革开放前的"死角"，成了香港的另一个"旺角"。中英街社区工作站的刘站长回忆说，真正让中英街的商贸发展并蓬勃的，是一场台风。有一位被称为"兴宁婆"（祖籍梅州兴宁）的香港女子在中英街开了一家名为"王兴记"的小商店。1979年，深圳刮强台风，整条中英街都是水，"王兴记"的许多货物被海水淹了，准备销售的皮鞋被泡得走了样。为了挽回损失，"兴宁婆"就在门口搭了一块木板，把皮鞋等货物放在木板上晾晒，谁知马上就有人来问皮鞋能否便宜卖。"兴宁婆"马上答应，并搭配着其他货物一起打折出售，一场台风反而让货品一销而空。看到这一商机，其他香港居民立即效仿"兴宁婆"，香港一方的商铺陆续发展起来。不久，深圳的国营商场也开始进驻中英街。

据说，从1980年以来的10多年内，中英街的财政收入就占了整个沙头角的10%—30%，最高的年份达70%。80多岁的"明兴百货"老板何集庆赶上了当时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内地黄金不能随意购买，中英街的黄金饰品迅速热销起来，到1988年，共有47家金铺，中英街成为全国第一条"黄金街"，当年的5月到10月，中英街共销售黄金饰品50吨，这一数量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何集庆回忆，当时有的内地客是用麻袋装着钱来买金，一买就是几十件。如今，"明兴百货"早已无缘日

进斗金。老人家将“明兴百货”转让他人，儿子们去了香港打工，他也回归含饴弄孙、粗茶淡饭的平淡生活。

中英街上，深圳一方的临街建筑比较气派，香港一方的比较低矮；深圳一方商铺的招牌比较整齐，用简体字，香港一方的比较混乱，用繁体字。站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一眼望去，出关口排着3条长长的游客队伍，每人的手里都拎着四五个写着“实惠”的黄色塑料袋，袋里隐约可见益力多、美赞臣奶粉、家乐牛轧糖和公仔面。

陈阿姨到深圳24年了，还说着一口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她还记得第一次去中英街时人潮鼎沸的情景：“那个人山人海啊，整条街热闹得不得了，我还亲眼看见有个女的偷衣服呢！”她当时在中英街买手机，诺基亚、摩托罗拉，“质量很好的，如果不是后来被偷了，我估计能用到现在”。

快走到街尾，左边巷口突然呈现热闹的景象。原来人们拎的“实惠”袋子正来自这一家“实惠百货”。门口放着的一摞购物篮两下就被拿空，店员将一个又一个纸箱子递出来——商品卖得太快了！

从实惠百货的人潮里“逃”出来，往前走拐个弯，就到了大名鼎鼎的“波记百货”。波记的刘经理是广东兴宁人，他来沙头角已经二十多年了，是波记元老之一，他了解波记卖布的过去，也见证了波记转型日杂百货的发家史。他说现在波记每天的客流量达五六千人，比去年（2015）11月前多了三成左右。客人实在太多，时常会有东西被偷，装了监控也不行——人多得只能看见一片黑压压的脑袋。

波记对面，生于1988年、穿着时髦的女孩Jose（乔斯）正坐在n袋金莎巧克力、健达缤纷乐与合味道杯面的包围中休息。她是第三代深圳人，8岁就跟着家人频频往来于罗湖和沙头角。她的父母是当年的“倒爷”和“倒婆”，在中英街批发进口商品，卖给市内熟识的小商贩。“每两个礼拜，我老豆（爸）就骑着摩托车奔往中英街，那时没那

么多车和人，去一趟也就30分钟，比现在开车还快。”当大人们在忙着搬货时，Jose就在一旁拣零食，公仔面、嘉顿手指饼、金莎巧克力都是她的心头好。“最吸引我的，是每天傍晚街口那车香喷喷的鱼丸和虾肠。推车的是香港新界那边的一个大叔，夏天喜欢光着膀子，看见我们来了，总会说上这么一句：学生仔俾多粒（学生多给一粒）。就这么一粒多出的鱼丸，我成了他的常客。”

香港回归后，中英街熙攘依旧。但随着深圳各大赴港口岸传来游客数量“爆棚”的新闻，地理位置带给中英街的商业优势逐渐丧失，它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中英街住了二十多年的张阿姨，由于工作关系，每天都要上街巡好几遍，仔细地询问每家每铺的安全状况。短短二十年里，她见证了中英街的寂寥与喧嚣。

作为小镇居民，她的日常消费全都在中英街里完成。近年内地物价猛涨，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倒挂，每天早上9点多就能看见关口处排起的长龙——那已是扫完货准备出关的队伍了。曾经因假货泛滥而名誉扫地的中英街，如今已很少人卖黄金、名贵皮具、手表和高档电器了。张阿姨一聊起中英街的假货情况就激动：“网上有许多卖进口食品或手表的，说自己有实体店在中英街100号、200号，这些全是骗子，中英街最长也只有42号！”

沙锦涛是中英街居委会主任。“九哥……”“九叔……”走在那条不长的中英街上，总有人很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生于斯，长于斯，在他心目中，中英街是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小区，这里已经连续20多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了。沙锦涛说：“我经常出门不锁门，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感觉就像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现在中英街里有4000多名香港居民，深圳原籍居民只有1000多人。九叔说：“现在香港那边仍然是许多破烂的房子，就像个小山村一样，而我们这边则成了‘香港’。人往高处走，不必用大的口号，人们一比就知道了。”

香港居民想前往中英街比内地游客困难。港府在新界有检查站，只有沙头角的港人才能进出，九龙、港岛和新界等地区的港人不允许进入。相比之下，在中英街土生土长、持两地身份证的“土著”居民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

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工资——村里的分红，从小被送去香港或国外读书……生长在沙头角沙栏吓村的二代“土著”，被称为“富三代”。他们从小在香港粉岭或上水的小学、中学上学，就着双城居民的便利，从中英街的小关出去，步行5分钟就能到校。有些住在深圳的香港居民也把孩子送到沙头角出关上学，连校车都不用坐。村里在香港工作的年轻人，多数每天回家吃晚饭。村里的老人家很喜欢比较谁家的孩子有出息，读书“叻”（粤语，厉害）。

如今，“富三代”选择去英国等留学的也不少。他们所过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二世祖”，很少跟父辈们在中英街做生意，他们大多数会留在英国或香港找工作，从事的工作五花八门，而且一般都是自己找的。

以前沙头角两边通婚的情况很普遍，村里的二代媳妇，也是以本地人和内地姑娘为主。“同走一条小街，同喝一眼井水，没有界限。现在两边都住乱了，已经无所谓深圳香港了。”九叔乐见其成。如今到了第三代，湘妹子、川妹子不在少数，九叔说，印象中有一家人娶了英国的“洋媳妇”。

九叔年轻时在香港上过学、打过工，后来回到深圳经商，做过私企老板，还当过盐田区商会副会长，如今作为居委会主任，令他感受

最深的是中英街居民的选举意识。“中英街的户籍居民都是拿着香港身份证的，可以参加香港的选举，长期受香港选举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工作的关注度、参与度也比较高。”

从波记出来，对面是4层楼的中英街博物馆，博物馆把中英街的历史分成了4段，一楼是历史沿革与生活风俗，二楼是东和墟市、英国割占、“3·18”勘界，三楼是抗日救亡、翻身解放、边防禁区，四楼直接让你登上天台，俯瞰整条中英街，主题曰：改革开放、百年梦圆和美好明天——中英街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

国企下岗潮：人生豪迈，从头再来

文 | **郑依妮**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刘欢一曲《从头再来》成为唱给下岗工人的励志歌。

1998年，中国国企改革全面展开，铁饭碗不再，超过2000万国企工人迎来下岗潮。

有人将下岗工人描述成这副模样：“没文化，没技能，好吃懒做，死要面子，脏活嫌脏，累活嫌累，干活嫌钱少，宁愿在家打牌搓麻将，一心沉浸在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愁吃喝的幻想中不能自拔。”

“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吃大锅饭搞垮了企业”……其实是对下岗工人的污名化。当年的很多下岗工人是技术能手，贾樟柯拍的《二十四城记》里，有个工人问厂长：“二十多年，我有没有迟到？二十多年，我哪年不是先进？”然而并没有用，他还是下岗了。

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九十年代中国需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型，而许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产能过剩和落后的国企拖了国家经济向前冲的后腿。

1998年，朱镕基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方针，其中包括通过使用行政手段进行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企业兼并、破产速

度加快。据统计，1996—1998年，国有企业数量从11.38万家减少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1998—1999年间，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2200万。

在1998年下岗潮中离开国企，如今从民营企业退休的杨萍女士回忆说，在九十年代，她所在的宣传部连续收到好几份红头文件，她的工作就是为国企改革做好宣传工作。她说："政策口号是'扶上马，送一程'，许多员工对于重新就业并没有太多信心，于是国企为下岗职工给出宽裕的条件，允许他们停薪留职，鼓励他们走进市场寻求就业。"杨女士的丈夫、双方父母、双方兄妹都在广东的国有企业工作，下岗潮的袭来，让全家人一下子"今夜重又走入风雨"，不得不从头再来。

虽然全国国企都在改革，下岗工人都需要再就业，但广东当时的阵痛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市场经济的到来，许多台商入驻广东，民营企业大规模兴办，市场对劳动力需求非常旺盛，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找工作并非难事。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工人来说，他们面临再就业的疼痛会更为剧烈。1998年至2000年短短三年时间，光是黑龙江一个省份，下岗人数就达到将近200万。2000年，下岗潮到达顶峰，那一年全国登记的下岗职工人数达657.2万。

生于东北的导演张猛在2010年拍摄了一部反映东北国企下岗工人生存状态的电影《钢的琴》，横扫国内外电影节，获奖无数。

张猛在东北工业区长大，毕业回到东北时，正遇上国企下岗潮，他目睹身边许多工人受影响。张猛计划拍出扎根东北文化的小人物三部曲。

两次偶然，让张猛有了《钢的琴》的剧本灵感。第一次，张猛去铁岭评剧团里找木材，发现了一台木质钢琴，破旧不堪但还能发出声音。父亲告诉他，那是七十年代一群文艺工作者为了省钱，自己画图纸、自己造出来的琴。张猛觉得挺有意思的，便把钢琴的事情记在心中。第二次是张猛在沈阳的钢材市场买建材，遇上在那里聚集的钢铁厂下岗工人。张猛发现他们个个身怀绝技，钳、铣、铆、焊一应俱全，但是因为下岗失去了工作，只能在建材市场混日子。

这两件事情突然在张猛的脑子里发生化学反应，张猛一拍脑袋，剧本有了——落魄的父亲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找了一帮下岗工人来造钢琴。张猛写出来的剧本只有简单的30页纸，成本预计500万元。但张猛拿着80万元的制作费，就在东北红旗拖拉机厂开机了。开机两周后，剧组只剩下47块钱。

回忆起当时拍摄的过程，张猛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陈桂林，穷困潦倒，停了戏，到处找人投钱。"《钢的琴》中造钢琴的这一小团体，代表着老工业基地的工人的生存状态，他们个个技术精湛，却无用武之地，无所适从。

今天回过头看，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黄金时代，大量国企改制、私营企业崛起。公务员辞职下海，富人跑海南，穷人跑深圳，做生意当老板流行一时。开矿、挖煤、跑外贸、搞地产、办工厂，当下很多传统企业家都是发家于此。

有评论认为，从下岗潮中走出来的人，绝大多数都过得更好。伤痛的记忆是刻骨的，很多人不愿回顾。他们也不愿承认，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是后来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国退民进"的改革红利一直维持到现在，私企发达的地区就业相对容易。在国企密集的地区，托门子找关系依然流行。

“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国有企业曾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几乎就要灭亡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时回忆说，“但经过三年脱困，也就是市场化改造，国有企业走向市场了，竞争实力大大增强。现在在国际同行业当中，中国的各个行业的大企业排在世界前面的，基本都是中国的国有大企业。”

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

文 | **朱人奉**

“中国重要吗？”

1999年，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论文影响极大，至今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经典文献。西格尔首先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个国家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但是面对“中国崛起”的说法，西格尔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能够起到的作用都不大，只是一个中等强国（middle power）。

当年中国的GDP在世界上排名第七，如今已经是全球两大经济体之一。2011年，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出席第五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他提到，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九十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美关系来到了十字路口，中美的交流日渐深入，但用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M. Lampton）的话说，九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是“同床异梦”。

一方面，美国作为全世界资本的中心，它是参与中国这场经济发展最深入的国家。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今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统计，1992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只有3265个，到1999年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28628个。另一方面，美国又批评中国是“血汗工厂”。美国几度尝试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多次提出反华议案。

八十年代末，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降低与中国的官方接触级别，但暗地里，他又向中国派出特使，特使在北京遇到了“波澜不惊”的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美国的企业主将会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料，1992年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法案，先是被否决，后来又被美国企业主杯葛。1993年5月，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在内的298家大公司联名致信克林顿，要求克林顿政府不要将人权或其他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

中美之间的经济来往不但没有因此停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在逐年增加：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为183亿美元，1993年为227亿美元……中国为了表示对缩小贸易不平衡差距的诚意，向美国派出了庞大的采购团，仅1993年上半年，中国便向波音购买了21架喷气式飞机（价值8亿美元），并签下协议，承诺今后几年将会购买或租用215架飞机（价值90亿美元）；同时还向美国汽车行业、石油行业和航空航天行业等公司签下了超过10亿美元的订单。当年的《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订单估计将为美国增加15万个工作岗位。

中美之间的贸易来往越来越紧密，经济利益开始主导外交政策。“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历史学者徐中约如此总结九十年代中美外交史的开篇。

价值观上的分歧，总是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波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十年代的台海局势反而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契机，中美双方恢复了自八十年代末以后已经中断的高层对话，还先后进行了元首互访。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期间首次公开表达了美国政府的“三不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后，中美关系度过了近两年的“蜜月期”。大摩擦没有，小纠纷不断。1999年5月8日，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进行长达78天的空袭行动，美国B-2轰炸机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当场炸死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炸伤数十人，造成馆舍严重损坏。美方坚称是误炸，原因是使用了过时的地图。经过长达一年的胶着和舆论战，2000年4月，克林顿政府向李肇星大使通报了调查结果，最终向中国政府支付了赔偿金2800万美元。

现代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大国之间更是如此。中国自1986年正式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1995年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后，中国便和美国展开了漫长的“入世”谈判。美方分明知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但总是提出“人权”“劳改产品”等问题，致使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1999年5月，受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影响，中美双方中止了入世谈判。9月，中美关系缓和，中美恢复谈判，并加快了进程。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为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谈判铺平了道路。

全球市场的大门打开了，中美的“合作性竞争”关系将更为突出。两国关系的好坏，就取决于是“合作”还是“竞争”占据上风。只要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个大国仍将继续保持这种暧昧与复杂的关系。正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所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它总是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

社会辞典

辑｜**宋爽**

/ B /

白宝山 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击军警，先后抢劫枪支3支，其中包括81式自动步枪1支，打死军警和无辜群众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白宝山案被列为“1997中国刑侦第一案”“世界刑侦第三案”。

保钓 1996年9月26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陈毓祥等5人于钓鱼岛海域跳海示威，其中陈毓祥身亡。10月6日，陈毓祥举殡当日，台北县金介寿议员和香港立法局的曾健成议员领导了新一轮保钓行动，并于次日成功登陆钓鱼岛。

不包分配 1996年1月9日，人事部颁布《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毕业生，是指取得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毕业后国家不负责分配工作的非在职毕业生。”

/ C /

裁军50万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在八十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中国将在3年内再裁军50万。到1999年年底，裁军50万的任务已经完成，20余万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地方工作。

重庆直辖 1997年6月18日，重庆从四川省分离，恢复直辖市，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直辖市。

/ D /

“大舜号”特大海难 1999年11月24日，山东烟大轮船轮渡有限公司“大舜号”滚装船由烟台地方港出发赴大连，途中遇风浪于15时30分返航。调整航向时船舶横风横浪行驶，船体大角度横摇，最终于23时38分翻沉，造成290人死亡、5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万元。

大邱庄 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8亿元，全村办起各种企业256家，拥有进口高级轿车200多辆，其中光奔驰汽车就有十几辆。1992年，全村的总产值、上缴利税、纯利润分别为45.5亿元、1亿元和5.1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东方明珠 1994年10月1日，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完工落成，成为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它是中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塔内有太空舱、旋转餐厅、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等景观和设施，并于1995年被列入上海十大新景观之一。

多莉 1996年7月5日，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1997年2月27日，英国爱丁堡的伊恩·维尔莫特科学研究小组向世界宣布这一消息。它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1997年世界十大科技进步的第一项，标志着生物技术新时代的来临。

/ G /

国家赔偿 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发布，并于次年1月1日实施。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损害，依法应给予的赔偿。国家赔偿一般包括行政赔偿、刑事赔偿。

国庆50周年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50周年华诞。时值世纪之交，这一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被人们称为“世纪大阅兵”。改革开放新时期诞生的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加入受阅大军。

/ H /

“海瑞号”千岛湖事件 1994年3月31日，24位台湾旅客乘坐“海瑞号”游船在千岛湖观光时，与6名大陆船员及2名大陆导游共32人，在船舱内被烧死。

胡万林 1995年，中国陡然间出现了一个“盖世华佗”胡万林，据说医术如神，包治百病，一时引得病者朝圣般从全国各地辗转来寻。1999年1月，胡万林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商丘警方逮捕，次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

/ J /

禁放烟花爆竹 1993年12月1日，北京城区开始禁放烟花爆竹。许多城市跟进，禁放法规在十几年的实施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诸多争

议。很多市民抱怨缺少爆竹声的新年没有年味。

京九铁路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红磡站（九龙车站），全长2235公里。1995年11月16日京九铁路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是中国一次性建成双线线路最长的一项宏伟铁路工程。

九二共识 1992年11月，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中国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所达成的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 K /

柯受良 1997年6月1日，柯受良驾驶汽车成功飞越黄河壶口大瀑布，向香港回归祖国献礼。飞越当天刮大风，导致挑战需进行三次尝试才最终成功。

孔繁森 1994年11月29日，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孔繁森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典型，被誉为“九十年代的雷锋”“新时期的焦裕禄”“民族团结的典范”。

/ L /

李素丽 曾任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公汽一公司第一运营分公司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被誉为“老人的拐杖，盲人的眼睛，外地人的向导，

病人的护士，群众的贴心人”。九十年代获得无数荣誉，是全国劳模、北京公共交通系统的标兵人物。

/ M /

马家军 1998年，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在《中国作家》整本独卷发表，披露了当年红极一时的“马家军”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秘闻。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褪去光环的“马家军”，这本书也成为中国体育报道史上最具轰动性的作品之一。

/ Q /

取缔传销业 1998年4月21日，中国宣布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已批准登记的最迟应于10月31日前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传销之路在中国走了8年之后终到尽头。

/ S /

“3·15”晚会 1991年3月15日，第一届“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每年的“3·15”成为消费者的维权狂欢日。

扫黄打非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扫黄打非的工作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九十年代后半期起，互联网日益普及，净化互联网文

化环境也被纳入“扫黄打非”工作范围。20多年来，文化市场每一阶段的最突出问题就是“扫黄打非”工作的重心所在。

神舟飞船 神舟飞船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的飞船。其中神舟一号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发射的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飞船于1999年11月20日凌晨6点30分在酒泉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中国成为第三个拥有可载人宇宙飞船的国家。

/ W /

网友 QQ是1999年2月由腾讯自主开发的基于Internet的即时通信网络工具，同年11月，QQ用户注册数突破6万，网上聊天、网上交友成为当时的潮流，网恋也因此越发普遍。

/ X /

性早熟 性早熟儿童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有的专科门诊甚至常常爆满。快餐、催长肉类、保健品等含有激素的食物是儿童性早熟的元凶。

熊猫盼盼 熊猫盼盼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第11届亚运会期间，手持金牌做奔跑状的盼盼形象几乎天天出现在媒体上。它同时也是国内外著名的熊猫明星，曾代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访问美国半年，轰动美国西海岸，当地市民排队5个小时，只能看它3分钟。

/ Z /

张子强 1996年5月，张子强与叶继欢集团合谋绑架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勒索港币10亿多元。张子强分得4亿多元。1998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犯罪集团43名罪犯进行宣判，判处张子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死刑于同年12月5日11时15分执行。



1996年6月，陕西省佳县新华书店内出售的明星海报。(图/马宏杰/FOTOE)

九十年代
文化

我一事无成

但不清闲自在

我白日做的梦

是想改变这时代

我现在还无能

你还要再等待

——歌曲《无能的力量》

无人认领的九十年代

文 | **谭山山**

回望九十年代开端的1990年，一则关于“艺术影院面临困境”的报道令人感慨：这莫非预示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这个时期此消彼长的趋势？

与艺术影院的式微相比，娱乐文化显示出勃勃生机。有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年底，京、津、沪、黑、吉、辽、皖、苏、浙、闽、川、粤等19个省、市、自治区有舞厅、歌厅共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再加上几年后遍布各地的录像厅，这些“厅”，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娱乐场域。

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人物陆续登场：50集电视剧《渴望》播出，张凯丽、李雪健成为第一批因电视走红的明星；杨澜开始主持《正大综艺》，看到前辈就喊“老师”；刘震云的编制虽然还在《农民日报》，但他已经不写报道了，街上流行的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余华宣布，“我要发生变化了”，他计划写一部当代三部曲，写第一部的时候就把自己写哭了——那就是《活着》；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躲避崇高》，而他赞赏的王朔，从策划影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他都参与了）到出版个人文集、骂这个骂那个，话题一直不断；余秋雨出版了日后被称为“文化口红”的《文化苦旅》，贾平凹则凭《废都》拿到100万元的天价稿酬；从美国回来的英达，开始拍《我爱我家》；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勇夺金棕榈奖，戛纳电影节因此被中国电影人视为福地；王小波去世，催生一个名叫“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松散组织；而在1999年12月31日，孟京辉用《盗版浮士德》跨世纪专场和180位观众一起走入新世纪。

在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的结尾，葛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这句话也适用于今天看九十年代：一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很怀念它。

要认识九十年代，首先需要从八十年代开始，这是学者张颐武的看法。诗人北岛也有类似见解：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看法，九十年代的危机应该追溯到八十年代。

张颐武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自己是经历了转变的。八十年代初，他是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崇拜者，狂热地迷恋个人解放和“主体”的话语。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有一个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在张颐武看来，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题。

李泽厚写道：“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在张颐武看来，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而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召唤所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要求。

九十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张颐武概括为“一种‘物质性’的出现”。他进一步解读：八十年代的“新时期”基本上是不及物的，过大的精神追求几乎遮蔽了“物质”的一切诱惑和吸引；但到了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却将八十年代抽象的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将康德式的、用头脑站立的玄虚的“主体性”，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由此，八十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被九十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具体化，八十年代康德式的自由的“主体”摇身一变，这才成就了九十年代黑格尔式的“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九十年代是超越八十年代的，因为它终结了八十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找到了一个“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九十年代其实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时代，正是由于有了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变，我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

在和查建英对谈八十年代时，陈丹青也提及九十年代：“我一点不愿说九十年代不好，真正的变化在九十年代发生了。”“直到那时，我才慢慢意识到八十年代那种争论，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种种傻逼式的热情，好像消失了。群居生活没有了，个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多了，大家相对地明白了、成熟了，也更世故了”。

王蒙对王朔表示支持、引发猛烈批评的《躲避崇高》一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93年1月号。他称王朔“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说他的文字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

他还这样写道：“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

1992年，王朔出版四卷本《王朔文集》并因此名利双收，“王朔热”重新升温。而他既有像王蒙那样的支持者，也有像以王晓明为首的海派学者那样的反对者。

1992年秋，在华东师大研究生宿舍9舍625室，由王晓明担任召集人，青年学人徐麟、张闳、陈福民等人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参与者批评了两种当时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所体现的商业倾向；并认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篇对谈录后来被命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然而，不知何故，直到王蒙发表《躲避崇高》半年后，它才在《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发表。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集中了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等数位学者，再次讨论人文精神缺失问题。时任《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和编辑吴彬事先得到通知，来上海旁听了这次讨论。回京后，吴彬告诉王晓明：《读书》打算连续6期发表讨论稿。一场名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论辩就此在全国展开。

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化”会带来什么后果？它到底是“危”还是“机”？查建英表示，王朔被惹怒是必然的：这些学者一边吃着国家饭一边讨伐市场，可要是一点商业空间都没有，像王朔这种个体户还有活路吗？

学者甘阳则表示，王晓明不读海德格尔，事实上，海德格尔早就描述技术时代的可怕图景，也大声疾呼“没人读哲学了”。王晓明参与论辩的第一篇文章，就说怎么现在人们不读诗、不读小说了，一切都变得庸俗，“但我们读海德格尔这些的，至少从理论上已经知道这个现代化世界一定是这样的，经济的时代、技术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时代，读什么诗嘛，谁读嘛”。

张颐武的看法是：消费文化的出现和中国的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后果都不可能造成中国的精神瓦解，中国“现代性”的终结，也不会带来中国发展的终结；相反，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和一波新的全球化的进程相适应的。

那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个过去不久的年代？2015年11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文化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年评论家高峰论坛上，四十多位参与者围绕“九十年代：从公众参与到私人生活”这一主题发表意见，试图以文学的视角来看待九十年代。

上海作家金宇澄对九十年代的描述就是文学式的：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我们看到的景象，还是灰暗的，像黑白照片一样；但后来一下子就变成彩色的了。这自然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活力，人们开始有钱，物质也开始丰富多彩的缘故。作家李洱则这样比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说八十年代是“虚构性”的，那么九十年代就是“非虚构性”的，“九十年代第一次把所有文学问题和中国的现实经验结合起来了，用一个时髦话说就是接地气”。所谓先锋作家一说到“新写实”就说是狗屁，现在想想，其实那是因为接地气，才为先锋作家所不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给了九十年代一个定义：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他指出，八十年代有很多人认领，“我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认领者甚众；九十年代则无人认领，那是因为九十年代远未终结。

“由于它不那么有吸引力，由于它的戏码还没有完全写完，以至于还无人认领，以至于谁也搞不清楚我领的是一笔资产还是负资产，以至于它如此的复杂、流动、游离不定。八十年代大家都已经分了角色，每个人都在争说我在这一件事上是什么角色、在那件事上我是什么角色。九十年代没人干这个事了，是因为它确实依然是一个开放的、未定的、比八十年代更为复杂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九十年代实际上也是探讨现在。”

“九十年代一下子把我们放到了一个一切未经命名的境地。这未尝不是一种解放，也未尝不是给九十年代和现在的主体提供了一个非常持久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李洱讲的，九十年代之后确实文学找到了真正的，不是属于政治家，不是属于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而是属于自己的，走进中国复杂经验的方法和路径。”

正如作家吴亮所说，我们不重视九十年代的原因是它离现在太近了，以至于都没想到要把它历史化、对象化。也可以这么说，它甚至还不是历史，就是当下。

一场平民文化的狂欢

文｜**宋杨**

最近，“北京瘫”突然流行，《我爱我家》中葛优饰演的纪春生成了“北京瘫”的最佳代言人。剧照中，葛优穿着花T恤，半坐半躺地堆在沙发里，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塑造了傅明、贾志国、和平、贾志新、贾圆圆等经典角色的《我爱我家》首播于1993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部经典情景喜剧总会因各种网络话题被反复提及，电视剧中的经典桥段也成了段子手们的心头好。

九十年代是国产电视剧的黄金期，当时拍摄的很多电视剧至今仍被奉为经典。那十年，电视剧取代了图书、电影，成为受众最广的文化载体。

九十年代就是平民文化的起点。在那之前，国内的文化领域被官方的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所统治，普通老百姓无法掌握应有的话语权。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老百姓的平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不再迷信权威，而是企图以自己的方式，享受应有的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利。

电视是他们选择的文化狂欢的载体。九十年代，彩色电视机在国内开始普及，有线电视信号覆盖率也快速增长。有数据显示，1990年国内有469座电视塔；到了《我爱我家》播出的1993年，电视塔数量已经增加到684座，电视人口覆盖率由77.9%增长到82.3%，电视机数量

也由16593万台快速增长至25563万台。每天下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成了城镇居民的生活常态。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很快渗透到广播电视领域。在所有电视节目类型中，电视剧的创新和改革是最早的，也是最显著的。

七八十年代，国内已经创作出《西游记》《红楼梦》《四世同堂》这类在质量上有说服力的作品。但电视剧的类型很单调，主要以经典名著改编和舆论宣传题材为主，每年产量不到千集，远远无法满足电视观众的需求。

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该剧播出时万人空巷，收视率直逼《新闻联播》，凯丽饰演的刘慧芳的命运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以戏剧批评的角度来看，《渴望》的艺术性并不高，在剧本设置和拍摄技术上存在很多局限；而刘慧芳的人物塑造过于完美，多舛的命运也显得有些刻意。这样一部今天看来有些拖沓、矫情的电视剧，当年却创造了很多纪录：它是"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第一次采用多机拍摄、现场切换、同期录音的制作方法。和八十年代那些名著改编剧不同，《渴望》是彻头彻尾的通俗剧，是反知识分子化甚至反艺术化的。它以普通城市居民为主角，从剧情设置到对白都努力贴近生活，观众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因而感到亲切，对剧中人物有同理心。

《渴望》导演鲁晓威曾说："如果说，《渴望》的尝试还有所收获，我们就可以郑重地宣布，电视剧艺术在中国大陆已到了成熟的年龄，它可自立于艺术之林之上，不必跟在其他艺术门类后面爬行了，它可以有自己的姓氏了。"



1996年，北京，央视春晚彩排现场，赵丽蓉和巩汉林排演小品《打工奇遇》。（图/王文澜/CFP)

编剧李晓明更是毫不避讳业内对于这部电视剧过于通俗化的批评：“国产电视剧有一个特点：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最具娱乐功能的电视剧，却倚仗不受经济规律制约，至今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框框里我行我素。”

《渴望》为国产电视剧打开了一道通俗化的大门，也让正处于转型、转制期的中国电视人看到了电视剧市场化的潜力。1990年之后，国产电视剧的创作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渴望》在通俗剧创作上取得了开门红，此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创作者把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平民文化的兴起已是大势所趋，曾不屑于电视剧创作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关注电视领域。包括王朔、马

未都、梁左、英达等在内的一批作家、电影创作者，开始做起了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

1991年，由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等人编剧，金炎和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热播。和《渴望》相比，这部电视剧找到了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之间微妙的平衡点。

《编辑部的故事》是当时的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喜剧类型，它以六位编辑为主角，贯穿起所有故事线，各种取材于现实社会的鲜活故事穿插其中，张国立、濮存昕、李玲玉等影视明星常常作为客串出场，整部电视剧呈现出当时的影视作品少有的松弛状态。

八十年代，王朔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等小说成为新一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对白特色鲜明，有着京城世俗生活特有的幽默。这种语言气质同样体现在他参与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中，使之成为京派电视剧的代表作。从那之后，一批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电视剧扎堆出现，虽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小觑。

除了提升了通俗剧的制作水平，《编辑部的故事》也开创了国内电视剧制片的新模式。在那之前，电视剧的制作和播出不容分割，电视台自制基本是当时电视剧创作的唯一模式。但《编辑部的故事》采用了企业赞助的融资模式，并效仿国外电视剧，在剧中植入广告，播出时又将广告与电视剧捆绑播出。这种首开先河的创作和播出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接连两部现象级电视剧的成功，加速了国内电视剧的制播分离。当时电视节目普遍模式化，电视剧凭借丰厚的商业价值，成为最先实现市场化的电视节目类型。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高价购买了40集电视剧《爱你没商量》的播放版权，虽然最终播出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这种电视公司独立制作、电视台购买版权的方式却被业内所接受。

1993年是九十年代电视剧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播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前者学习、借鉴了美国情景剧的创作方式，却又与国内的社会生活状况做了完美嫁接，引领了此后长达10年的情景喜剧创作高潮；而《北京人在纽约》在开拍之初就有着明确的商业诉求，创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出国潮”，讲述了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奋斗的时代故事。

当电视剧开始真正面向市场，它媚俗的一面更为凸显。和今天更彻底的市场化相比，九十年代的市场化受政策和国家调控的影响更大。而当时对于高雅与低俗、艺术性和大众性的争论尤为激烈。在一片争论声中，官方、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找到了相同的趣味——古装剧。《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拍摄于九十年代的长篇连续剧后来成为暑假必播节目。

据统计，1978年到1987年这10年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为5875集，而1995年之后，电视剧年产量基本都在6000集以上，2000年甚至突破了万集大关。然而，电视剧的拍摄速度依然赶不上当时电视塔和电视机的增长速度。各个电视台不得不购买大量进口电视剧版权，以填补空缺。这就是我们当时能在电视上看到《神探亨特》《特警队》《X档案》等欧美电视剧，以及郑少秋、赵雅芝等港台明星能在大陆走红的原因。

在这轮进口片浪潮中，琼瑶的言情剧、台湾偶像剧和香港金庸热反响最大。受港台影响，大陆制作了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同时也开启了张纪中改编金庸武侠片的漫漫长路。

千禧年来临之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先后制作完成。至此，中国四大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全部完成，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开始通过电视剧学习四大名著。

二十世纪国内电视剧市场的最后一件大事是《还珠格格》的播出，这部琼瑶编剧的电视剧制造了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偶像——赵薇。当时出演《还珠格格》的所有主角和配角，包括嬷嬷和太监在内，都多多少少火了一把。

新闻类节目的改革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1992年之后，中国新闻事业的核心要求由“舆论一律”转向“弘扬主旋律”，新闻报道的多样性有了存在的可能。九十年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在中国新闻从业者中备受推崇，中央电视台凭借平台优势，先后推出了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方法论的《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水均益、白岩松、张泉灵等一批具备新闻评论能力的节目主持人都是从这两档节目中走出来的。

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新闻类节目，《东方时空》的另一个贡献是开辟了电视节目制片人制度。节目以制片人为中心研发、制作和播出，各个栏目之间独立存在且形成竞争关系，这正是当时亟待市场化的电视媒体所迫切需要的新模式。《东方时空》之后，中央电视台自制的《经济半小时》《正大综艺》《半边天》等节目都先后实行了制片人制，这一制度也逐渐被各个地方台所采纳，如今已成为电视节目的常态模式。

在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和崔永元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成为经典。小品照搬了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话》节目形式，崔永元作为主持人，采访白云、黑土这对农村老夫妇。

小品开场，崔永元的出现博得阵阵掌声，足见当年《实话实说》节目之火爆。作为一档脱口秀节目，《实话实说》真正具备了新闻报道的平民意识。在节目现场，崔永元与嘉宾围坐在演播厅，大家就最

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展开议论，议题有大有小，但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听腻了说教、刻板的新闻播报的观众来说，《实话实说》的脱口秀模式更具观赏性。

当电视从舆论宣传媒介变成大众的消遣工具，电视节目的娱乐性就越发重要。九十年代末，以《快乐大本营》为首的综艺节目开始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些节目都以外国综艺节目为蓝本，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改革。观众抱着猎奇心理，围观影视剧、MV之外的明星，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得到了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

随着电视节目制作技术的完善，九十年代的电视直播像今天的网络直播一样，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节目类型。上世纪末，中国的一系列大事件也迫使中国电视人的直播能力急速提升。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奥、1997年香港回归、长江三峡截流、黄河小浪底工程、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澳门回归，经历了这一系列大事件，直播几乎成了中国电视的常态节目。

九十年代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期，知识精英的阅读时代已经远去，真正属于大众的互联网时代尚未来临。阅读时代与互联网时代都属于个体，唯有电视时代，它属于家庭，属于真正的交流和分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偶尔会怀念它。

《我爱我家》：一部剧演活一代中国人

文 | **赵渌汀、郑猛**

抬杠拌嘴皆世态，饭桌“嘬”出人间情。转眼间，《我爱我家》已经为我们抖了二十多年的“包袱”。

1994年，这部中国首部情景喜剧首播。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喜剧还可以这样演：台上演员飙台词“包袱”不断，台下观众正襟危坐，笑声不停。但笑归笑，透过电视机屏幕，你却看不到观众的笑脸。

对喜剧来说，“包袱”多不是难事儿，扔得“稳准狠”却不容易。但《我爱我家》做到了：它扔出最具市民气息的“俏皮台词包袱”，在准确击中观众笑点、社会热点和时代痛点后，狠狠地为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情书写留下了一笔。

“《我爱我家》只会出生在九十年代，也只能出生在九十年代。”《我爱我家》导演英达说。

八十年代在美国留学时，英达去现场看过家庭情景喜剧《考斯比秀》。回国后，他决定把这种喜剧方式移植到中国。他向父亲英若诚请教，英若诚的意思是，“东西是好东西，但要看怎样才能更本土化”。

于是他找来王朔，《我爱我家》的剧名正是王朔拍板决定的。后来王朔因故无法参与编剧工作筹备，就向英达推荐了梁左，梁左就此成为这部剧的文学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梁左是英达的师兄，此前

他专心于相声创作，出过《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佳作。“给丫关起来，搞不好就弄出一《红楼梦》，最损也是一《飘》。”王朔当时这样评价梁左。

正如曹禺之于焦菊隐，英达找到了自己的曹禺，那就是梁左。不过情景喜剧这么个舶来品，梁左也是头一遭接触。英达给梁左看《考斯比秀》，并提出安排观众坐在台下，且观众的笑声必须贯穿在每个情节中。其实早在《编辑部的故事》拍摄时期，该剧编剧之一王朔就和英达商量过，是否可以在剧中加入观众笑声，不过后来因为没有现场操作经验作罢。英达憋着一股劲，想把这种纯情景喜剧的表现方式在导演处女作中展示出来。

因为是家庭戏，家庭成员的角色设置非常关键。英达和梁左对于人物设置有过不同意见。按英达的设想，退休老干部老傅家中有一个大女儿、一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大女儿招了个倒插门的南方女婿进家门。但梁左认为应该把大女儿换成儿媳，儿媳住在婆家才合情合理，儿媳和公公之间有些话说了不合适，不说也不合适，一说就容易说坏。最终按照梁左的意见，老傅的儿媳和平住进公公家，却依然改不了“旧社会艺人习气”，剧中的许多包袱就由此而来。

确定了角色，就得选演员。《我爱我家》剧组应该算是那个年代最光明正大的“裙带”剧组：和平的饰演者宋丹丹是英达当时的妻子；大儿子贾志国的饰演者杨立新是宋丹丹在北京人艺的同事；小儿子贾志新由梁左的弟弟梁天饰演，这个角色也是为梁天量身定制的；女儿贾小凡由赵明明饰演，她当时是英达堂弟英宁的妻子，而英宁是本剧的制片主任；在剧中后80集出现的邻居“老胡”由英若诚饰演。此外，英达的堂弟英壮作为编剧之一，曾塑造出《不速之客》一集中“一不偷二不抢，不反对人民不反对党”的“二混子”纪春生（葛优饰）。

一个六口之家就这样开始了在杨柳北里18号楼202房的九十年代生活。英达说，“家迷”（《我爱我家》影迷）对这部剧的厚爱，得益于

人物和情节设置得特别生活化，“特别真实，给人亲近感。很多人说，那个爷爷就和我爷爷一样嘛，那些事儿在我家都发生过啊”。

老傅（文兴宇饰）身上集中了“少时争当红小鬼，改开之后老革命”的那类老人的特点。他自豪于自个儿的出身和经历，“我是谁啊，能文能武，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亦兵亦官，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整天梦想着流动红旗和“健康老人”称号，张口闭口马列毛，又是个正经八百的“马后炮”（口头禅“我早就说过！”）；他冷不丁也来点冷幽默。大儿子精神出轨给其他女人写情诗时，他痛心疾首，“文字的东西怎么可以落到别人手里嘛”，但同时又经不起亲家母的捧词儿，“您是谁啊？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这是一个爱唱高调的“傅局长”，也是一个爱和家人抢东西吃的老人。

大儿子贾志国自诩知识分子，一向瞧不起京韵大鼓艺人出身的妻子和平；偶尔精神出次轨，免不了被岳母大骂“那有人养没人管缺家规少调教千人恨万人骂缺了德的陈世美黑了心的贾志国”；他在单位唯唯诺诺小心行事，一次醉酒后高呼“再也不能这样活”，但清醒片刻又回归书生意气，且能在升职演讲前在家人面前排练数十遍。贾志国代表了九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娶妻生子，事业小有所成，在机关端着铁饭碗力求晋升，但有时也会羡慕那些下海经商的朋友；他们偶尔会给陌生女青年递张纸条写首诗什么的，却也并不否认“诱惑来临时，禁不住考验是所有男同志天生的弱点”。

剧中最敞亮的台词由儿媳和平和小儿子贾志新包办。宋丹丹在当时凭小品《超生游击队》红遍全国，而梁天也在《顽主》《海马歌舞厅》等影视剧中崭露头角。一个是浑身旧社会艺人“细菌”的“和平女侠”，一个是混吃骗喝“家里蹲”的“宇宙公司贾总”，彼此在剧中的插科打诨，勾勒出九十年代社会的两个特殊群体：曲艺演员成天没事干，偶尔“走穴捞一笔”，幻想“整容美一把”，只要得闲就双脚盘起坐沙

发，一言不合便“死去活来”玩失忆；社会青年整日家里蹲，不时鼓捣“盘条生意”，最爱外出“蹭吃蹭喝”，平日里大睡到天光光，全天候往家里带姑娘。

用老傅的话说，女儿贾小凡是个“崇拜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的中文系女青年，既懂“阿菲理同与阿斯达黛”的波斯爱情故事，也崇拜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革命先知；孙女贾圆圆（关凌饰）人小鬼大，成绩不错却常因顽皮被老师叫家长，疯狂迷恋“阿荣”（张国荣）的同时，也常感叹“爱情不分老少，人生没有单行道”；此外还有一个外地小保姆小张（沈畅饰），满口四川话，一腔少女情，与贾家二少志新共赴海南后还暗生情愫，“我是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爱我家》剧组的合影，后排右二为该剧文学师梁左。（图/王小京）

“都说这部剧台词好，其实是人物刻画得生动深刻，但如果没有靠谱的情节，人物怎么也兜不住啊。”导演英达说。

“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人工流产大家谈，少女失身面面观；性变态，同性恋，小蜜为何傍大款；留守男士和女士，单身贵族生活圈；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少管所里的少年犯……”

这段话出自贾小凡，当时她正向老傅介绍学校的论文都有哪些主题。老傅没等听完便嚷道：“那你还是来第三者吧！”

这段描述，似乎在往后的任何年代都能找到原型。《我爱我家》就此为九十年代乃至此后的数十年时间，留下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社会样本。

在这部剧中，你可以窥见“官倒改革双轨制、改制走穴练气功”的时代特征，也可以见识“大款小蜜打工妹、宅男剩女二混子”这些特定群体。农民工讨薪未遂造就无奈、可笑的“双鬼拍门”；初恋情人求“走后门”，考验老同志“原则问题”；包办婚姻酿成大错到底“谁比谁傻”；插队知青的青涩记忆埋藏在“那遥远的地方”；香港回归了，全家人惦记着彩票中奖后去“资主花世”（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游一遭；全民下海了，夫妻二人入股水果买卖，要到自由市场“赚一笔”；精简机构了，单位同事大闹领导住宅；老宅拆迁了，一家老小急求左右邻里……

英达说，正因为熟悉才会喜欢，正因为真实才会逗乐。

看完《我爱我家》，也就看尽了九十年代的社会风俗与家庭风气，也就看懂了人情社会中的国家变迁与社会转型。当然，你肯定能笑着看完。

专访英达
九十年代是喜剧最好的年代

《新周刊》：你曾出演《围城》中的赵辛楣，此后又作为导演塑造了贾志国这个角色。从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到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你觉得两者有何不同?

英达：赵辛楣这个角色是照着钱锺书原著去揣摩的。他们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有点儿迂，但十分正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事情，可能搁在这个年代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贾志国属于那种胆小怕事儿的知识分子，他就几乎没有拍案而起过。像《再也不能这样活》那一集，虽然其他同学成书法绘画大家了，也都赚钱了，对他刺激很大，但他在发作了一小会儿之后还得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也是迂，比较窝囊，但他没办法，他坐机关呢。

《新周刊》：陈佩斯说，喜剧是超理性的一种艺术创作，好的喜剧都有悲的内核。你认同吗?

英达：很多好的喜剧都是笑中带泪的，这就好比吃东西，小孩儿都喜欢吃甜的，再长大一点他可能觉得掺点酸的味道更佳，越长大口味也越复杂。

但我认为喜剧不用强求去悲。其实喜剧只有一件事需要强求，那就是必须让人乐。

《新周刊》：据说《我爱我家》刚播出的时候，有不少老同志极力反对?

英达：是。当时主要是对剧中傅明老人的一些行为争议较大，有人觉得这是变相讽刺攻击老同志。好在我们这部剧的顾问是王光英，那不得了，那是国家领导人啊。他看了以后反而乐得不行，反问其他人："这样演有什么不行的？"《我爱我家》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新周刊》：有人评价《我爱我家》是一群骨子里精英的人响应和引领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产物。对此你怎么看?

英达：基本上没错，只有我不是精英。（笑）王朔当时给我们所有人指明了方向，我们顺着那个方向往下走就行了。

像王朔、梁左、宋丹丹、梁天、文兴宇，包括作曲关峡，这些人都是各自行当里面的尖子，都是精英。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他们。一句话概括：一帮聪明人碰一块儿了。

《新周刊》：贾志新这个人物，"看上去邪乎但骨子里正得很"，浑身是毛病，但大家都喜欢。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不是受王朔小说影响？可不可以说也呼应了王蒙所说的"躲避崇高"?

英达：我评价过王朔小说的主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具体到贾志新这个人物，我们当时还真没打算把他往高了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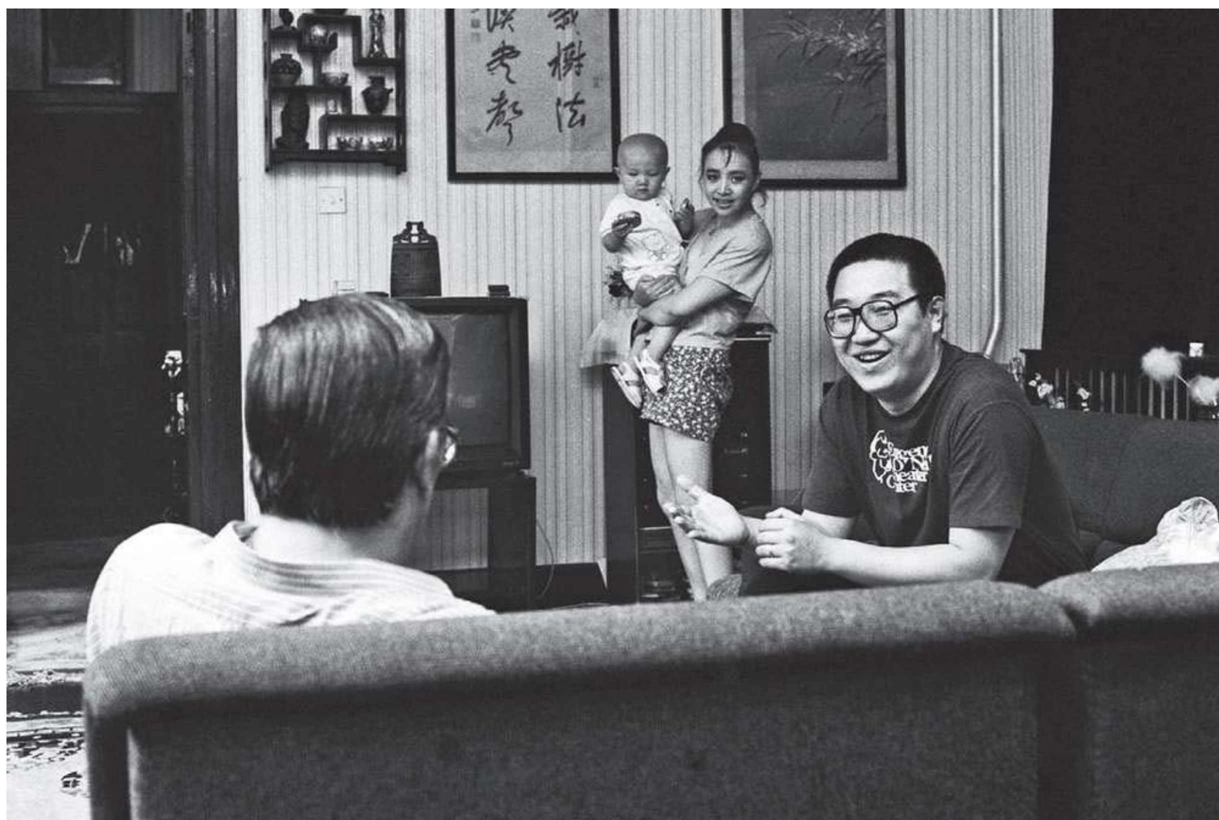
说实话，梁天那长相演不灵正面形象。演崇高你演不了啊，好几次我们都想把这个人物拔一拔，后来让他一演就又给演回去了。我们当时倒没考虑什么躲不躲避崇高，反正把这个赖在家里不干活的小青年塑造好就行。

《新周刊》：不少"家迷"认为，《我爱我家》是一部将通俗和深度融合到极致的作品。

英达：深度？有是有，但只是在通俗和逗乐的过程中顺便完成的。其实这并不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剧。我父亲刚来剧组时觉得这种情

景喜剧特别有趣，里面有很多新鲜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先做到通俗再顺便完成了深度。

有时候我觉得拍戏和做事儿一样，不能往一个方向走到底。有时候你变个方向试试可能效果会更佳。有一集，和平在那自夸，说志国当初热烈追求她。台词如果一直往“当时你把我追的啊，满大街跑，满大街躲”上面说，也无趣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一辙，加了句台词：“当时你把我追的啊，满大街跑，就那样，我都还不怎么爱理你。”“都不怎么爱理你”，可结果还是理了呀，这下观众就都乐了。



1991年8月，导演英达和父亲英若诚（背对者）讨论问题，旁边站着的是英达当时的妻子宋丹丹，她手里抱着两人的儿子巴图。（图/郑震孙/新华社）

《新周刊》：《我爱我家》之后你也拍了很多情景喜剧，比如《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等，也都获得了成功，但似乎口碑和影响力都无法与《我爱我家》相比。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英达：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之前很多人都问过我。创作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和画画不同。画画的话，你一个人拿笔创作出来就可以了。电视剧的影响和复杂性远大于画画，是一群人合力的结果。

所以我可能会说，是因为团队问题、合作问题，等等。我后来也尝试过把当初的一些合作者重新聚起来做一个剧，想把原来那些有趣的、成功的经验找回来，可是效果还是没《我爱我家》这么好。

后来我就说，《我爱我家》是梁左的戏，这部戏全靠他撑了起来。梁左去世，我们也就不可能再创作出《我爱我家》这样水平的作品。

但其实这种说法还是经不起推敲。《我爱我家》之后我和梁左还合作过好几部戏啊，这怎么解释呢？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时代的原因吧。喜剧向来难为，也许《我爱我家》就适合在九十年代诞生吧，恐怕它也只能在九十年代诞生。

《新周刊》：你怀念九十年代吗？

英达：我非常怀念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于情景喜剧和我个人而言，都是最好的年代。

那个年代咱是穷，就像贾志国在剧中说的那样，“咱家这样的情况就不错了，在旧社会也算是大地主家了”。大伙儿都把自个儿位置摆得很低，这样才有空间和环境去做喜剧。

如果今天的环境还像九十年代那样宽松，给我一个和《我爱我家》一样好的本子，我可能还能拍出这样的作品来。但一切都没有假设。我敢说《我爱我家》如果搁今天这个时代创作，一出来光是喷子就能让你栽倒在地。

现今国家富强了，大家伙儿都有钱了，于是心气都高了，觉得我们这么强大，这么有钱，你搞部几个穷鬼小老百姓在那儿穷开心的情景喜剧，谁稀罕啊？！在这种心态下要创造出一部出色的喜剧，实在是太难了。

我怀念九十年代，那个年代大家也都忙着赚钱，但毕竟没后来那么疯狂。九十年代还有像贾志新、和平这类人蹲屋里聊大天儿的，互相打趣，这才是精彩的语言和市民文化。搁现在的话，都没人稀罕那些拌嘴和耍贫了。

《新周刊》：你觉得九十年代和之前的八十年代，以及之后的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英达：我记得王朔在《千万别把我当人》里写过一句话，“有个不知憋着什么邪火儿的小子在人圈中跳着脚地骂”，“不知憋着什么邪火儿”这个说法特别有趣。我觉得八十年代就是那样一个大家都不知憋着什么邪火儿的年代，之前都还绷着呢，突然就给你松绑了，这也导致很多行为和思想都特极端。八十年代象征着一种突然爆发、到处发泄的状态。

到了九十年代，那些个邪火儿也都发泄完了，于是也都成熟了。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大家在九十年代终于可以心平气静地笑一笑，这才是最重要的。九十年代对喜剧来说是最好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爱我家》。

传媒人刘春
那是一代电视人的黄金时代

文｜**何家**

每天活跃在微博上的“社会贤达”刘春在九十年代曾是一名炙手可热的电视人。提起当年，刘春说：“我非常怀念那些日子，并且始终认为九十年代是我们这一代电视人的黄金时代。”

1994年，刘春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一开始在青少部做《十二演播室》节目，度过了不太愉快的两年。之后，刘春加入新闻评论部做《新闻调查》，历任编导、策划和执行制片人，做出了《透视山西运城渗灌工程》《一言难尽择校生》等有影响力的片子。

当时的央视新闻评论部云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新闻人，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岩松、崔永元、敬一丹等，也包括很多来自纸媒的行家，浩浩荡荡几百人从各地通过灵活的机制聚集到这个电视界的“延安”。刘春回忆道：“同事的电视素养和新闻追求，跟我接触过的其他栏目完全不一样。”

《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等一批优秀栏目就是在这群新闻人手中诞生的。“记得我离开央视前做的最后一期节目，是报道湖北虚假楷模的。这个人本来要被树成典型的，所以地方上会给我们很多压力，调查环境也比较艰苦。我们最后还是做出来了，因为大家好像都充满了这样的追求。”

优秀的节目让当时的央视人自带光环。“那个时代的纪录片、那个时代的新闻、那个时代的专题节目，都非常繁荣。那个时候的电视对

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介入，都是非常深厚的。”刘春说，“那时候真的有一种无冕之王的感觉。顶着央视国家队的名义，又可以体现新闻人的追求，会觉得特别自豪。这个工作会给你很多无形的东西。”这大概就是白岩松说过的职业自豪感和成就感。因为这份工作“有期待，有尊重”，让刘春在那个年代“做了一回最棒的青年人”，这些都是工资之外的精神回报。

九十年代优秀的电视节目集中在央视，刘春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省级卫视还没有起来，最初只有七八个，到后来才是每个省有一个。省级卫视是通过民生类新闻和娱乐类节目火起来的”，因此无法撼动以舆论监督和新闻传播为己任的央视老大的地位。



1999年3月31日是凤凰卫视开播三周年纪念日，在台庆酒会上，凤凰的当红主持人全部到齐。(图/张燕辉/新华社）

凤凰卫视的诞生，是九十年代电视界的一个大事件。凤凰卫视是刘春2000年从央视离职后的第一个东家，正是在刘春的带领下，凤凰

卫视推出了《鲁豫有约》《世纪大讲堂》《李敖有话说》《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冷暖人生》《风云对话》等皇牌栏目。“凤凰卫视是1996年诞生的，它的风格和央视新闻评论部有点相似，主要是靠几个东西：第一是靠对新闻的快速反应，尤其是它的直播；第二是个性化解读，也就是它的评论；第三就是后来我介入之后做的大量历史文化类节目，如《文化大观园》等，试图对被遮蔽的中国现当代史做一些还原，比如抗战。九十年代凤凰卫视影响比较深的栏目应该是《新闻早班车》和《锵锵三人行》，不过凤凰卫视正式起步应该是‘9·11’直播之后，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所以九十年代的电视界还是央视为大。”

缺乏实力强劲的对手，央视成为当之无愧的电视头牌，也理所当然享受了各种资源，加上众多人才各显神通，便造就了九十年代的辉煌：央视不仅在新闻节目中一马当先，在体育、少儿等类别节目中也拔得头筹，有些领域时至今日依然不可超越。尤其是央视的纪录片，在当时是电视人最推崇的，“那时纪实类纪录片非常发达，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新闻作品”。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舌尖上的中国》和《大国崛起》中看到央视纪录片不俗的水准和深厚的功力。

那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不仅是电视的盛世，也是各种媒体蓬勃发展的时期。经历了文化启蒙的八十年代，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之下，大批诗人、文人纷纷加盟媒体，提升了媒体的文化气质。很多媒体也由此诞生，直接为后来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媒体的全盛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刘春受有关部门委托，去广州调研报业大战。“当时的广州，《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南方报业三足鼎立，我实地调研后，充分感受到广州报业的市场化发育程度，尤其是《广州日报》，给我的刺激非常大。另外《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这样有着自己姿态和个性的杂志也出现了。像《新周刊》，一是靠选题策划，二

是靠批判电视。当时的电视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处于媒体金字塔尖的位置，但是《新周刊》毫不客气地对它进行了批判，当然备受关注。而且《新周刊》还给电视颁奖，《新周刊》的电视榜一直很受电视人关注，这也导致当时最优秀的电视人都是《新周刊》的朋友。”

转眼间，20年过去了。“20年恰好是一代，”刘春感叹道，“可以说那一代的电视人、媒体人基本上翻篇了。”刘春参加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工作单位的20周年庆祝活动。一个是央视栏目《新闻调查》，另外一个是凤凰卫视，两者都创始于1996年。“参加完这两个活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老了。老到什么程度呢？就好比京剧里的一个人物走在流行音乐非常发达的这个时代。”

现在电视的受众主体，也就是最有话语权的人，是90后、00后。互联网对于电视的冲击，并不仅仅是技术和载体，而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审美习惯和接受信息的方式。“今天娱乐产业最大的竞争叫IP（知识产权）竞争。IP基本上基于互联网，无论是动漫还是文学，它跟传统的文化作品比如贾平凹、余华的小说没什么关系。这种产品对于我们的冲击是撕裂性的，是互联网这种巨大的渠道和平台效应所导致的。”

如今，一代意气风发的电视人相继老去，他们之中有的依然坚守岗位，有的转换阵地，有的离职创业。刘春跳出电视圈好久了，他说现在已经不看电视：“我经常会被问到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其实我想说我看不懂，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它们转型成功了吗？好像也没有。至于电视将来怎么弄，我也看不清楚。”

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当年的电影有种强韧的力量

文｜**曾园**

记者凌志军在《变化》一书里如此描述1992年的气氛：当时《粤港信息日报》在试探“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建议“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年9月，张艺谋凭《秋菊打官司》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巩俐获得了“沃尔皮杯”最佳女演员奖。民间有个说法：1992年是“张艺谋年”。

张艺谋设法让《秋菊打官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并小心翼翼地形容它“是一部轻松、温馨的影片”，没有《红高粱》的悲壮、《菊豆》的阴冷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惨烈。后两部电影早就拍好了，却不能公映，如今他借着《秋菊打官司》获奖的契机，把它们拿到长城饭店去首映。“我是拍电影的，即使天塌下来，还得拍电影。”他这样说。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也提到了这部电影：“棉纺工人出身、早已名声遐迩的张艺谋导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它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这部电影讲的故事是，一个叫王庆来的农民为了自家的承包地与村长发生争执，被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状。放在15年前，这是一个很让人难以理解的故事，而在这一年，它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是非观念日渐模糊的商业社会，人们突

然怀念起秋菊那种认死理的性格，‘讨个说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流行词。”

吴晓波感叹道：“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无论是凌志军还是吴晓波，都将张艺谋的电影看作九十年代一个特别的社会现象，甚至经济现象。

陈凯歌此前拍摄的《孩子王》（1987）与《边走边唱》（1991）更是一个经济现象——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票房。

至今，很多人仍然认为金钱腐蚀了天才，或者反过来说，张艺谋和陈凯歌被财富或资本打趴下了。

但资本并不那么简单。一次谈话中，作家阿城淡淡地说，商品是很好的东西，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假冒伪劣的不是商品。

对观众来讲，钱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导演会不会拍。张艺谋就读北京电影学院时的老师周传基多年前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大片是工业生产。在中国的影片生产体制中谁管光？连这个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摄影师不管光，那要他来干什么？中国没有一个合格的制片人。懂得经济学吗？懂得电影制作吗？懂得市场营销吗？靠吹？还有拍大片，一个录音师行吗？什么都不配套，只是串行的制片人想发横财，能拍成什么样的大片？虽然票房不错，但都是靠坑蒙拐骗得来的。”

从这样的维度去理解张艺谋和陈凯歌也许更有效。他们拍过一些不好的电影，这不假。但谁也不能否认，九十年代的确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电影甚至可能是整个国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产中最好的部分。

新世纪来临，互联网填平了信息鸿沟，有些曾经高贵神秘的事物暴露了浅薄的本质。但电影没有。《活着》在网上有弹幕版本，日漫美剧哺育的新一代小朋友，向这部拍摄于他们出生前的电影踊跃献出膝盖。他们真能看懂并体会所有细节的韵味与言外之意。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呢？他们抗议该片没有进入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网站）前250名（进榜的两部华语电影是《无间道》和《叶问》）。他们的父母对中国电影的期望也许是获奖并赢得票房，而他们的想法霸道得也许有点过分：全世界都必须喜欢《霸王别姬》。

但是，那个黄金时代太短了，短得让回忆者惊愕莫名。与张艺谋、陈凯歌都有过合作的编剧芦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比较高兴，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贾樟柯2015年上《锵锵三人行》时谈到电影与"经济""工业"不可分。但我们几十年来听到最多的是将电影与"天才""良心"联系起来，原因就是陈凯歌与张艺谋两人横空出世的一系列电影彻底征服了观众。八十年代的《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在电影专业人士群中引起轰动：从未见过如此构图、用光和造型。它们的反叛精神也引起普通观众的好奇。《红高粱》在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一炮走红，反响极其强烈。当时柏林自由电台发表影评说："拍摄《末代皇帝》的贝托鲁齐也要向张艺谋请教。"

国内常见的评价（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的声音）认为，外国人从中国电影中看到中国落后的画面，很开心，所以给了奖。这个说法现在看来荒诞不经，却事出有因：当时的读者看不到外电，也无从了解国外电影奖的历史，他们依据的其实是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同样是意大利导演，同样的中国题材，简直没法不联系到一起。

现在看来，九十年代仍然是不可思议的。芦苇猜测：“可能因为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所以心理比较坚强。为什么第五代导演的早期作品里力量比较强大？比如在《霸王别姬》《活着》里面，我们都能看出那种非常强韧的精神力量。”

“强韧的精神力量”尤其适用于陈凯歌。在他的自传《我的青春回忆录》里，我们能读到大量精彩的沉思与描写，文风磅礴浩荡，有些句式与鲁迅类似。有人说陈凯歌充满了“精英意识”，其实不妨直接说是“东方圣人意识”。他符合孟子所说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气”是什么呢？“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要害是，如果没有了“义”与“道”，那么“气”就散了。

陈凯歌夫人陈红在《大道无极》一书里提到他们在全世界寻找特效公司，放弃了硬件世界一流的法国公司，因为：“《无极》是东方魔幻题材的影片，陈凯歌具有那样深刻的东方文化底蕴，法国人理解得了吗？”有一个段子说，《孩子王》里一把砍刀放到桌子上的特写镜头，陈凯歌在导演分镜头本上写了整整一页纸的内涵阐述。拍《黄土地》时，陈凯歌给扮演翠巧的薛白说戏：“你肩上担的那不是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

张艺谋则不然。他对自己的摄影有信心，摄影之外，则很小心：“不管是做电影，还是做实景演出，我都是在学习。在很多人看来，我这个外行干了很多不是本专业的事情，还乐此不疲。我不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做不好。”

如果沿用金庸小说的说法来看中国电影的九十年代，陈凯歌与张艺谋无疑分别是《笑傲江湖》里气宗与剑宗的大宗师。一个元气淋漓，如山呼海啸；一个招式迭出，如繁花落雨。其他导演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两派，当然，也不乏脚踩两只船的——姜文就是这样的高手。

在这个年代，除了耀眼的天才，一切都很自然：有好电影就有好票房。尝试，失败，再回头。陈凯歌与张艺谋都拍了所谓城市片——《风月》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也都放弃了。但张艺谋的战略似乎是小步快跑，纠错转向；陈凯歌的步子更大，掉头艰难。

八十年代，在《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剧组里，会聚了中国最优秀的电影人。他们拍戏的方法与前辈不同，“攒戏”的办法就是聚在一起聊，其实就是头脑风暴、长久的头脑风暴。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一个天才如何工作，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帮天才，包括陈凯歌、张艺谋、芦苇、顾长卫、吴天明、田壮壮等人在一起激情飞扬、指点江山的混乱场面。演员姜文就是在《红高粱》剧组的“攒戏”中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导演。

据说张艺谋的“长聊”可以长达八个小时，直到所有人昏睡过去。芦苇回忆他们的九十年代：“我们以前拍《活着》的时候，没日没夜地说戏，而巩俐躺在旁边的长椅上昏睡不止。那时他们还是恩爱情侣。”

有东方圣人之风的陈凯歌，他的“气”很强，如《霸王别姬》，架构宏大，隐喻层层叠叠。我们普通观众揪着一颗心，战战兢兢地观看这部既残酷、迷乱又迷人的大戏。但要看过几遍，经由学者戴锦华指点，才能明白程蝶衣经过三次“阉割”：被母亲切去胼指、被段小楼用烟袋捣得满嘴鲜血、被张公公强暴，在此之后，心悦诚服甚至欣然迷狂地认同自己的“女娇娘”身份。这个隐秘的结构充满了强力暗示。陈凯歌自传里有一段回忆“文革”的文字：“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将手指伸进一个‘剥削阶级’妇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对方拒绝呻吟，反倒使她陷于歇斯底里的狂怒状态，手上沾满了受害人的鲜血。”《霸王别姬》的灵感可能源于这里。

1998年，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同样充满了他贯注其中的“气”与“张力”，但这次票房的惨败，可能让他对观众失去了最后的信赖。

整个九十年代，张艺谋的杰作与灵感令人惊讶地绵延不绝。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得到了全球顶尖影评人的盛赞：罗杰·伊伯特在《在黑暗中醒来》一书里说，此片单从情节上看已足够迷人了；他还称赞张艺谋大胆使用好莱坞已无人使用的“特艺色彩三色拍摄工艺”以及居高临下的主镜头运用方式。

之后，令人神往的“攒戏”也许还在进行。在2015年出版的周晓枫的《宿命：孤独张艺谋》里，我们能读到，年过六旬的张艺谋仍然四处找人聊戏，但他的对手与当年的伙伴相比，已经越来越容易犯困了。就这一点来说，张艺谋真的是孤独的。虽然他已经是非常专业的多面手，堪称大“器”晚成——他甚至会导意大利歌剧，还会策划奥运会开幕式。

陈凯歌虽然仍有一腔文化，但缺乏可以“攒戏”的专业搭档，他又如何像当年一样以“气”驭戏？他有过最好的作品，也有过很好的票房。此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面对《霸王别姬》的导演，我们不能无礼。

先锋已死，有事烧纸

文｜**一夫**

2010年6月的一个上午，我走进作家马原的北京住地。同行者有马原的一位学生。当时，马原尚在创作这两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和《纠缠》，而此前他已经有近20年没写小说了。大约是马原出版《纠缠》的同一时期，停笔7年的余华出版了广受争议的小说《第七天》；另一头，格非写完酝酿10余年的《春尽江南》后，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

若说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创作风格，我们不会忘记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残雪、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为代表的作家，如何在中国文坛掀起“先锋文学”浪潮。如今，30年过去，先锋文学野蛮生长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先锋文学作家的纷纷“转向”发生在九十年代，这让30年前那场文学变革成了文学史中的一块“化石”。

所谓先锋文学，究竟以什么特征为代表？让我们回溯到先锋文学的开端：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探讨形式、颠覆叙事逻辑、反叛传统文学观以回归文学本体的诸多作家及作品。莫言、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一批作家，以虚构为利器，高举形式主义旗帜，撕裂了沉寂多年的中国文坛。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先锋文学”。

有评论指出，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先锋文学有着模仿西方文学的痕迹。正因如此，它被很多人指责为照抄西方母本，不具有原创

性。这当然可以找到各种文本上的证据，但也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先锋小说是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所生成的对现代经验的表达，甚至那些支离破碎的模仿与照抄，都深深打上了当代中国现实的印痕。

从文学史的发展看，先锋小说出现以前，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潮流。先锋小说的出现，意欲打破老套的小说叙事，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命运的曲折隐喻。那些似乎完全抽空现实内容的形式实验，或刻意将主题抽象化、普遍化以脱离中国现实的现代主义情绪，背后隐约而片段地浮现的，仍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焦虑和愿望。在先锋小说空洞、虚张声势的面具之下，潜藏着丰富、零乱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的政治无意识。

例如余华早期的作品，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鲜血梅花》《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等文本，余华以冷漠的写作视角扑进充斥着血腥、暴力、死亡及人性恶等隐秘的世界中，展现生活的非常态和非理性。余华这些作品引起了关注，文学评论界的助推，使得“先锋”的类型归纳逐渐成形。

作家苏童则是随着其成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及《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米》《园艺》等作品的相继问世，确立其“先锋”地位。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八十年代末的《收获》杂志上。有意思的是，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都出现了红背包的重要意象——它们来自父辈的赠予，象征了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

这些文本中，既有失败的父亲形象，也有主人公对于背叛和暴力的体验。红背包被抢走了，“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卡车与遍体鳞伤的我”。在先锋叙事的语言实验中，人的生存状态被呈现得格外残酷。痴迷于写作技术的操练，对传统价值信念不

屑，人类灵魂的终极意义就显得空浮而没有重量，世界本应该具有的美好图景被覆盖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时，先锋文学作为“运动”落幕了。之后的先锋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创作者的单打独斗。先锋失去了它的锐利，先锋作家集体转型，使这个本来就不稳定的群体走向解体。随着先锋小说事实上的退潮，它的思想倾向或美学因素开始重新化合，并融入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以及具有文化反抗意味的小说潮流或创作取向中。这一时期，有大量作品问世。

1992年9月，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语》发表；11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活着》发表。同期刊出的还有格非的长篇小说《边缘》、苏童的中篇小说《园艺》、孙甘露的《忆秦娥》、韩东的《母狗》和述平的《凸凹》。1993年5月，北村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在《花城》发表。这些作家虽然仍在追求“怎样写”的技术，但“写什么”更被看重，文本的故事性和人物塑造的完整性第一次成了先锋作家们首先要设置的环节。

先锋派作家逐渐调整了写作策略，开始大面积地转移到历史领域。其小说文本逐渐减弱了对文本的追求，开始关注人物命运，重视故事情节，追求价值意义。如余华的《活着》、格非的《敌人》、苏童的《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以及叶兆言的《状元镜》《追月楼》《十字铺》《半边营》等“秦淮”系列小说，释放了历史的差异性。这种面向历史的转场写作，有的展现时代的变迁，有的展现浓郁的抒情品格。

有评论认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势不可挡，使得先锋文学先是追求“纯文学”，后来开始转向如何创作出“优质商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进入九十年代，很多先锋小说很快被市场收

编，例如一度被电影导演青睐，并被改编为更加通俗化的故事。《红粉》《活着》《妻妾成群》等都曾被改编成电影。同时，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好看”的文学，开始为消费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新的辩护。

前不久，先锋派作家孙甘露在回顾先锋作家为何在九十年代集体转向时指出，这是一个选择性问题：作家在写作时更多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还是更多地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他说，试图接续中国文类传统的现当代作家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其文气思想、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融当下生活于传统意蕴之中，令读者更怀念他们的辞章之美。而当年那些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现当代作家，着力于文本和现实的差异、歧见，以及拼音文字构词法的挪用，伴随着其套用的外来语法，仿佛是一种语言的逃逸。

到了今天，文学评论界在描述这场文学浪潮的现状时，用了不同的“总结词”：终结、转型、哗变、背叛……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往回拉，的确，在九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便有了“落幕”之实。外界指出他们不再先锋、被商业社会和消费主义裹挟时，我们看到这场浪潮亲历者值得玩味的态度：有的否认，有的辩护。

马原曾称小说死了，甚至否认“先锋”。他称先锋小说实际上是一顶帽子：在世纪之交，文学史家们要归纳这一百年的历史时，觉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有意思的小说群体，其中的佼佼者如余华、格非、北村、洪峰、莫言写出了和先前不一样的小说，于是，他们当年就在小说批评里扣各式各样的帽子——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解构主义小说，等等。

在马原看来，1997、1998年前后，慢慢地，江河归海，文学史上出现了先锋小说这个流派。“先锋小说”这顶帽子，是梳理中国小说不

足一百年的历史之后归纳的一个全新的小说群落，或者说一个小说家群落。“我们今天没有资格谈先锋小说，因为我们曾经被扣上‘先锋’的帽子。”这是马原如今的看法。

不同于马原对先锋文学的否定，在另外的场合我们听到了辩护的声音。格非在八十年代凭小说《迷舟》一举成名，成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于1988年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被视为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格非早期的作品像一个个谜语，在结构、语言上作出不少尝试，让人捉摸不定。格非在谈及先锋文学时，强调要把先锋文学同先锋性区分开来。

格非声称，自己特别怀念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那时大家都有目标，努力克服传统的阻力进行写作；如今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支撑着先锋运动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面对时代和读者的变化，格非说他没有固步自封，也在进行调整，“有人会说我是不是放弃了先锋性，我不承认。因为先锋性是一直需要的，写作者需要一直挑战，哪怕写出了非常出色的作品，也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还很成功”。

先锋文学潮流虽然落幕，但其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被先锋作家融入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今天的小说不再追求形式探索，但当年先锋小说的技巧，已经变成常识被广泛运用到写作中。苏童、格非、莫言这几位，就在创作中延续了先锋小说写作技巧。如今，莫言、苏童仍在持续创作，且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他作家每隔一段时间也偶有作品问世。

其实否定也罢，辩护也罢，先锋作家们在九十年代做出了集体转向，又各自收获了荣誉。某种程度上，他们背叛了八十年代的这一转向，得利于九十年代。如果没有先锋文学早前极端的形式探索和语言继承，就没有先锋一代在九十年代的成长。

贴地飞行的《佛山文艺》

文｜**赵渌汀**

1989年年末，《羊城晚报》上出现了这样一则征文启事：“九十年代第一天征文：用文字记录下你在九十年代第一天里的喜怒哀乐，欢迎来稿。”署名是“《佛山文艺》编辑部”。

《佛山文艺》杂志的前任主编和几名老编辑不久便看到了这则在当时还不被公开承认的“广告”。他们无法理解文学期刊登报打广告的行为，愤怒之余，质问《佛山文艺》新任主编刘宁：“你搞这个（广告）什么意思？《人民文学》会搞这种东西吗？《上海文学》会搞吗？《作品》会搞吗？”

当时刚满27岁的刘宁听后眼前一亮：“他们不会这样搞，不代表我们不能这样搞呀！”

这则九十年代第一条由文学期刊发布的广告，就这样在争执声中被刘宁肯定了下来。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第一天”起，这本生于佛山的文学期刊便抑制不住向全国扩张的野心：从主动进入市场，到开展活动介入社会，再到破天荒登载城市打工族书写的“打工文学”，在“躲避崇高”呼声渐起的九十年代，《佛山文艺》始终保持着与底层社会平行的办刊与叙事风格。与众多延续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纯文学期刊相比，《佛山文艺》俨然奇葩一朵。

“一则广告引发的风波”结束后，《佛山文艺》编辑部在1990年头一个月就收到300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稿件内容天马行空，描述着每个作者在九十年代第一天的所见所闻。刘宁觉得效果特别好，于是拍板决定：由杂志社和电视台联合举办一场“九十年代第一天”征文颁奖晚会。

晚会在1990年2月10日举行，地点是佛山体育馆。当天现场来了位特别嘉宾：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活动结束后，刘宁问任仲夷如何评价杂志社的这次活动，任仲夷以“好”字回应。刘宁说：“您给题个字吧。”于是，任仲夷提笔在纸上写下“九十年代第一天”这七个字。

通过举办活动主动介入社会、走进基层，《佛山文艺》在九十年代为文学期刊带了个头。而此前对于登载广告做法的质疑，在任仲夷挥笔提下七个字后便烟消云散。开明领导人的默许和鼓励，为《佛山文艺》在九十年代初大刀阔斧的改革注入了强心剂。此时的刘宁，已经做好了“举起杂志，向时代开刀”的准备。

创刊于1972年的《佛山文艺》，曾长期被“佛山”二字困扰。“佛山虽是小城市，但一定要办大刊物。《佛山文艺》不能只给佛山人看，《佛山文艺》要在全国发声。怎么发声？唯有占领市场。”刘宁说。

市场经济的推进，对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固有的文学体制形成强烈冲击。政府拨款逐步减少，财政的“断奶”，让一些纯文学期刊相继倒闭关门。

始于九十年代初的文学期刊改制，是对此前“计划期刊”的一次纠正与革新。八十年代初，由各级作家协会和文联主办的纯文学期刊，基本依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转。由于刊物长期政治挂帅，政治任务高压面前往往无人正视市场，造成了其高贵、高傲和高冷的“三高”特征。同时，文学期刊被锁定在行政级别的“金字塔”下，按照“国家级、省市

级、地市级”严格划分，导致行政级别低的地区性刊物往往很难突破地域限制，将真正出色的内容广泛传播出去。



九十年代《佛山文艺》的一些经典封面。（图/由被访者提供）

当时刘宁已经看清刊物旧体制的弊端：“财政拨款一到位，人人都自耕门前三分地，没有有效的激励措施，不按工效发工资。”这不光是文学刊物的弊端，也是整个计划经济的弊端。

1992年，《佛山文艺》做了个惊人且大胆的决定：拒绝财政局定向拨款，要到市场里试身手。这是这本刊物向九十年代挥出的第一刀，用刘宁的话来说，“这一刀锋芒无比，也应声契合了时代的齿轮”。

“期刊市场化”，这个在九十年代初想都不敢想的新词，刘宁在八十年代便已提出。1983年，他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佛山文艺杂志社做编辑，同期写了篇关于文学期刊市场的论文，并提出“期刊也具有商品属性”。“当时这句话没人提过，很多人说这句话太越界、太出格了。”

让杂志到自由市场里去摸爬滚打，这在刘宁看来再正常不过。“九十年代初，社会上都在颂扬万元户。大部分人嘴上虽不说，但心里都火急火燎的。我们既然在办一份刊物，就不光要对读者负责，也要对编辑部的每个员工负责，给大家多发点奖金才是务实之举。我希望终结的，就是当时文化人‘手捏一百块，流汗花不出’的生存状态。”

刘宁至今忘不了任仲夷对《佛山文艺》的支持。“我们一本文学期刊破天荒地办了场活动，还得到了省委老领导的肯定，这在当时（对杂志支持的）力度真是空前。实际上在九十年代之前，文学刊物是阳春白雪的，是高高在上的，是需要一般百姓仰头注视的。”刘宁说。

在接连走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派后，八十年代末期，先锋文学开始抢占大陆文学期刊阵地，以《收获》《花城》等刊物为大本营，构筑以“叙事圈套”为内核的文字迷宫，并开始了一场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文字实验。

“其他刊物很高大上地挂在天上时，我们反而在底层贴地飞行。”刘宁认为，《佛山文艺》始终在最靠近地表的高度竭力飞行，并以此作为对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律和模式的抗争。

刘宁于1989年出任《佛山文艺》主编，他下决心改变这本刊物以往沉闷俗套的面貌。首先是广撒英雄帖，招揽年轻才俊。“我当时给的

承诺是，工资比一般单位高两倍；在杂志社干满8年，包你能分到房、娶到老婆。”刘宁笑着回忆。

起初编辑部有9人，全部来自外地。透过小小的编辑部，刘宁开始发现一个现象：珠三角的城市里充斥着各地方言。“珠三角外来打工的群体真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觉得这群打工的人特别可爱。”

所谓“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让广东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也催生“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时代现象——“孔雀东南飞”。但当时的珠三角，来自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的人彼此互不信任，他们常常用乡音小心地探听对方是否与自己有共同的地域属性。

刘宁于是把《佛山文艺》的办刊方针定为“同一片蓝天下，同是天下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希望这本刊物变成外来务工者的精神家园。他开设“打工OK”栏目，以吸纳更多的打工者写稿、投稿，“在时代大舞台上，给你麦你就接着，想唱什么就唱，就像在卡拉OK里那样唱”；他还开辟“风味街”版块，号召所有在珠三角打工的外地人用文字展示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奇闻逸事；他给一些基层打工者开出高价稿费，“要建立的一个概念是，打工不是丢人的事情，外地来的打工者也可以发文章、赚稿费”。

在刘宁的倡导下，《佛山文艺》成为打工者诉说情感和自由发声的多元舆论场。1993年，佛山文艺杂志社创办一本新刊，名字就叫《外来工》（后更名为《打工族》）。

与其他文学期刊固守“纯文学”旗号、誓做“沉默的大多数”相比，《佛山文学》更像是为打工族请命的初生牛犊，“做那揭竿而起的叛逆之事，做那抚慰乡愁的知心大叔”。

佛山本地打工者陈立斌说起过他对《佛山文艺》的印象。九十年代初，他和工友们从建筑工地走回平板房宿舍，冲完凉后总是和工友们玩抓阄，谁抓着了便负责去报刊亭买《佛山文艺》和《外来工》。“杂志每次出街之前都得排队，有很多买杂志的人竟是为了看看自己前段时间投的小说或者诗歌有没有在这期登载。”

不过当时仍有人骂《佛山文艺》没底线，为了发行量而自降身价：“不就是一本地摊文学吗？”

刘宁对此不以为然。“九十年代，一些纯文学期刊看不起时尚杂志，看不起那些地摊读物。但我觉得它们身上却不无可学之处。杂志就是要杂，不能老就是否属于纯文学说事儿。纯文学有太多的刊物在做了，而当时那个市场，有多元需求，比如打工者的需求，比如外来群体的需求。有了需求我们就要去供给。这个供给必须要有分工，必须选择自己的特点求生路。”

当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朦胧诗和先锋小说在九十年代渐渐走下舞台，更多的纯文学期刊仍然坚守曾经的编辑方针。在刘宁看来，《佛山文艺》不可能达到像《收获》《花城》那样的纯文学高度，那么，也许换个角度起飞，对于扩大杂志影响力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他还记得20年前自己去北京开一个全国文学期刊会，当时会务方面安排他和《人民文学》总编坐在一起。对方是刘宁多年的文学偶像，主办的又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严肃文学刊物，这让刘宁“一下子觉得紧张，也惭愧”。出乎他意料的是，对方主动和他打招呼：“说句实话，我们的刊物像中国，你们的刊物像新加坡，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

“我们只是给九十年代一个特殊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没想到反响如此之好。”刘宁说。采访中，他并不讳言《佛山文艺》如今的式微。“这本杂志碰上了九十年代，那个时代里有见证城市

化加速度的都市打工族，这本杂志唤醒了这个群体对自己、城市和故乡的感触，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刘宁说，“哪怕有一天《佛山文艺》做不下去了，那么停下的只是一本杂志，留下的却是一派情怀，一种对九十年代，以及那个时代里所有来城市打工群体的悲悯和缅怀。”

追“四大天王”，看盗版港片

文｜**冯嘉安**

港台流行歌曲、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在九十年代全面进军内地市场。

很多人表示，1989年是自己真正爱上港台流行音乐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央视《九州方圆》栏目播出了两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的专题节目，介绍多位台湾歌手及其代表作，并配以精心制作的MV。这让当时还不识MV为何物的观众大开眼界，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天天想你》、姜育恒的《再回首》《驿动的心》、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逍遥游》、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等，也因此红极一时。在歌迷们看来，这两期节目无疑是流行音乐传播史上的重要节点，也是他们难忘的经典记忆。

而九十年代的女性读者，追捧的不再是擅长写缠绵悱恻爱情故事的琼瑶阿姨，而是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立女性的亦舒。可以这么说，亦舒塑造了她们的事业观、爱情观和时尚观。至于金庸，已经被视为“文学大师”了：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将金庸作品收入其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中。尽管学界为此哗然，认为有拔高之嫌，却也不乏孔庆东这样的支持者：“没有炒作，甚至没有正版，是广大读者的阅读实践把金庸的名字刻在了文学史上。”

1997年，在香港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香港乐坛的“八大天王”和“六大天后”合唱了当届庆典的主题曲《最好的声音》，他们是

周华健、王菲、李克勤、郭富城、陈慧娴、张学友、彭羚、刘德华、郑秀文、叶倩文、许志安、李蕙敏、黎明和郑伊健。这些歌手，几乎代表了香港九十年代流行音乐的最高水平。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四大天王”，是为了弥补谭咏麟、张国荣退出带来的歌坛真空而制造的概念。四人各有特色：张学友唱功了得，刘德华和黎明是歌影视俱佳的偶像派，郭富城则以舞蹈闻名。

北京人王菲改名王靖雯以后，在香港迅速走红，后来又用回本名，以“天后王菲”在乐坛占一席之地；八十年代末在新秀歌唱比赛中崭露头角的郑秀文，到了九十年代日趋成熟，也占了“天后”一把交椅。

九十年代中期出道的陈慧琳，用了很短时间也登上“天后”宝座，甚至被称为“香港歌坛最后一位天后”。

香港歌坛“天王”“天后”走红香港的同时，他们的声音也传遍一河之隔的广东。香港与广东没有语言上的隔阂，在广东人眼中，粤语流行歌比国语歌曲更朗朗上口、倍感亲切，也有更多的共鸣。

香港金曲在广东的风行，与当时大行其道的卡拉OK不无关系。当时，在广州的街头巷尾，经常能听到寻常百姓住宅中传出荒腔走板的“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事实上，刘德华这首脍炙人口的金曲，在1991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的正是“最受欢迎卡拉OK歌曲奖”。

到卡拉OK厅“唱K”也是那时兴起的生活方式。唱得好的，可以在迪斯科大厅点唱自己的“饮歌”（粤语，指最拿手的歌），享受众人听自己演唱的陶醉感；唱得一般的，也可以包个小房间在亲密好友前晒

歌艺，不管破音、跑调，肯定不会被嘘声轰下台。无论是大厅还是小房间，在广东地区，来自香港的金曲总是演唱者的首选，甚至边唱边模仿郭富城的舞姿者，也不在少数。

香港作词人黄霑在离世前交出了他攻读香港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黄霑认为，卡拉OK是一种“自恋型文化”：“歌迷自己拿着麦克风，用唱片提供的伴奏声带，唱自己喜欢的流行曲。这些人，不要偶像歌星，他们自己就是歌星。荒腔走板，追不上节拍，都在所不计。”

九十年代，海峡两岸对音乐口味的分歧确实存在，但还不至于大到“拒听”的地步。香港曾是大中华地区最开放的城市，后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台湾解除戒严，两岸三地的政治环境较往日宽松，港澳台的音乐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小虎队1991年参与了大陆的义演，并举办了12场巡回演唱会，他们成为最早到大陆开演唱会的台湾艺人。原本只在香港红火并去了日本发展的Beyond乐队，在1993年主唱黄家驹意外离世后，渐渐为内地听众熟知，《海阔天空》《真的爱你》等歌曲广为传唱。1994年，“魔岩三杰”窦唯、张楚和何勇以及作为嘉宾的唐朝乐队登陆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让香港观众首次体验到内地摇滚异于香港音乐的疯狂。

香港音乐对内地的影响，在广东地区是直接而深刻的。成长在九十年代的广东青年在对流行文化的认同感上，与同龄的香港青年几乎无异——喜欢“四大天王”、喜欢看TVB剧、喜欢周星驰的无厘头，对北方歌手、CCTV、国产影视兴味索然。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指出：“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居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看了三十多年的香港电视，从各种渠道阅读到香港报

刊，香港媒体多年来对珠江三角洲发挥的影响，实在不可小觑。”

而在广东之外的其他省份，也能看到香港文化带来的影响：有些歌迷为了心仪的偶像如陈百强、李克勤、Beyond，努力学习粤语；有些粉丝则疯狂爱上了香港明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丽娟。1994年，16岁的杨丽娟开始迷上刘德华，从此无心向学。1997年，她为了见到偶像，参加了一个香港旅游团，未遂。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她父亲为了满足她追星的愿望，卖房、卖肾，最后在香港跳海自杀。

至今还有很多影迷会回味《大话西游》中那段音乐：紫霞仙子说完那句“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后，歌手卢冠廷缓缓唱起“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

港台歌曲的流行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电影。港台电影里的主题曲和插曲，往往成为广泛传唱的金曲。除了这首《一生所爱》，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都是跟随电影红起来的金曲。

《大话西游》1995年上映，在香港和内地都以票房惨淡收场。然而，1997年前后，《大话西游》经典对白在清华大学的BBS“水木清华”流传，从此开始了此片与第一代网民的化学作用。九十年代末在北大读社会学博士的田凯说：“看《大话西游》是宿舍里的保留娱乐节目，几乎所有同学都在为它疯狂，看了十几遍。”在清华北大高才生和网络的推波助澜下，粤语“无厘头”为网民熟知，并成为一种文化的代称。

九十年代使用网络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通过当时泛滥的盗版VCD看香港电影的。看着像素极低、一部电影分成两到三部分、不时

出现卡顿或马赛克的VCD，人们接受了不少香港电影经典之作：王家卫执导的《阿飞正传》《重庆森林》《春光乍泄》，杜琪峰执导的《真心英雄》《枪火》《暗战》，许鞍华执导的《女人四十》，陈可辛执导的《甜蜜蜜》，徐克执导的《黄飞鸿》系列，成龙主演的《警察故事》系列，郑伊健主演的《古惑仔》系列等。

1995年内地开始整顿盗版VCD市场，查封生产盗版的黑窝点。次年，不法商人将盗版VCD生产线转移到香港，至1998年年初建成600余条生产线，每天生产1200万盘VCD，使香港成了盗版天堂。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工作千头万绪，无暇顾及盗版问题，致使盗版日益猖獗。不少影片在午夜场或首映场后就出了盗版光盘，严重影响影院的生意，香港电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98年4月，喜剧影星许冠文在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向特首董建华痛陈盗版对电影业的危害。此后，特区政府成立打击盗版的专门机构，对盗版生产线予以扫荡，至2000年年初才令盗版VCD有所收敛。

盗版VCD只是香港电影走低的因素之一。八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顶峰期，九十年代初已经是强弩之末，香港回归前后出现低迷，随后隐约看到反弹势头，却又碰上金融风暴，老牌龙头电影公司陷入低谷。而在内地，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电影市场更为成熟，观众有了更多可选择的空间，香港电影的影响力慢慢减弱。不过，颓市催生小型电影制作公司，以较低成本制作出口碑甚佳的电影。不少香港电影公司也开始“北望神州”，北上内地寻求更充裕的资金拍摄“合拍片”。

近日被网友扒出的纪录片《九十年代初香港电影漫谈》令人怀念，因为它记录了张曼玉的脸还是水嫩水嫩、周星驰还是一脸稚气、王家卫还没有戴起墨镜的那个年代。

演员赵雅芝
我有白娘子的一点温婉

文｜**曹园**

伴随着《千年等一回》的背景音乐，黑色轿车打开的车门边，露出一双金色高跟鞋，赵雅芝一袭白裙，双手接过礼仪先生手中的蓝玫瑰，出现在澳门大三巴前的红毯上。谢娜喊了一声“白娘子”，在座众女星齐齐起立迎接。陈乔恩趁机摸了赵雅芝的后背以“沾沾仙气”，莫文蔚则用粤语称赞她“大美人”。主持人汪涵说，现场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朋友请举手示意，全场舞动手臂。

62岁的赵雅芝在湖南卫视明星真人秀《我们来了》里出现，容颜依旧。她说，自己喜欢做那些能掌控的事情，但也愿意尝试新事物。所以观众看到了这位“综艺新人”来不及隐藏情绪的一面。在澳门塔的比赛环节，赵雅芝因恐高退出，她内疚地小声抽泣：“我没办法为我的团队争分，觉得特别沮丧。我想尝试，但真的没有办法，很对不起大家。”

她也曾为寒风中等待见她一面的影迷而落泪。理性之中还残存一些感性碎屑，赵雅芝这样评价自己：“通常来讲，我很理智。比如有些真人秀节目很早就找到我，但我会理性地分析是否适合我。”一如她多年来接拍影视剧的原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赵雅芝凭借《倚天屠龙记》周芷若一角，首次展示了自己的古装扮相——身着蓝衣，细眉红唇，马尾低垂于两肩。之后，她又出演《楚留香》中的苏蓉蓉一角。古装形象的深入人心，让“古典优雅”成为赵雅芝的标签之一。

八十年代的赵雅芝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上海滩》里的冯程程。这个角色入选“二十世纪TVB五大最难忘女主角”，新时代女性冯程程的旗袍和麻花辫也风靡了一个时代。在赵雅芝看来，港剧在连接内地和香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渠道，香港影视让两地的人们得到了快速的沟通。它们体现了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工作层面和进步程度，内地和香港可以借此互相交流，这对文化来讲是个非常好的途径。”

九十年代开始，赵雅芝的事业重心从香港转移到了台湾。“其实也是一种机缘，”她说，“刚好那时台湾有一些剧本很适合我，比如早一些的《京华烟云》，以及后来的《戏说乾隆》和《新白娘子传奇》，我看了这三个剧本之后都非常喜欢。”

1991年，《戏说乾隆》在台湾首播时收视率达41%，拿下了当年的收视桂冠，也开创了“戏说剧”先河。盐帮帮主程淮秀、侠女沈芳、刺绣女金无箴，赵雅芝一人包办三角，演得相当过瘾。

1992年，38岁的赵雅芝接拍两岸三地合资的《新白娘子传奇》，掀起了全国性收视热潮。她所演绎的白素贞版本成为公认的经典，甚至在大部分观众心中，赵雅芝与白娘子两者间可画上等号。

对于《戏说乾隆》和《新白娘子传奇》的走红，当时的她虽未“胜券在握”，但也有十足信心。“可以说，能够料到这两部戏会拍得很好，但是否特别受欢迎，这是演员和制作人永远都猜不到的，观众的接受和喜爱是后来才知晓的事情。”

赵雅芝说当初接拍《新白娘子传奇》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被戏里的民间故事吸引，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爱情传说。其次，这部戏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拍——将黄梅调融进去，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挑战。我特别喜欢，也是为了尝试新的戏路。”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新白娘子传奇》糅进的黄梅曲调，成为有别于其他古装戏的一大亮点。这部剧几乎每集都有新黄梅调唱段。白素贞与许仙新婚之时，配上一段“堂上悬灯又结彩，五鬼搬运乐开怀。丝竹之声多悦耳，鞭炮齐鸣如春雷”；两人再次相遇，又奏上一曲“断桥重逢天安排，夫妻对面各施拜。恩恩爱爱说分离，笑逐颜开扫云霾”。面对许仕林与媚娘有缘无分的遗憾，剧中唱道：“巫山半路惊残梦，镜花水月缘尽空。天愁人怨魂消去，月缺花残心冷清。”镜头转到仕林挑灯夜读的场景，又响起“青灯伴黄卷，读书声随五更天。青云路上奋步，吐气扬眉占鳌头”。

这些唱段的曲调均出自台湾流行音乐创作人左宏元之手。包括片头和片尾曲，左宏元共为《新白娘子传奇》创作了12首歌曲和103处唱段，所有唱段的曲调均为12首歌曲的变体，根据剧情发展和人物情绪填词。

缺少时间集中培训，赵雅芝和其他演员只能在拍戏空隙了解黄梅调。“剧组会提前一个星期将黄梅调放给我们听，靠自己去领悟。我母亲喜欢听黄梅调，所以从小我就接触过，有一点基础，而且它不难学，曲调很容易上口。”

《电影画刊》曾以“轻戏曲化”来描述赵雅芝的表演。一颦，一笑，一回眸，一颔首，一提袖，高耸的盘发、前额正中的美人尖，白娘子的形象令人心悦诚服。香港女星叶童的反串也让这部戏赚足了噱头。

起用香港演员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最终用普通话完成了对白。赵雅芝记得，起先沟通时，很多香港演员发现台湾演员听不懂粤语。“配戏需要大家一起交流，所以最后都尽量用国语对台词。”

这部戏让赵雅芝红透了两岸三地，也成为她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如果按故事的完整性和结局的圆满程度来说，《新白娘子传奇》

是一个完美的剧集。白素贞又是一位有着完美性格的人物，愿做牺牲、体贴善良。我可能有白娘子的一点点温婉，但没她那么完美；有情有义之类，我只能尽量。”

而现实中，恐高几乎算是她最大的弱点，参加《我们来了》节目时她也总会自责：“我的表现还可以更好一点。”

《我们来了》苏州站，赵雅芝饰演昆剧《白蛇传》里的白素贞，和白娘子再续前缘。被贴上“白娘子”和“冯程程”等标签，赵雅芝并不介意。“刚好相反，我非常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这些标签对我自己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九十年代成就了赵雅芝的功与名，也让港台影视绽放光彩。她回忆道：“九十年代是港台影视最蓬勃发达的时期，以周星驰电影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深受年轻人追捧，我的孩子也很喜欢。”

1997年，赵雅芝接拍了家族史诗大戏《百年沉浮》，这是她第一次全面与内地展开影视合作，也让她拥有了对九十年代两岸三地影视生态的发言权。

“内地与港台的影视差异在于拍摄和演出的方式，尤其是在表演节奏方面很不一样。内地的表演更戏剧化，比较突出舞台性，着重于一些讲话，会慢一点。”她说，“相较而言，港台戏的拍摄节奏很快，我喜欢这种表演方式。港台的影视作品比较生活化，充满市井气息。但不论何种方式，对演员来讲都是学习表演的好机会。”

作家金宇澄
上海这个森林，什么动物都有

文｜**阿饼**

金宇澄沉浮上海，见惯市井饮食男女，在九十年代的日常世相中，常常绽露奇异辉煌。

他提起电视新闻报道1995、1996年的除夕“接送”财神，人们在上海乍浦路、黄河路饭店云集，燃放烟火鞭炮的垃圾，足足堆有半尺厚，最大型的烟火箱子，都是单人床的规模，“匪夷所思，时代进入一场接一场的狂欢”。

上海大小酒席不断更新，慢慢演变为极致的浮夸，官商汇聚，夜夜良宵。

“中国经济的发展，始于1990年，不只在上海，人人都热衷生意，都那么热火朝天，《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里，下海、做买卖，跑各种关系，搞批文，送礼。”金宇澄说，“这种城市精神，承上启下的生物链，重新复位。你做生意，他从香港美国来，谁谁又在干什么……通常清楚，也往往暧昧不明，膨胀、丰富、曾经消亡的都市生态，什么动植物都繁衍起来了。你可以看见四周植被，却不可能了解整一座的森林。”

在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九十年代建立的饭局生活，在“人生安稳的底子”中，流水席一个接一个，神侃、讲段子、做生意，鱼龙混杂，男男女女，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是典型上海的写照，其中我们也窥见了北京、广州、杭州多个城市的影子。

有人不禁要问，这样的饭局有意义吗?

金宇澄说：“你有一盘10年前和朋友饭局的录像，要不要看？你肯定要看，其实你早忘记这场饭局了——忘记，就是它毫无意义。你一看录像就呆了，10年前，我原来是这发型啊？怎么穿那样的衣服？这人不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吗？另一位久不联系了，对面那位早已离婚，忽然你想起了很多，非常感慨。”这就是意义。

饭局之妙，在“饭”也在“局”——典型的中国饭局，设局人、局精、局托儿、陪客、花瓶众角色，仿佛一个不能少。

上海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有无缘无故的饭局。九十年代的聚会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家中再无访客，饭局就是客厅。

在作家朱文颖的印象中，金宇澄是个有意思的饭局旁观者。金宇澄则认为是共同的经验：“人在饭桌上说的话，都经过仔细斟酌，才形成一种愉快的闲聊，这与通常小说渲染谈判、阴谋、鸿门宴不同。人需要普通的交流，求得存在和满足感，不说教，没有中心思想，自作主张。你放低位置，就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特征。”

地球人都知道，上海的饭局基本吃不饱，《繁花》的饭菜，终究是前戏，高潮滑入五花八门的话题和旨趣中，如小说人物所言，“世界大乱收古董，世界太平收女人”，但收一个女人，说不定收进了一百多个麻烦……钥匙越多，摩擦就越多，声音响得多，事情就复杂。

饭局展露了阶层的标准。金宇澄曾遇到一陌生的同桌女孩，有人问她何时结婚，她答：“我阿姨说，先包三年再讲。”问她阿姨是干什么的，她答：“给一个日本人包着。”金宇澄记住了这个故事：“‘包’这个字，《金瓶梅》里已经出现，环境和对象早变了，也像是毫无改变，这种话题可在饭桌上平静讨论，我没有想到。当时有人感悟说，是啊，这种弄堂小姑娘找个小职员结婚，事事都不如意，找一个大领

导或优质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完全不一样，等于三年‘硕博连读’，有什么不好？”

《繁花》让王家卫导演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小毛在饭局上说的故事：夏天深夜时分，小毛在通宵车站遇到一女人。小毛搭讪，女人沉默，最后只说三个字：“洗衣服。”小毛说：“我是单身，可以到我家洗，我有洗衣机。”女人沉默。两人上了车，等小毛到站下车，女人也下来，一路跟他回到家，显得越发自然，就像回到自己家那样脱衣服、备洗澡水，最后，躺到了小毛的身边……这使小毛疑惑，会不会就是去世的老婆？但不像……黎明时分小毛醒了，听她还在厨房洗衣，没用洗衣机。4点多钟，女人叫醒他，“我走了”。小毛迷迷糊糊听见门锁声，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女人。

“不少人当场就追问小毛，这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小毛说，知识分子才问这样无聊的话，我从来不问，她对老弄堂那么熟，大概也住这种房子。为什么？跟我无关。”

作为老三届知青，金宇澄在东北务农8年，与这一辈的三教九流有密切交往，按他的话讲——这是市民阶层的某一种“日常”。对小毛这样的下岗单身者来说，生活不如意，面对所谓“艳遇”，他一贯是极其谨慎，一言不发。在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里，他只遵循自身规律，沉默根本不算什么，却可以在饭桌上敞开说，这是作家很少注意到的情况。

如同无数饭局，《繁花》的命运“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如同书名，人生如花，盛极必衰。

小说里，蓓蒂和阿婆在“文革”中失踪，变成了小鱼，被猫咪衔着送进了黄浦江；小毛妻子春香难产而死；九十年代饭店老板娘李李，穿一身运动服，准备出家，跟阿宝说“宝总，保重”；小琴推倒锈蚀的阳台栏杆，坠楼命殒……金宇澄知道，《繁花》这些结尾都不讨喜，

他不介意，在他看来，关于死亡的话题，到了九十年代已变得正常化。

金宇澄提起，他常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路边的家门口，天都下雪了，天黑了也没人管，她就这样坐着，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在年轻时代，她肯定很漂亮，也许很幸福，但到了老年，就会是如今的模样。这并不是说，她的子女好还是不好，居委会有没有照顾好她——读者应该懂得，人到了这年龄，哪怕有儿女照顾，也必须面对这样不堪的状态，这是正常的。

“文学有大宗的某种答案，比如‘相濡以沫’，仿佛我们的问题，都来自环境压迫，或者再坏都有解决办法，没有时间自己的问题。文学很少提到死亡的不堪，死是不能解决的。只鲁迅先生说过，某人为孩子庆生，大家热情祝贺，只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被痛打了一顿……这是老实话，意思是人生易变。珍惜幸福的时光，才是《繁花》的正能量。”

“我不会故意拿一个很难的内容，给简单的读者看，是说老实话。我喜欢博尔赫斯的意见，他认为的好小说，就是让‘读者消遣和感动，不醒世劝化’。”

小说结尾，金宇澄引用1993年红遍大街的《新鸳鸯蝴蝶梦》歌词，“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不如温柔同眠”。

在这个年代，也许人只能这么生活。

文化辞典

辑｜**谭山山**

/ B /

版税制 1992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王朔文集》，创下两个纪录：一是给不到40岁的作家出个人文集（以往给作家出文集总得等到晚年，有终身荣誉奖的意思）；二是“文革”后首次采用版税制给作家支付稿酬。据说王朔拿到的版税率一直是国内最高的。

北大百年校庆 1998年，北大迎来百年校庆。庆典规格很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发来贺电。从来没有哪所大学获得过这样的待遇。然而，不合宜的声音被忽略了：北大已经不再得风气之先，令人失望。

/ C /

陈佩斯 参加过11届春晚的陈佩斯，在1999年因侵权问题起诉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后，成为演艺圈打知识产权官司的第一人。代价则是：此后他再也无缘春晚。他本人并不后悔，表示不需要央视的平台来维持自己的名声。

/ D /

大片 1994年的《亡命天涯》，让中国观众第一次见识好莱坞大片。那是广电部提振国内电影市场的救亡之举，同时为了保护国产电影，对海外大片实施配额制：最初是每年10部，后来增加到20部，现在则是34部。

道德理想主义 以作家张承志、张炜为代表，明确提出与整个世俗社会和大众文化对立的主张。张承志强调“以笔为旗”，呼唤“清洁的精神”，以对抗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中文人的丑恶、思想的堕落和社会的平庸；张炜则提出“拒绝宽容”。

第六代导演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85班毕业不久的张元完成第一部影片《妈妈》，被视为“第六代导演”诞生的标志。他的同班同学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乃至87班的管虎、93级的贾樟柯，都被归入这个群体。

电视相亲 以胡瓜主持的《非常男女》节目为开端，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电视相亲”热，改变了人们的婚恋观念。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上海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等节目相继开播，据不完全统计，同期推出的相亲节目有30多档。

《东方时空》 1993年5月1日早上7点整开播的《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创始人之一时间对节目的要求是“说人话救中国”，就是好好说人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国电视界的改革由此开始。

/ G /

戛纳电影节 冲击奥斯卡难度太大，相比之下，戛纳电影节对华语电影友好得多，于是成了中国电影人的秀场。1993年陈凯歌凭《霸王别姬》斩获金棕榈奖，次年张艺谋的《活着》却败给了《低俗小说》，让张艺谋一直耿耿于怀。

葛优 从《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到《大撒把》《活着》《甲方乙方》，有人说，葛优的脸代表了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他说自己受欢迎的原因，是人们不把高大全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有平民色彩的人。“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格调》 据说，在九十年代末期捧着这本《格调》，会显得很有格调。但按照保罗·福塞尔在书中的评定，这种跟风的做法显然属于中产阶级甚至中下层阶级心态。而在他的评价体系中，另类（无阶级人士）>上层阶级>贫民阶级>中产阶级。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1996年成立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随后，同在广州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中央级的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以及上海的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相继成立，尝试市场经济环境下集约化办报的模式。

《顾准文集》 1994年顾准逝世20周年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让思想界沸腾。有评论认为，九十年代中期对顾准、陈寅恪、张中晓乃至胡适、周作人等人的重新发现，不但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延续，也许还是一种转型。

/ H /

黄仁宇 其实早在1982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直到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开始出版黄仁宇系列作品后，黄仁宇的名字才为广大读者熟知。他所开创的解读历史的方式，给读者带来巨大冲击，很多青年视他为“新历史观”启蒙人。

《还珠格格》 1998年播出的《还珠格格》，确实当得上“现象级”电视剧：不仅当年红极一时，让赵薇扮演的小燕子成为中小学生的偶像，而且至今长盛不衰，每到寒暑假例必重播，还持续为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提供话题、表情包等。

/ K /

卡拉OK 卡拉OK 1991年进入中国，很快风行一时。不堪其扰的王小波写了《卡拉OK与驴鸣镇》，用“驴鸣”来讽刺那些抱着话筒唱个不停的邻居。那时候，搬出卡拉OK机，在街边随便摆个摊就可以开唱。

/ J /

《绝对隐私》 1998年记者安顿出版《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口述实录”文体风靡一时。安顿称这种文体借鉴了国外的犯罪学和生存调查的手法，读者爱看是因为符合大众的口味——其实就是八卦之心嘛。

/ L /

《廊桥遗梦》 1996年最火的引进大片是《廊桥遗梦》，婚外情、外遇等类似字眼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片中女主角选择了家庭责任而非爱情，所以被称为“遗梦”；如果男女主角因外遇而选择情死，那就是《失乐园》了。

录像厅 躲在乌烟瘴气的录像厅里，一块钱一天或两块钱三场，看黄金时代的港片和没有字幕的《第一滴血》等海外片，是很多小镇青年对九十年代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再加上迪厅、台球厅、游戏厅，这“四厅”构成了当时娱乐生活的全部。

/ Q /

《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行”，有“锵锵”的资深粉丝表示，最初看这档脱口秀节目时，根本分不清谁是主持人谁是嘉宾，直到窦文涛说出这句广告语，才反应过来他是主持人。窦式脱口秀为这档节目烙下深刻的个人痕迹，别人都超越不了。

/ S /

四大俗 王朔把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并称为“四大俗”，当事人中只有金庸出来回应。按此思路，有人总结出“新四大俗”：城里开咖啡馆、辞职去西藏、丽江开客栈、骑行318（即川藏线）。

四大天王 “天王”“天后”的提法来自香港媒体，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这“四大天王”。如今，四大老天

王已经成为演艺圈传奇般的存在，即便是当年较弱的郭富城也是影帝级人物了。

随身听 随身听是九十年代大学生的标配。要证明自己走在潮流的最前端，公认最高端的索尼CD随身听是个好选择。它虽然比磁带随身听要大，但音质好，而且，价格高得多（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实话实说》 1996年首播的《实话实说》和《东方时空》一样，都是提倡电视说人话、说真话的。而《实话实说》更接地气：现场观众可以直接发表意见；主持人崔永元被观众亲昵地称为“小崔”，有点贫嘴还有点蔫儿坏。

《时间简史》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万维钢坦承，自己对物理学感兴趣，缘于1991年出版的《时间简史》。在那个年代，这本书能卖出几十万册，堪称奇迹。然而，很多人以买到它为荣，却从未读完它（甚至连十分之一都读不完）。这很刻奇。

《数字化生存》 因为这本书，凡是对互联网感兴趣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拗口的名字：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受追捧程度，尼葛洛庞帝有一种“摇滚明星”的错觉。在那些对互联网懵懵懂懂的人看来，这本书是自己进入网络这个奇妙新世界的通行证。

/ T /

《泰坦尼克号》 1998年引进的《泰坦尼克号》创下的3.6亿元票房纪录，直到2009年才被《变形金刚2》超过。公映前中影公司在北京举行面向各地电影公司经理的看片会，中途无人离场，放映结束后厕所排起了长龙——日后人们才知道，这就叫“无尿点”电影。

《图兰朵》 1998年在太庙上演的《图兰朵》，不是普契尼的《图兰朵》，而是张艺谋的《图兰朵》。它主打服装和舞美，号称给观众带来"震撼视觉冲击力"，其实是一场挂着"图兰朵"标签的服装秀。循着这个路子，张导开辟了"印象"实景演出系列。

托派 九十年代的高校流行两个社群：一是"托派"，即考托福的一拨人，天不亮就起来收听BBC、背单词；一是"麻派"，翘课在宿舍聚众搓麻或打牌。前者嘲笑后者胸无大志，后者则反驳：海归（龟）就不土鳖了吗?

/ W /

王朔 通过小说表达对"伪君子式的存在"的积极对抗、出个人文集、折腾影视剧……作为颠覆者的王朔，在九十年代成为公众人物，有人称他获得"暴发户式的成功"。对他的好恶，代表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和立场。

汪国真 相对于对文学性的追求，浅白、易懂的表达，可能更适合九十年代这个平民时代的诉求，这应该是汪国真最早为中学生追捧、最终红遍全国的原因。年少时在笔记本上手抄过汪国真诗歌这事儿，如今想起来却仿佛人生囧点。

吴小莉 一说到吴小莉，人们马上会想到1998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她被朱镕基总理提问的情景。事后她总结诀窍：要穿着鲜艳，她那天穿了大红色；占一个面对主席台靠左的位置，这样既能被总理也能被提问官看到。

/ X /

《相约1998》 虽然这是一首典型的晚会歌曲，但王菲、那英的演唱使之成为传唱度最高的春晚金曲之一。有趣的是，它还是不少商场的背景音乐，“来吧，来吧，相约98；来吧，来吧，相约商场”，可以无限循环。

消费主义 随着社会的变革、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中国，并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的重要标签。它不仅改变人们的消费观、价值观，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小虎队 对70后、80后来说，小虎队是他们名正言顺喜欢的第一个偶像团体，因为三位成员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的形象之阳光、健康，连最严格的家长都挑不出毛病来，因而默认了孩子的追星行为。

小霸王学习机 九十年代中期电脑尚未普及，但家长们已经意识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带键盘能学习五笔输入法的小霸王学习机就是抓住了家长们这种需求。不过，孩子们多半把它当游戏机玩，《超级玛丽》比背五笔词根好玩多了。

新概念作文大赛 《萌芽》杂志社1998年开始主办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衷，一是为了征稿，二是为了提升杂志知名度，并没有预料日后会这么火爆。其实它和今天的选秀类似，如果一个平台出过像韩寒、郭敬明这样的标杆人物，人们自然看重它。

新年音乐会 1989年起，央视开始通过卫星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1994年起，中央乐团下属的北京音乐厅被承包出去后演出暴增，被称为“北京音乐厅现象”；1996年，各地举办的新年音乐会多达30台。这说明，中国已培养出一批音乐会观众。

《心太软》 对于大陆歌迷来说，说起歌手任贤齐，不能不提1997年这首瘟疫般流传的魔性金曲《心太软》。它的曲调很口水，歌

词也很直白，但也许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也许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莫名戳中人们的痛点。

/ Y /

亦舒 早在八十年代，亦舒小说在香港的影响力已经超过琼瑶。但要到九十年代，中国都市化进程加快、女性参与时代发展与竞争后，亦舒小说在内地才得以流行。此时，对于亦舒笔下的都市独立女性形象，读者们才有了更多代入感。

九十年代
艺术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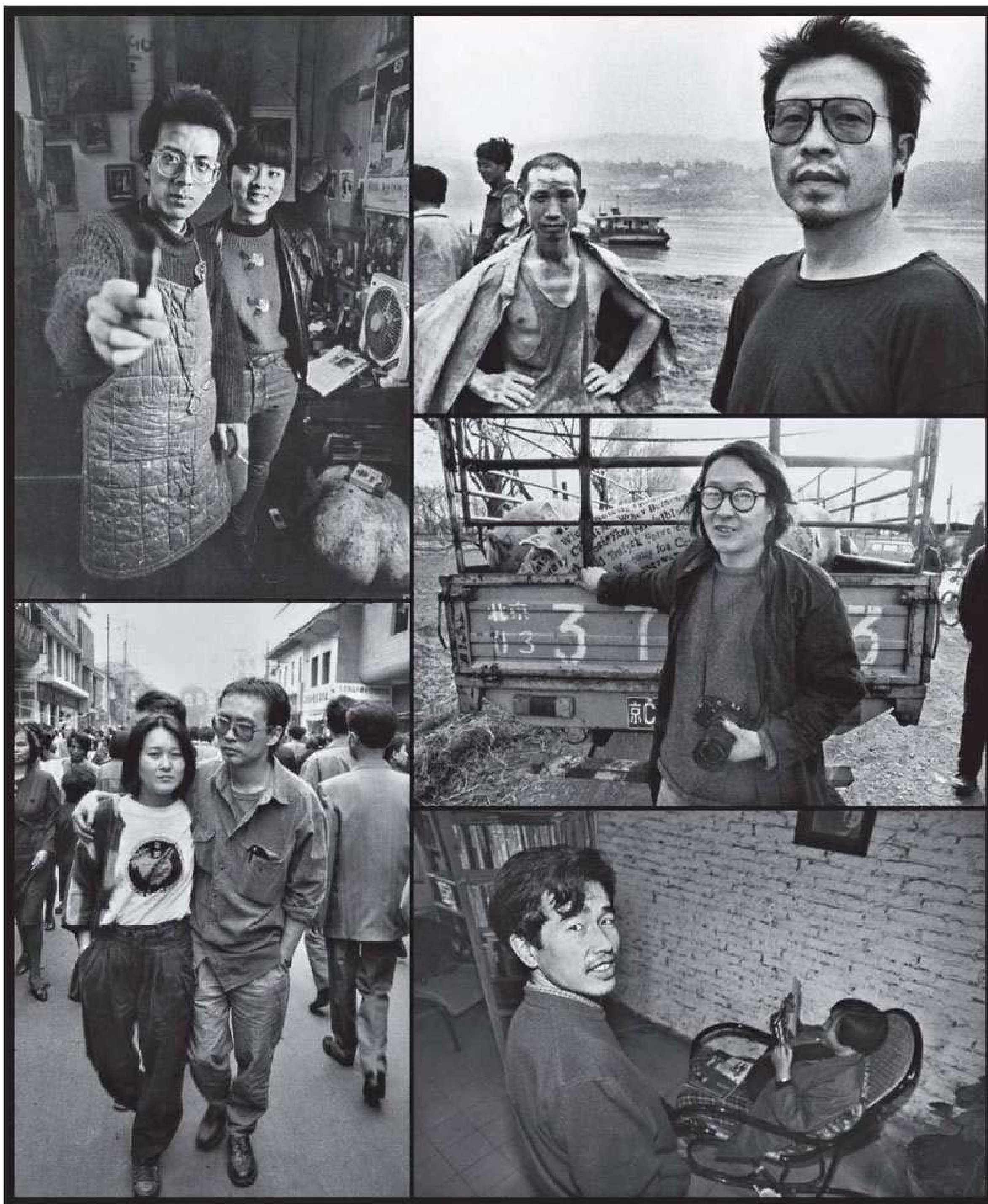
一刹那恍惚

若有所失的感觉

不知不觉已变淡

——歌曲《海阔天空》

摄影师肖全镜头下艺术家的九十年代。左上：刘小东、喻红1993年于北京；左下：张晓刚与妻子1991年于成都；右上：罗中立1994年于重庆；右中：徐冰1995年于北京；右下：陈侗1992年于广州。（图/FOTOE）



摄影师肖全镜头下艺术家的九十年代。左上：刘小东、喻红1993年于北京；左下：张晓刚与妻子1991年于成都；右上：罗中立1994年于重庆；右中：徐冰1995年于北京；右下：陈侗1992年于广州。（图/FOTOE）

跑步进入后现代

文 | **冯嘉安**

八十年代，中国用10年时间走完了启蒙和理性的“现代主义艺术”之路。

九十年代，“现代艺术”逐渐被“当代艺术”取代，语义概念转变的背后，是社会思想和制度的深刻变化。

英国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利文形容，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感到震惊和困惑的观众，见到的是各种结构：装置、表演、达达、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实际上几乎每一种能够想到，但又消化不良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中国没有时间好好消化，历史的潮水推着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拼命赶路。

事实上，在这场为八十年代画上句号并为九十年代作重要铺垫的“中国现代艺术展”里，筹委会的批评家在知识结构和艺术偏好上已经出现分歧：坚持黑格尔与存在主义的高铭潞和栗宪庭，偏好王广义和舒群的“理性主义”；而研究巴赫金与胡塞尔的费大为和侯瀚如，更偏好“厦门达达”和“新刻度小组”。

独立艺术撰稿人廖廖曾撰文指出：“相比传统艺术与八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先锋艺术，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最大的转折就是不再关心宏大叙事、历史意义、终极关怀、理性逻辑、超验精神。这些词语甚至已经成为被嘲笑与漠视的对象。由于失去了信仰与方向，‘当代艺术’的精神在更加多元与开放的同时，也变得充满游戏

性、颠覆性、碎片化。以荒诞和解构为主旨的‘当代艺术’消解了虚假的权威与体制的规训，部分地揭示了现实的真相和解放了人性。但是当艺术家始终用反对者和游戏者的姿态来面对一切事物，在抛弃了偶像、神圣、永恒、信仰、历史等崇高价值之后，也迎来了精神的‘萧条’，‘当代艺术’在解构一切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的意义，最终走向虚无。”

充满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远去。九十年代，艺术家不再谈论“大灵魂”，他们的兴趣从国家命运与民族未来，转变为对个人生活的体验。九十年代的当代艺术里，“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纷至沓来。

九十年代的艺术现象常常被冠以“新”的前缀，用以区分八十年代或者更久远的过去。

例如“新生代艺术家”这个概念，出现在1991年7月在北京举办的“新生代艺术展”上，以刘小东、苏新平、喻红、申玲、赵半狄等60后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为代表。批评家尹吉男认为：“新生代艺术家与此前的新潮美术拉开了显而易见的心理距离。他们提出重视艺术观察与人生观察的‘近距离’倾向。”

批评家吕澎则把“新生代”连同“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政治波普”等九十年代出现的艺术倾向通通归入“新艺术”。其中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参与了香港画商张颂仁在1993年操办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巡展。

肇始于八十年代末、在九十年代大行其道的“新文人画”，则是对北宋以来中国“文人画”传统的重构，以反对二十世纪自康有为以来对“文人画”的批判。同样以水墨为创作手段的另外一部分艺术家，则

开始了“实验水墨”的新尝试，出现了“抽象水墨”“观念水墨”“表现水墨”等新形象。

如此种种“新”现象，既难以与八十年代来一个一刀两断的分手，又难以与八十年代的“前卫”“新潮”画上等号。廖廖认为，“中国的九十年代对应的是西方的五十年代——启蒙主义与工具理性走向穷途末路，现代主义解体，走向后现代主义文明，中国九十年代的主题是虚无、荒诞和解构主义”。

然而，中国的九十年代与西方的五十年代有着迥异的历史语境：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才初现端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之争也被不断弱化、模糊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平息了纷争之余，也让中国的市场制度充满西方未曾遭遇的复杂性。中国当代艺术所呈现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明显并不是处于一个后工业化的国度——中国在这个时期，还在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推动GDP不断增长。

因此，“跑步进入后现代主义”的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也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它在官方体制内的机构、西方反殖民主义者和本土在场的当代艺术批评家三者的眼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官方的价值取向与当代艺术不在同一个维度，西方反殖民主义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有讨好西方审美趣味的嫌疑，本土在场的当代艺术批评家力陈当代艺术的价值。

“展开九十年代”“迈进九十年代”，这是1992年、1993年吕澎、张颂仁分别为广州双年展和“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巡展撰写序言时所用的题目。广州双年展希望以刚刚获得合法地位的“市场”为“托词”，给沉寂的中国当代艺术杀出一条血路；“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则借香港和西

方成熟的画廊体制，把中国的艺术家推向世界，并实现了市场效益的目的。

正如吕澎在九十年代初编辑的《艺术·市场》杂志刊名中充满策略性的一个“·”所反映的考虑——九十年代初，在艺术批评家眼中，艺术是独立的，市场不过是工具（因此要用“·”来把“艺术”与“市场”隔开）。他们希望“以市场推动艺术的发展，而不是艺术品热火朝天地买卖”。当时谈“艺术市场”的，多数是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家，而非经济学家或者画廊主人。

然而，无论批评家承认与否、艺术家主动与否，市场都在逐步成为一种制度，而非仅仅是批评家口中的“托词”，深刻影响着九十年代艺术的面貌。

九十年代初，没有多少艺术家有出售作品的念头，支持他们创作的经济基础，多数源自他们体制内工作的微薄工资。九十年代末，没有艺术家会怀疑出售作品的合法性，甚至市场的成功成了艺术成功的衡量标准。

1992年，中国大陆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朵云轩成立，并在1993年敲响大陆艺术品拍卖第一槌。嘉德拍卖在1993年成立，并在次年推出当代油画拍卖专场。1994年，翰海拍卖和荣宝拍卖也相继成立。

通过市场，那些本来在圆明园艺术村当“盲流”的画家，突然解决了温饱，甚至进入“胡润艺术榜”。那些第一批购买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家，也尝到了超额投资回报的甜头。

虽说九十年代是艺术拥抱市场的10年，然而短短的10年时间毕竟只是市场化的滥觞。由成熟的拍卖市场、画廊、私人藏家组成的艺术市场体系，还要等到二十一世纪才日臻完善。

八十年代，评论艺术的人是艺术报刊的编辑，他们逐渐变成九十年代的艺术批评家。吕澎表示：“将中国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地位、身份和作用与西方批评家作机械类比是不合适的，他们所面临的是特殊的中国现实。”

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是中国艺术批评家在阐释自我身份上的一次新尝试，由14位批评家组成的“艺术主持+评审委员会”制度，是后来中国当代艺术“策展人制度”的雏形。

但是，这种新尝试也带来新问题。已故批评家邹跃进认为：“九十年代这种由批评家主要操持的展览，意味着有什么样的主持人，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家参与，正如广州双年展是北京艺术家缺席的展览，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生产和传播。”

其后在张颂仁的穿针引线下，中国的艺术家有机会参与世界顶级的双年展。1993年的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中国艺术家首次出现在国际双年展的舞台上；随后的1994年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上，又出现了此前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面孔。虽然在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西方观众的激赏，但从这两个双年展开始，中国的艺术家逐渐走进西方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

当代艺术家在国外各种艺术机构风生水起，在国内却依然鲜有机会走进公立美术馆。当代艺术在国内的“半地下”状态依然持续。

始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虽然是政府行为，但经历了1996年以油画为主题和1998年以水墨为主题的两届双年展以后，在2000年迎来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才形成以中外策展人组成策划小组，呈现国内外当代艺术的潮流。这届上海双年展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走

向地上，开始被官方艺术机构接纳的先例，也为后来的成都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做了很好的范例。

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都以极快的节奏追赶全球的步伐。全球化的浪潮就像物理实验中的U形连通器，一旦中间的阻隔消除，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让本来相差甚远的二者达到同样的水平。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与西方进入了相同的全球化语境，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的融合更加深入。

吕澎 九十年代，艺术闻到钱的味道

文｜**冯嘉安**

吕澎

九十年代任《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现为艺术史家。

1992年的夏天，广州美术学院旁边的江南大酒店里，频繁进出电梯的，多数是参加“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以下简称“广州双年展”）的人，这座酒店似乎被参展者包了。

其实，“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吕澎和他的同事只是租了里面的两个房间作为组委会办公室。批评家严善说：“吕澎有本事，就在这两个房间里，把美术界搞得神魂颠倒。”

早在1990年年底，吕澎就开始编辑《艺术·市场》杂志，期望唤起艺术市场来为现代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条件。然而，他也明白，仅仅一本很薄的《艺术·市场》，不足以燃起人们对艺术市场的共鸣和市场本身的可能性。

于是在1992年，一场由批评家作为组织者和评委，撮合资本与艺术家，由报纸、电视等媒体广泛传播的盛宴，逐渐在江南大酒店的两个房间里变为现实。

“中国现代艺术展”举行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的现代艺术进入了一片死寂，在全中国范围内现代艺术的展览屈指可数。吕澎说：“在

85美术运动时期非常活跃的批评家、艺术家例如高名潞、费大为、徐冰、黄永砯等陆续出国，到了美国或者法国。那时，艺术界的人们相信，在西方国家是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国内的批评家和艺术家不同程度地显得无所适从。官方不可能再为现代艺术提供机会了，之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应该是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次狂欢。很快，艺术家们就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与艰难。"

转机发生在1992年，那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市场的话语体系由此获得了合法性。走向市场成为中国现代艺术脱离死寂的转机。在吕澎看来，艺术走向市场，与其说为了金钱，不如说以"市场"为托词，通过市场为现代艺术寻找出路。

吕澎在这一年写下《走向市场》一文，发表在当时美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媒体《江苏画刊》以后，执行主编李建国打电话给他说："你的《走向市场》发表后，我们接到很多读者来信，他们都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疯了，他怎么敢说让艺术走向市场！"

回想起这段往事，吕澎说："当时人们的观念里，艺术与市场是对立的。虽然很多艺术家内心希望艺术品能出售，但觉得这个问题放在桌面上讨论是不齿和错误的。广州双年展就是要正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推动艺术走向市场。"

广州双年展举办期间，组委会在华南植物园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艺术圈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包括没有参与广州双年展评委工作的其他重要批评家，如水天中、朗绍君、范迪安、王林、栗宪庭等人。

栗宪庭发言时说："王林强调商业介入艺术之后，可能产生对艺术创作的严重腐蚀；吕澎则强调市场对现代艺术的支持和推动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是理想主义的，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现实太复杂，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1992年，参与广州双年展的全体人员合照。（图/肖全）

说着说着，栗宪庭就在会场流下了眼泪，讨论会因此而中途结束。

吕澎后来说："我理解老栗的心情，知道他想保持中国现代艺术的纯粹性，可是，他也一下说不出这个时候的艺术界究竟该如何是好。我望着李路明和其他人扶着栗宪庭上车回酒店的情形时，心里更加明确，在这个国家，什么是当代艺术发展的有效策略。"

对于市场与艺术的关系，吕澎在2016年依旧坚持20多年前的立场："艺术家受到了市场的支持！市场对艺术家的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资本的偏好，一种是市场中的人文背景。如果市场是在尊重艺术家创作的前提下，市场的正面作用会大于负面作用。如果市场是在纯粹个人偏好的视角来起作用，负面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总的来说，市场的支持是当代艺术今天能存活的主要原因，市场的取向跟学术的取

向总体来说是一致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当一种学术取向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以后，资本会希望这种取向保持不变，而艺术的本质是变化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翻看广州双年展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摄影师肖全给展览拍下的很多珍贵镜头。其中一张记录了评审委员会的批评家赤膊上阵、汗流浃背地打开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作品，而他们评审工作的场所就是炎热的仓库。

广州双年展的历史性突破，还在于这是第一次由批评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吕澎说：“之前美协的展览，评委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做评委有偏见之处，更何况还有官方标准。批评家作为评委，相对来说能够站在中间的、学术的立场上。我相信，今天任何一个大型展览的评委都不可能像当时‘广双’那样参与具体的体力劳动，然而大家却兴奋之至。如果人们要说这是不专业的，是缺乏分工的业余现象，我只能说，中国当代艺术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

预展时，香港歌星刘德华在王广义的大批判画前兴奋地照着画面的造型做了好几个动作、拍了照片、问了价格。严善回忆：“这张开价10万元的画，他没下手，让大家扫兴，说他会后悔吐血的。”这幅名为《大批判·万宝路》的作品，于2008年出现在北京春拍市场时以1097.6万元成交。

广州双年展设文献奖、学术奖和优秀奖三类，最高奖是文献奖，代表“湖北波普”的王广义和“湖南新图式”的李路明分获大奖。

吕澎表示：“广州双年展推荐的获奖作品，都是符合当代艺术史标准的作品，它跟官方的标准不一样。可以看到，参与这次双年展的艺

术家，绝大多数是今天最重要的艺术家，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在今天市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众。”

获广州双年展优秀奖的画家陈雷回忆称：“10月的一个早上，我与李路明坐了一夜火车抵达广州，径直去了位于江南大酒店的双年展组委会。吕澎问我们住哪，李路明说准备在朋友家打个地铺。‘打地铺？’吕澎笑说，‘你得了大奖还打地铺？王广义可是在这家酒店订了间豪华套房。’”

而批评家彭德的回忆更饶有趣味：“研讨会我同栗宪庭坐在一起。因为质疑双年展同资本相联系，栗宪庭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不过当王广义手捧脏兮兮的一万元奖金请栗宪庭上馆子时，后者没有拒绝。据说王广义颤抖着手说：老栗，有钱了，你随便点！”

20年后，王广义为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写下一段话：“广州双年展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它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它在今日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广州双年展上，出现了两次针对市场介入艺术的行为艺术。

湖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孙平借全国各地青年艺术家云集广州的机会，在广州美术学院发行“中国孙平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股票（A股）”并宣读招股公告，以假乱真地模拟着当时风靡全国的炒股热潮。

与此同时，艺术团体“新历史小组”的成员以清理工的身份，用来苏水喷洒地面，搓擦作品，使展厅内弥漫着医院气味。在此前后，他们散发了《消毒》文件，其中包括“双年展学术工作研讨会纪要”“评选情况报表”，还有通告、公告等数十份告示。

艺术批评家高岭认为：“与其说这次‘消毒’行为是针对市场操作艺术的嘲弄，不如说是‘新历史小组’消解艺术界的前意识形态后遗症，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诞生清理场地。因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并不排斥市场与操作，主张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流程相结合。”

吕澎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积极参与者，还是历史的书写者。在撰写超过1000页的大部头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时，吕澎写下题记：“历史是有问题的烟云，艺术史也不例外。”

吕澎说：“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每个人都可以充满兴致地去写作，但不等于这个写作是没有问题的。我写了100多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但其他人还是可以写100本不一样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历史问题需要反反复复去做研究，历史的讨论没有穷尽。不能认为某人的历史书说了就是这样了，未来的写作和研究还有极大的空间。”

已故艺术批评家黄专曾在《当代何以成史》一文中提出：“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11次再版时，相当不安地讨论了艺术史描述‘当前故事’的危险：‘越走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就越难以分辨什么是持久的成就，什么是短暂的时尚。’的确，当代不能成史，几乎是学术纪律严明的当代史学和艺术史学共同遵循的某种潜规则……不过，当代不能成史并不是人类史学尤其是艺术史学的传统，相反，‘通古今之变’才是中外史学的最高理想……”

“通古今之变”也是吕澎的理想，他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探讨了中国古代画史上的心灵山水、真实山水、程式山水和写意山水。而吕澎着墨更多的，则是他有份参与的中国当代艺术史。

在写当代艺术史的时候，吕澎并没有太多因为时间贴近当下而产生的焦虑。迄今为止，吕澎已经写下三本中国当代艺术的“十年史”——《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

他总结道：“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解放思想’，在封闭的情况下，通过阅读、翻译以及引进西方艺术展览，打开人们的视野。九十年代的关键词是‘走向市场’，是一个开始接触市场大背景的时期。二十一世纪的关键词是‘建立制度’，例如确立了画廊、拍卖、博览会等一系列艺术市场游戏规则。”

张颂仁 让中国艺术家被世界看见

文 | **郑依妮**

张颂仁

九十年代任香港汉雅轩画廊艺术总监至今。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艺术文献库董事。

张颂仁说："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比现在好！现在大家把艺术家的工作当作一种市场现象来关注，而那时是把其作为政治现象、文化现象来关注，所以九十年代艺术家的身份很高。"

在他看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的艺术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检讨自我认识。"七十年代洋溢着缤纷炫目的革命热诚；八十年代是开放和探索，对前景充满憧憬；九十年代开始了一个清醒而不抱幻想的觉醒。"

九十年代，大家发现生活各方面开始走向市场化，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贵了。也是在那时，中国艺术家开始受到国际策展人的关注。张颂仁说："八十年代艺术家都是做给中国人看的，九十年代多了专业观众，就是策展人。"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九十年代走向西方很重要？"张颂仁说，"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八十年代的新潮是美术史的大转变，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探索、实验和转变时期。但由于历史原因，九十年代初艺术家的创作滞后于西方，所以很多人认为九十年代要重新赶上时代。"

张颂仁与栗宪庭的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当时“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参与策划的栗宪庭却躲在二楼。张颂仁在那里见到了栗宪庭，当时他们彼此还不算熟悉。一聊天，栗宪庭对张颂仁说：“这展览就是我参与策划的。”随后向张颂仁介绍了他做的美术史资料。张颂仁对栗宪庭说，希望在香港做八十年代的10年回顾。张颂仁有香港的资源，而栗宪庭熟悉内地的艺术家，两人一拍即合。

1993年，在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大会堂，两人合作策划了“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自此，“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经香港、澳大利亚、欧洲、美洲，历时数年国际巡展，最终风靡西方国际艺术舞台。

然而，两位策展人的主张依然存在分歧。张颂仁并不认同栗宪庭迎合西方“冷战意识”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在他看来，栗宪庭热衷的“政治波普”概念已经不属于九十年代。张颂仁说：“中国内地的美术圈老是要以模仿西方当代艺术去追赶西方的步伐。我总是想去找中国的立场，所以我和老栗不一样。我在1991年已经隐约感受到整个艺术创作圈的心态有明显改变，八十年代整个文化潮已经过期。可是那时大家选的艺术家，还是85新潮的代表人物，所以我就很想做一个关于九十年代新时代精神的展览。‘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的结构就分了六段，有两段是以老栗的风格论作为指标的‘政治波普风’与‘无聊感与泼皮风’。另外四个主题是我分的，包括‘创伤的浪漫精神’‘情意结：施虐与受虐’‘新道场’‘内观与抽象’，主要描述那个时代我所感知的心态。”

栗宪庭认为，1993年有中国当代艺术家参与的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是中国当代艺术正式与国际对话的开端。但在张颂仁看来，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展厅位于边缘展区，其实并没有太多人看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当时“鲜有人至，也无人问津”。张颂仁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真正引起西方关注，主要是通过1994年第22届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张颂仁为此次双年展中国部分的策展做了不少工作。

如果说“天时、地利、人和”是成功必备的三大因素，那么张颂仁在1994年圣保罗双年展上带着中国艺术家的那次亮相，可谓占尽“地利”。当时他邀请了余友涵、李山和王广义等人参展，后来又补上了方力钧和张晓刚。张颂仁把艺术家们参展的作品分为两组，一组和肖像有关，一组和波普有关。

张颂仁明白，如果要让更多人在圣保罗双年展上看见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就必须争取一个好的展位，不能像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那样躲在“偏僻的角落”。于是他费了很大劲，托一位熟人帮忙联系上圣保罗双年展的组织部。当时双年展的副主席是个丹麦人，在巴西最大的广告公司当总裁，也许是出于广告公关的行业触觉，他对中国艺术特别关注，也比较了解中国艺术的可能性。

几经争取，张颂仁最终让主办方把这个中国展览放在了圣保罗双年展的最主要通道上，观众进场一定要经过这个展区。这一次，中国艺术家才真正被世人“看见”。张颂仁说：“后来九十年代好几个大展都通过圣保罗双年展组委会，找到我在展览上介绍的几个艺术家。比方说1995年威尼斯的百年回顾展，主题是关于人的肖像，那个展览是毕加索博物馆馆长策划的，他就是看了圣保罗双年展之后挑了张晓刚和刘炜。”

张颂仁说：“我的角度和内地艺术家不一样，他们是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立场来看，我则把中国摆在整个大时代的转变的全球视野上来看。西方艺术策展人认为这个展览可以让他们看到一个全面的中国。”

张颂仁评价几位艺术家时说：“张晓刚作品的沉重、灰暗，跟方力钧和刘炜的感性、艳丽，在视觉上是两个相对的极端。前者像冥界的守夜人，后者如阳光普照下的无忧客。可作比较的是三个画家都以人物，尤其以亲属或熟络的朋友入画，而透过作品的戏剧性安排，反映

出作者的存在境界。虽然一个阴霾、一个明丽，但两者都受制于相同的现实，那就是迎面的眼前时空，一个无法回避又无法脱身的当下。”

常常有人问张颂仁该投资谁，什么艺术品卖得好。可是“市场喜欢什么东西”这种问题在他看来完全是个伪问题。张颂仁说：“我关心的是美术史怎么往前推，就像乔布斯从来不做市场调查，而去告诉市场消费者需要什么。对我来说，我办展览或者选艺术家，是因为我要表述一个观点，我觉得他们是最有意思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符合我要表述的观点。况且，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艺术市场可言。”

确实，如张颂仁所说，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形成健全的艺术市场，像张颂仁那样向艺术家大批买画的寥寥无几。如今，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形成，人们有了收藏艺术品的意识。太贵的作品普通人未必会关注，但中国的中产阶层开始对艺术收藏产生兴趣。张颂仁认为：“在未来中国艺术品收藏中，中产阶层大概会成为一股中坚力量。要知道，在19世纪的欧洲，巴黎是文化中心，很多艺术作品都是中产阶层收集而形成收藏圈的。”

回顾过去20年来做过的展览，“文字的力量”这个展览是张颂仁自认为做得最满意的。当时他为此展跟美国的策展人联系了三年，因为当时西方人都说他们看不懂书法。然而，张颂仁真正想对西方说的不是书法，而是关于“权力的视觉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传统社会的视觉风景，举目都被书迹文字统领。相对西欧社会，中国的视觉文化特征基本上可说是“文字”的，尤其是书写文字的视觉文化。无论在文娱、教化，还是政权场合，文字的应用除了宣示文义，也成为具体而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势力。

后来，“文字的力量”在纽约国际独立策展人协会的协办下，完成了1999—2002年由台湾到美国的三年巡回展。张颂仁说：“书法最核心的力量不在于字写得好与坏，而在于中国文明史上，书法代表了一个

人的在场。在西方，一个有权力的人的在场靠肖像。书写作为一种权力的视觉语言，代表了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异。”

王璜生 人民需要真正的美术馆

文 | **宋爽**

王璜生

九十年代任广东美术馆副馆长。2000年至2009年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1997年1月，林抗生馆长（左一）、王璜生副馆长（右一）与施工人员在商讨广东美术馆标志的施工安排。

王璜生坦言，九十年代对自己意义非凡。1990年硕士毕业之后，他去了广州，进入岭南美术出版社，最终被分配在《画廊》杂志做编

辑。当时的《画廊》创刊近十年，“虽然印刷精美，观点新潮，但不是很激进”。王璜生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我当时就想采访北京那批自由艺术家，了解圆明园艺术村里的生态。我当时动了脑筋，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说法，把他们称作‘个体艺术家’，而不是‘自由艺术家’，因为个体艺术家能够突显艺术家的个人化行为和创作理念。后来顺利出了一篇报道。在当时的艺术媒体里，《画廊》算是比较早、比较集中介绍这种当代艺术活动的杂志。”

1996年，当时在广东画院任专职画家和理论家的王璜生，正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既不用坐班，又可以画画，他感慨“这实在是太美好的一个职位了”。

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几乎改变他一生事业走向的机会正在悄悄来临。

当时的广东美术馆正在找业务副馆长，但找了很多人都不了了之，最后王璜生意外地收到了这个富有挑战性的邀请。对他来说，副馆长这份工作远不如之前在广东画院的工作舒服自在，但他思考再三，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我还是想做点事，并不是给自己做点事，而是我觉得一个美术馆应该为社会、为艺术、为美术史做点事。”

有一件事情王璜生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广东美术馆还在施工建设当中，他上班第一天去美术馆考察，发现路边到处都是草，他只好绕着草丛走进美术馆，正门在哪都找不着，结果走着走着从一个后门进去了。

这个场景很有意味，正如他离开画院来到这里一样，一切都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当时的广东美术馆还处于“没成熟起来”的阶段，他自己也并不清楚这条路该怎么走，“只知道想做事，但做什么、怎么做，都还是空白”。

“九十年代初期，很多美术馆被认为是群众艺术馆，即便是最好的美术馆，也只是停留在出租场地，然后大家拿钱买空间，最后开幕进去看看这个阶段。美术馆应该怎么做，大家都不清楚。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在我之前的广东美协主席汤小铭和广东美术馆馆长林抗生，他们都已经明确了一个广东美术馆要向国际标准看齐的目标，比如美术馆应该有的六大功能：展览、研究、收藏、教育、交流、服务。”

尽管有了清晰的目标，但落实到具体执行的时候，王璜生直言挑战重重。比如在大的层面上，如何结合好展览和市场；在小的层面上，如何为一个展览命名。“以前的展览都直接叫‘雕塑展’，或者‘广东优秀作品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个方向性的标题，以提示这个展览的特点。像开馆展览‘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二十世纪前半期一个普遍关注的美术课题’这个标题，就很好地提炼了作品跟时代之间的呼应。可以说，广东美术馆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展览题目学的。”

言谈话语之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王璜生对广东美术馆的深厚情感，他不仅为自己所带来的一些改变而自豪，更重要的是，这家美术馆自身具备的特质使得他能够放手去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

广东美术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公共美术馆，有相对更丰富、更开放的文化资源。王璜生的工作重心一方面落在对区域美术的发展上面，包括广东艺术的收藏、美术史的研究活动，也包括一系列公共教育项目；另一方面，他希望举办一些更先锋、前卫的文化活动，因此就有了日后知名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等，这使得广东美术馆很快便在业界声名鹊起。

作为一个画家、艺术理论家和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可以说是全方位“浸泡”在美术圈。和一些单纯做艺术的人的角度不同，王璜生眼中的九十年代显得颇为庞杂。

“九十年代既有单纯的艺术，又有很多诱惑。那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和市场诱惑之间徘徊的时代，很多人的状态是非常焦虑的。当时中国刚刚接触到各种国际大型展览，使得很多事情就没那么单纯了。这些国际大展代表一种市场的介入，这种介入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无论如何，仍然把中国艺术带入国际语境里。有时就会涉及政治因素，导致某些艺术家想投其所好。这使得我们开始思考，中国艺术家究竟应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

王璜生认为，艺术家对社会、政治以及自身的表达无可厚非，“任何一个人或者艺术家，他都会对历史和社会现实有自己的思考、直觉和敏感度，有表达的冲动”，但他同时强调，“艺术家不是工匠，而是知识分子，所以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和担当”。

王璜生认为，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还不多。尽管目前并没有成文的、统一的绝对标准，但有一些问题还需要思考。比如：“作为一个美术馆，哪些是基本要求，哪些是更高要求？这些要求的标准是谁来评判的，是社会、民众、专业机构，还是什么？我们在评判之后想要获得的目标是什么？”

他认为，不论是九十年代，还是现在，这些规范在中国仍然缺失。政策支持不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更是几乎没有，“就连媒体、专家、评论家，都是对好的说、对不好的不说，而民众的声音又是这么弱小。在国外，艺术评论家如何评价一次展览、公众观展后的反应如何都是被高度重视的，但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除此以外，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隐蔽的问题，“现在很多政府基金，评选、专家都是同一拨人，互相之间没有监督和评判机制。因此，很多根本性的东西还远远没有解决，也难以解决。这样下来，中国艺术的未来发展还是很令人担忧的”。

尽管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但中国的美术馆在九十年代仍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转变”。“1997年，在南方出现了三个新的美术

馆：广东美术馆、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和关山月美术馆。这三个馆都是新馆，在功能上参照了国外或者港澳美术馆的做法，从中获取了一定的经验。其实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直接向国外美术馆吸取经验还有些距离，我们都是向香港和台湾学习的。我当副馆长的时候，就是把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的著作《美术馆行政》当作教材；另外，香港艺术馆馆长也给过我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所以，九十年代是中国的美术馆步入正轨的阶段，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侯瀚如 一个“艺术导演”的世界观

文｜**冯嘉安**

侯瀚如

九十年代任独立策展人。现任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艺术总监及古根海姆策展顾问。

罗马与北京相差七个时区，夏令时又让罗马时间比平时快了一个小时。身处罗马的侯瀚如每次与国内越洋沟通，都要计算这个时间的差异。他现在的身份是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艺术总监和古根海姆策展顾问。

1990年侯瀚如从北京到达巴黎，作为一名外籍人士进入了当地的艺术圈。如今他已是法籍华人，在意大利和中国工作时，却又戏剧性地再次成为外籍人士。侯瀚如“独立策展人”的头衔，往往被人加上“全球”“国际”之类的前缀，暗示着他是奔波于全球各个艺术展场的“空中飞人”。

侯瀚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与青春期见识了“文革”的冷酷，八十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同时对中世纪及现当代艺术感兴趣，并将注意力逐渐转向中国前卫艺术。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侯瀚如也是筹委会一员。

告别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告别了中国，侯瀚如开启了他的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还是处于为生活挣扎的时期，20多年过去了，我也老了很多。当时做事的方式是比较独立，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是在九十年代最终形成的，这些观念对我今天的工作很重要。”九十年代离今天并不遥远，但谈起20多年前，侯瀚如还是感慨那是一个宝贵的时代。

“从零开始”是侯瀚如1990年到达巴黎时的状态，本来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协助策展人费大为的项目。侯瀚如在法国南方遇见了女友艾华莲·乔安诺（Evelyne Jouanno），并一起定居巴黎。这位法国策展人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侯瀚如也在慢慢变成一个巴黎人。

这对策展人夫妇在九十年代的生活算不上丰裕，期间，他们的女儿降生。1993年，侯瀚如夫妇在巴黎寓所一条5米×1米的狭小过道上策划起系列展览，每月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参展，坚持了一年多。

通过三年来与巴黎艺术圈的交流，以及因为过道展览逐渐积累起的名声，侯瀚如在1994年收到了芬兰一家艺术机构的邀请，让他策划一个关于中国艺术的展览。这是侯瀚如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机构的邀请函，他也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侯瀚如为此交出的作业是展览“走出中心”（Out of Centre）。

在融入西方艺术圈时，东方人的身份，既是侯瀚如的优势，也是他的短板。侯瀚如说：“我不是在法国长大和读书的，所以我的人脉关系不能跟我的法国同事们相比，也正是这样，我要在其他方面去努力。由于我的东方背景，所以我走进巴黎艺术圈子时，又会以西方以外的目光看待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更自由、更具批判性地看待问题。我个人的独特性，可能也是我的工作受别人重视的原因。”

由此，侯瀚如开始诠释“独立策展人”这一角色的含义，他说：“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独立策展人’的概念，这个群体不大，最终能坚持下来的也不多。‘独立’意味着策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展览，当然也会像其他自由职业者那样，随时面临着经济来源的中断。”

九十年代末，侯瀚如和汉斯·尤利希·欧布里斯特（小汉斯）一起，做了一个至今仍不断被人提起的项目——“运动中的城市”(Cities on the Move)。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维也纳分离派100周年，由分离派艺术馆推出的项目。时值九十年代亚洲经济起飞，欧洲人对亚洲的艺术也十分关注。于是，该机构邀请侯瀚如和小汉斯联手策划“运动中的城市”。

其实，侯瀚如和小汉斯早年就认识，他们在1990年几乎同时到达巴黎，侯瀚如从中国出发，小汉斯从瑞士出发。他们所做的非正式空间展览也有相似之处：侯瀚如在家里的过道及闲置的私人物业和街头商店做展览，小汉斯在厨房和酒店做当代艺术展览。因此，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对于“运动中的城市”，侯瀚如提出：“九十年代亚洲很重要的社会状态是城市化，这是亚洲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语境。我们不让亚洲以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而是寻找艺术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当代性。亚洲城市发展的模式与欧洲城市的历史路径是有很大差别的，亚洲的城市发展更为多元，逻辑是非线性的，在很短时间实现了很多事情，这种模式可能是以后世界发展模式中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思考这些问题，而非简单地展示艺术作品。”

在举行展览之前，侯瀚如和小汉斯在亚洲各地做了很多研究。整个展览也持续了三年多，从1997年到2000年，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和一群艺术家到某个城市，把展览演绎一遍。他们最终在全球7个国家巡展，期间调动了全球超过140位艺术家。

侯瀚如说：“我们不是把作品运到不同的城市，而是每到一个城市，就给作品建构一个新的形象，过程中也有新的艺术家不断参与。整个展览就像在每一个不同的城市重新成长，重新发明。我们通过这个展览，发明了一种新的策展方式。”

如今，侯瀚如已经不是九十年代那种完全独立的策展人，他需要为机构工作，例如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基金会等。比起九十年代，侯瀚如现在面向国际的范围更广，整天要在全世界飞来飞去。

但是，他说：“不变的是九十年代形成的文化批判性原则，只是运用到不同的情景中去。”

八十年代是贴近理性主义的时代。经历过“文革”、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意味还非常浓厚。

发生了一系列国内外大事件之后，九十年代的中国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侯瀚如说：“中国的当代艺术也需要重新找自己的方向。相对来说，九十年代的当代艺术没有了八十年代的激进和理想主义。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批‘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同时也出现了反思历史的艺术家。后来，艺术家所运用的媒体也更为丰富，多媒体艺术在九十年代真正成熟起来。”

侯瀚如虽然九十年代一直身处法国，但跟国内的艺术家还一直保持书信联络，每周会收到大量国内寄来的资料。到了1994年，侯瀚如第一次回到中国，他在广州跟“大尾象艺术工作组”见了面，给他们的展览贡献了一个名字——“没有空间”。

侯瀚如说："当时国内还没有策展人的概念。策展人制度在2000年之后才在中国生根发芽，九十年代为数不多的当代艺术展览，几乎都是艺术家自己策划的。到了2000年，上海双年展形成定期的项目以后，策展人制度才落实下来。而其他美术馆也希望效仿上海的经验，例如王璜生成为广东美术馆馆长，大力推动当代艺术走进广东美术馆，这让广东美术馆有机会收藏部分当代艺术品。"

谈九十年代当代艺术的话题，绕不过谈广东。采访期间，侯瀚如一直以粤语跟《新周刊》记者对话。生于广州的侯瀚如特别关注珠三角地区的艺术家，先后把杨诘苍、陈劭雄、林一林、徐坦、梁钜辉、郑国谷、杨勇、蒋志、曹斐等广东艺术家介绍到国际艺术圈，他把广东称为"现代性的特殊实验室"，因为这里比国内其他地方更具当代性，表现在对文化多元的尊重以及对市民精神的追求。

侯瀚如的好友、广州美院教师陈侗认为："九十年代，北京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广东一不小心便担负了一个全国的使命。"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不少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华南地区。

侯瀚如说："广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里一直是中国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地方。八九十年代影响中国最深刻的一个来源是香港，香港文化对中国内地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地方就是广州，而香港文化本来也是广东文化的重要部分。所以广东地区形成了一种中西混杂的地域文化。"

后来，侯瀚如以格拉斯哥一家中餐馆——"广东快车"（Canton Express）命名了广东当代艺术家群体，并把他们带到了威尼斯双年展，这是珠江三角洲艺术在国际上的集体亮相。

他说："因为远离政治中心的缘故，在广东生活、长大的人对很多问题都会有独立的思考，他们的价值观、知识结构，可能跟北方人有

很大的区别。广东艺术家的语言、思想和表达方式和北京艺术家是很不一样的。”

九十年代无论是在广东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当代艺术都处于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前夜阶段，侯瀚如称之为“半地下色彩”：“其实八十年代的当代艺术也是非常‘地下’的。到了九十年代，艺术家开始在个人的层面思考问题，所以很多‘地下艺术’其实是艺术家寻求自我的过程，让艺术与日常生活联系得更加密切。”

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是跟国际艺术的语境发生直接的关系。八十年代艺术圈思考国际化、现代化问题，往往是源于书本的知识以及自己的设想。九十年代则是直接走进西方的圈子，市场的介入、国际的展览邀请，都让中国艺术家有机会参与西方的艺术运动。

侯瀚如称：“这是一个有趣并多少有讽刺性的现象：九十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国内是‘半地下’性质的个人活动，在国外却登上了很多公开展览的舞台。”

岳敏君 创作需和现实有所关联

文｜**宋爽**

岳敏君

艺术家，九十年代曾参加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等。

岳敏君认为，中国九十年代的艺术圈，从懵懂到清晰，走得漫长而艰辛，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路。

“85新潮那会儿，艺术家都懵着呢，还处于刚刚接触到西方世界的震惊阶段。到了九十年代，世界风云突变，这就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大家在创作上更有的放矢，更接地气。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最终从虚无缥缈回到踏踏实实的状态。”

岳敏君自己也身在其中。1985年，岳敏君还在上学，和当时很多年轻画家一样，对西方艺术的各种流派、演变过程充满好奇和了解的欲望。但后来，这种感受开始变淡。

他说：“我当时总琢磨艺术形式、艺术语言之类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和我自己的生存状态毫无关系。比如对艺术语言的探索，可能也很好，出来的东西很漂亮，但你在做那种探索的时候，心里是不满意的，是无法接受的。最后发现，还是现实更重要一些。画的作品必须跟生活联系起来，你自己才能满意。”

1990年是岳敏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年前，他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分配到华北石油教育学院当美术老师，过着“每礼拜集体

读两次报，按时上班，没事开会，举止受控制”的“难受”生活。在熬了快一年之后，他决定离开，来到北京，成了一名自由艺术家。

在当时的岳敏君看来，“自由”的状态比“艺术家”的身份还要重要一点。“没有人管了，这家伙开心了，每天开心”，他形容当时的感受就是“特别过瘾”。

“在九十年代以前，自由职业者比较少。除非像南方人那样做生意，他们知道怎么把袜子从这儿倒腾到那儿去卖，北方人在这方面不灵光，哪懂这个。所以只有那些凤毛麟角出来做生意的人算得上自由职业，大部分人还在体制里待着。”

尽管听上去潇洒又不羁，但在那个年代，主动脱离体制、扔掉铁饭碗仍属于少数人的莽撞行为。岳敏君一头扎进北京西郊的圆明园艺术村，当时的艺术村盛况空前，挤满了全国慕名前来想大干一场的年轻艺术家。但和其他人一样，他很快便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在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里可以看到，这些雄心勃勃的画家不得不面对疲软的现实，“这里有湖水、树林和圆明园的废墟。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凑齐每月要交给房东的房租，卖画并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甚至主要靠别的手艺来维持生活”。

话虽如此，时隔二十多年，我们还是得承认，这些“愚蠢”地选择了体制之外的道路、纵身跃进未知的艺术家，成就了某种形式上的自由，这为中国艺术界后来的探索之路带来了生机和更多的可能性。

任何时代都有其不可替代性，九十年代的中国更是如此。“当时很多行业的方向都不明确，所以那时候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对艺术家来说，九十年代连画廊都没几个，完全谈不上所谓‘和世界接轨’。直到1995年、1996年，中国艺术家才开始和世界有了交流，逐步建立了自信。”

九十年代的中国，仍处于过渡之中。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人经历了从震惊、抵抗、反观到适应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曾经在内心世界激起的千层巨浪已慢慢平息，对于众多敏锐又富有表达欲的中国艺术家而言，这个时代给予了他们无穷的灵感。

让岳敏君扬名立万又饱受争议的“大笑人”系列，正是他反观生活之后，摸索出来的自己。

岳敏君说：“我当时看到‘文革’时期画的工农兵形象，他们的表情都是笑的、开心的。我感觉笑的形象是不会受到限制的，因为至少看上去表现的就是一个积极健康的事情。”

就这样，“大笑人”一发不可收拾，他似乎感受到了这个闭眼不问世事、咧嘴嘲讽现实的形象背后，所代表的一切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现实，一个立体、庞杂、独特的中国现状被推到了世界面前。

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一旦作品中某个艺术形象反复出现，人们便马上有了质疑的理由。有人说岳敏君没新招了，江郎才尽，外媒评论他“没有超越滑稽的时政讽刺漫画”。最初，岳敏君很难接受别人评论他作品的重复性，但后来他慢慢找到了理论上的立足之地。

“最终他们会发现这是我创作这个系列的本质，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我希望用喜剧的形式把中国人悲剧的一生表现出来——重复是必须的，这样才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才能无处不在。”

此外，重复会获得所谓重要性，“一开始，这个形象并没有这么简化明了，过渡、衣服，我搞得还挺细致。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作品最后需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我发现，画一个单一的人物形象，要不断地突显它的重要，去掉一切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才会有人关注这个形象背后的东西，比如说理解一个时代。”

不可否认，“大笑人”的确成了岳敏君的代表性符号，甚至成了岳敏君本人。但这种剧烈的突显和强调带来了问题，岳敏君的其他作品系列，比如“处理”“迷宫”等，受到的关注远不如“大笑人”，没有引发什么讨论，也不为公众所知。

对此，他曾表示无奈。“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艺术家受到社会逻辑思维的控制，只有在这个思维框架内表现得不错，大家才会认为你是艺术；如果不在框架内，大家就觉得你有问题。”

他发现，艺术史家会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是线性的，作品是逐渐演变的。“这就造成你一旦成名或者获得关注之后，就只能按照社会所理解的那个你走下去了——你不能轻易变换风格。比如我今天画了一张和昨天完全不同的作品，别人简直就不知道我是谁了。他会认为你现在弄的这些东西是对过去审美的背叛，是叛徒。他们更希望艺术家一点点起变化，符合逻辑地起变化，就跟电影一样，必须得有个前中后结尾，少一个大家就觉得不圆满似的。这都谁规定的？”

以上言论可以看作岳敏君对其他作品受到忽视的某种解释。“大笑人”之所以火遍九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圈，甚至对艺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都对其有所耳闻，是因为它用最直最傻的方式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

“大笑人”所表现出来的阿Q精神和笑容之后的悲剧性被人津津乐道，而身在其中的人们笑而不语，心知肚明。这正是岳敏君想获得的效果。

“我觉得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创作的东西必须和现实社会有关联，他们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反馈，有一个回答。”

岳敏君认为：“九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情，是整个社会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就是这个社会还要继续往前走，而发展经济才是最紧迫的，因为经济可以摆脱所有的困境和矛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策略

确实有效，但同时，逐渐成熟的环境、富裕的生活已经让很多人感觉不到内心的矛盾了。比如吃饭问题，原来吃饭很困难，经常会饿个一两顿，可现在很少再有了。”

BBC网站曾有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现今的年轻艺术家，已经不再像九十年代那批人那样，热衷于在作品中讨论政治议题、世界格局等大话题，而是转向自身，开始探索私人领域，诸如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体验，主题变轻、变“小”。

岳敏君对此完全不认同，他声称：“现在和九十年代并无二致，所有艺术作品都是和政治、生存有关的，因为它主导了我们所有人的行为。”

这样的说法听上去义正辞严，和如今这个流行小鲜肉、美女主播、全民卖萌、拍块橡皮就是概念摄影师的轻佻时代有些错位。和现在那些欢脱而张扬的年轻艺术家相比，九十年代涌现的“老一辈”艺术家，已经浑身烙满严肃深沉的时代印记，从言谈举止中，可以察觉到他们多半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定义和要求自己。正如岳敏君所言的“使命感、责任感”，这六个字彻彻底底地“暴露”了九十年代艺术家的时代特征。

而面对“艺术能否改变世界”这样一个听上去就让人忍不住唉声叹气的问题，岳敏君却出奇乐观。他认为，艺术对人和世界的改变，不是那种事件性的改变，比如一场空难可以造成《民用航空法》的变革，或是遭遇失恋会让一个开朗的人郁郁寡欢。

“那种改变特别缓慢，是一种不自觉的改变，能慢慢渗透到你的血液里，比如艺术会改变一个人喜欢穿的衣服。你想想，一个人喜欢这件衣服，不喜欢那件，这些观念是谁告诉他的？你买什么东西都牵扯

一个审美问题，不可能是闭着眼买的。包括最不懂艺术的人，即使他把捡回来的垃圾堆在某个位置——那他为什么不选另一个位置？这显然都是审美的选择。”

尽管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的艺术家们不断地发出声音、制造话题、博人眼球，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很多问题仍然坚挺；尽管安德鲁·怀斯的隽永名作《朱庇特》悬挂在布什的起居室墙上（这多少证明小布什不是对艺术一无所知），后者还是在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人们不禁要问：“然后呢？到底哪不一样了？”

张晓刚 活在迷茫与反省之中

文 | **罗屿**

张晓刚

艺术家，九十年代曾参加1992年广州双年展、1993年“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1994年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1995年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等。

对张晓刚而言，1992年，在他的个人履历上是可以断代的年份。

年初完成作品《创世篇》后，张晓刚忽然对过去的作品产生质疑。他感觉失去方向，不知如何再画。而此时，中国的艺术环境也发生了些许变化，是回到个人的艺术道路，变成风格主义艺术家；还是参与文化的变革，去更大的背景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定位？张晓刚充满迷茫。

此时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降临在他身上。带着对现状的思考、不满和质疑，1992年6月，张晓刚获得赴德国等欧洲国家“学习”西方艺术的机会。对他而言，这无异于一次朝拜之旅，朝拜那些他为之神往的西方艺术圣贤。这次行程后来证明对他的艺术有着某种转折性意义。

在欧洲学习的三个月里，张晓刚一头扎进博物馆，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看原作上。“我想借这个机会彻底了解西方绘画艺术，从尼德兰时期开始有油画概念的初期作品，一直到当下西方最前卫的作

品，我都不放过。”那时，张晓刚每天的生活就是买好面包、矿泉水，泡在博物馆整天不出来。

他说：“1992年的德国之行我运气不错，正好赶上每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当时整个人一下子懵了，惊觉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太刻板、狭窄，我们对西方当代艺术这一模仿对象的理解是受到歪曲的，是想当然的。”

在德国期间，有人劝张晓刚留下。“留下，不过是画画、卖画、过日子，无非多了一个模仿西方油画的画家，找个画廊做代理，然后进入绘画界的艺术小圈子。”对此，张晓刚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他当时的决定是，回到中国。

然而，回国后的张晓刚几乎一整年没动画笔。“我在德国看的西方作品越多，越是深感中国当代艺术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它很深厚，只是形态还不够明确。”正是这种东西打动了张晓刚。“中国的文化和现实资源的丰富性是西方所没有的，我们这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一个历史性挑战是怎样将其表达出来。”

1992年是彻底空白的一年，是张晓刚寻找自我的一年。在他心中，一个念头一直在盘旋：“我要走的路，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和个人的。”那时，他在重庆和昆明两地生活，整日和朋友聊天，看他们画画，就这么混着漂着，生活清贫，每月靠两三百元工资度日。“当时就是感觉心里有一种东西要出来，至于那是什么、什么时候出来，我也说不清楚。我在欧洲拍了3000多张反转片，回国后到处放，与大家交流。”

彻底空白的一年，也是张晓刚悠闲又痛苦的一年。1992年前后是中国的重要转型期，生机勃勃地出现了各种机会和可能性，也有各种诱惑。体现在艺术界，是画家们在创作选择上分道扬镳。当张晓刚从欧洲回国后，他发现国内已经变了，较好的画家都与画廊签约进入市

场，开始卖画。1992年，他将去欧洲前完成的《创世篇》送去参加“广州双年展”，这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国内变化之大：“一个是港台流行文化的影响，非常快速广泛；一个是艺术市场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体制的确立。”

在如此热闹的美术界不动手作画，张晓刚显得落寞且怪异。“但我心里是有东西的，我在找一个切入点，既吻合我的气质与性情，又与中国当代文化有关系，还必须是一种新的东西。”但找到这样一个三者结合的切入点谈何容易。“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假如找不到这个切入点，我可能什么都不是。”

正是1992年赋闲的一年，张晓刚给了自己回到起点的机会，“我开始集中精力观摩我周围的生活”。1993年年初，一位意大利艺术评论家问起他欧洲之行给他带来的变化，张晓刚告诉对方这样一个细节：去德国前，他从没真正地、认认真真地看过一张中国人的脸；而到了德国，他发现西方绘画大师都在画自己身边最熟悉、最贴近的事物和人物。“从德国回来后，我才真正看清楚了中国人的脸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传统绘画里中国人的脸是很真实的，但到了四五十年代，我们中国人不敢面对自己了，开始用西方人的美学模式套用在中国人脸上，出现了一种经过理想化的、美化的东西。”

这时，一个想法慢慢在张晓刚心里成形——画一张中国人的脸。

1993年恢复画画的张晓刚，最初画了一些试笔性作品——天安门、身边熟人的肖像，“但还没找到能包容我基本感受的那样一种具有符号性质的形象和语言”。在他看来，中国人生活在多种压力中，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压力。1993年，已经35岁的张晓刚对他口中的压力深有体会，他想用绘画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出来。

一次回昆明看望父母，偶然翻看家中老照片，让张晓刚有了灵光一闪的感受。“我在父母年轻时候的合影及个人照上，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这种缩影既具有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实性，又具有当代艺术所推崇的那种影像上的符号性质。”发现这一点后，张晓刚相当兴奋，因为这体现出他一直在找的那种个人私密性和公共标准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标准化和私密性集合在一起的‘家’里，大家互相制约，互相消解却又互相依存。这种‘家族’的关系正是我要表达的主题。”而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的“大家庭”系列作品。

“大家庭”从有想法，到构思、起稿、修改、完成，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开始时，张晓刚更忠实于从照片中获得的东西，包括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些服饰等细节。1994年后，他意识到自己只需要画“一个人”。“他可能是男的，也许是女的，只不过是从发型和服装上界定而已。这样更能够突出‘家庭’的主题和中性文化的感觉。”于是，照片从此只为张晓刚提供一种构图和氛围的参考。

他把照片分为“全家福”“同志照”“情人照”和“标准像”几个类型，然后以一个人的面孔作为模式，重复出现在不同的画面上。“有人说我是反绘画的画家、反肖像的肖像画家，也曾有人向我提议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准确的复制效果，但我更喜欢用手绘形成的‘偏差感’，因为这样可以加强某种‘近亲繁殖’的感觉。”

为了画出某种虚幻和阴柔的冷漠感、距离感，张晓刚的作画步骤非常严格——用很薄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平涂上去，每一层都是重复上一层的工作。一般一个面孔要涂上四至五层。最后再用干涸的颜色画出人脸上的光斑，形成两种不同的肌理对比。“总的来讲，那些年我在绘画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不断做减法，将过去曾一度自我陶醉的某些‘绘画效果’几乎全部抛弃。”

九十年代初，张晓刚曾这样预言自己的艺术：“像我这一类艺术家将与‘偶像时代’格格不入。如果这个时代一天不停止以制造轰动效应

为目的，这类内向式的艺术和艺术家就不可能真正引起关注。”

但历史就像一个无法琢磨的巫师，与他本人的预言相反，“大家庭”这样的“内向式”艺术从产生开始就成为各类艺术批评和意识形态“凝视”和过度阐释的对象。已故艺术批评家黄专曾说：“张晓刚把自己想象成孤独的梵高，而现实却给了他沃霍尔的待遇，这个现实更像是对他自己预言的某种嘲讽。”

2000年后，由于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他逐渐从艺术界进入大众传媒关注中心，而这位“最贵的艺术家”不得不一次次向外界阐释有关“大家庭”的创作意图以及它背后的时代。

张晓刚说，创作“大家庭”那几年可能是中国艺术家最难堪的年代。“各种艺术样式都已十分饱和，从未体会到‘选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选择本身往往体现出某种个人的艺术感觉。”这种难堪，在1996年张晓刚和黄专进行的一次对谈中也有提及。

张晓刚自己也不止一次对外界表示，“大家庭”画得让他想吐。“1994年画出‘大家庭’，到1999年几乎没停过，因为我画得慢，总是忙于画，来不及思考。每个展览都问你要作品，我记得一年有十几个展，我也不懂选择，很多时候碍于情面。比如正常情况我一年可以完成十幅作品，而且能够把握作品的质量，但由于各种展览可能要求我拿出二十幅作品，你绝不能说由于数量太多而有几幅画得不好。这绝不能代表一个成熟艺术家的水平。”

1998、1999年时，张晓刚自觉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自己将被抽空枯竭，于是他画了一些新的小稿，想开拓一种新的绘画主题，只是仍旧没有时间去真正实现。1999年，张晓刚从成都移居北京，其中原因既与个人家庭有关，也与他想离开“大家庭”画一种新的东西有关，那时的北京正变得包容、开放。

“等我再回成都，发现差别越来越大。2000年人们都很浮躁，对曾经很认可、很相信的东西也遗忘了。大家都愿意谈现实的东西，怎么做展览、怎么出名、用什么方法去做。那会儿谈绘画本身谈得少，大家都是竞争的关系。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东西之后，老被人摇来晃去，一会儿告诉你这是真的，一会儿告诉你那是真的，从小到大，永远在失忆和记忆中挣扎。”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想法，2003年心慢慢静下来的张晓刚有了创作“失忆与记忆”的想法；2006年他开始画环境，完成《里和外——关于社会主义新风景及家庭环境》；2010年到2014年，他尝试了装置和雕塑，在创作上打开了新的空间……

张晓刚始终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压力从不是来自虚名，而是来自创作。“压力和灵感是每个艺术家都在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事情。”而对于已成名的艺术家来说面临一种选择，是固守已有的成功，还是继续探索、继续往前走？“我是一个喜欢不断反省自己的人，反省使我不断改变。”张晓刚说。



1993年，画家方力钧(右一）从“圆明园艺术村”搬到“宋庄艺术村”。（图/肖全/FOTOE）

艺术辞典

辑 | **冯嘉安**

/ D /

当代艺术 1990年，王广义最早提出“当代艺术”概念，很多艺术家已经明确不应该继续保持现代主义立场。这个词被批评家和学术界给予了大量学科性的解释。1993年，“当代艺术”彻底从“现代艺术”脱胎而出，开始构成整体性的力量。

地下艺术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现代艺术展览屈指可数，并处在不合法的地位，“地下艺术”概念就出自这个时期。九十年代末期，以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为标志，“地下艺术”逐渐走到“地上”。

/ G /

观念艺术 九十年代，包括装置、录像和行为艺术的观念艺术成了很多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方式。北京的宋冬、尹秀珍、王晋、“新刻度小组”，上海的施勇、钱喂康、宋海冬、胡建平、倪卫华、王南溟，杭州的张培力、耿建翌、杨振忠，以及广州的“大尾象小组”分别进行了不同的观念艺术实践。

广州双年展 1992年10月，中国首个双年展“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在广州开幕，从此叩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大门。“广州双年展”

设文献奖、学术奖和优秀奖，王广义和李路明都获得了最高奖——文献奖。

/ M /

盲流艺术家 一些艺术家九十年代初辞去单位工作，从事艺术创作。他们的选择意味着失去工资收入、公费医疗以及大城市的户口。

/ N /

女性艺术 九十年代兴起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讨论女性艺术。1990年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女画家的世界”展，到1995年，以女性艺术家为主题的专题展大量出现，《江苏画刊》出版了“女性艺术家专辑”，女性艺术被认为是1995年中国美术界的“第一大景观”。

/ S /

圣保罗双年展 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1994年开幕，张颂仁负责中国部分策展，邀请余友涵、李山、王广义、方力钧和张晓刚等中国艺术家参展，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为西方所关注。

实验水墨 1996年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及其相关展览，使得实验水墨成为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最为重要的艺术现象。

/ W /

玩世现实主义 “玩世现实主义”作品呈现出的无聊情绪和“一点正经都没有”的“泼皮幽默”，是一种反叛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倾向，代表画家有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等。

威尼斯双年展 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1993年开幕，经栗宪庭推荐，该届双年展的策展人博尼托·奥利瓦邀请了14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展，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的首次出场。

/ X /

新生代艺术 “新生代”即改革开放时期成长的那一代人，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念大学。他们的艺术关注近距离的个人生活，对“人类”“终极目标”“大灵魂”“拯救”等宏大叙事不感兴趣。

新文人画 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艺术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新文人画”不满近现代“中国画”用写实主义造型观代替文人笔墨的韵味，多是强调对“与书法书写性有关联的绘画性”的重新继承，代表人物有边平山、朱新建、陈绶祥、田黎明、李津等。

/ 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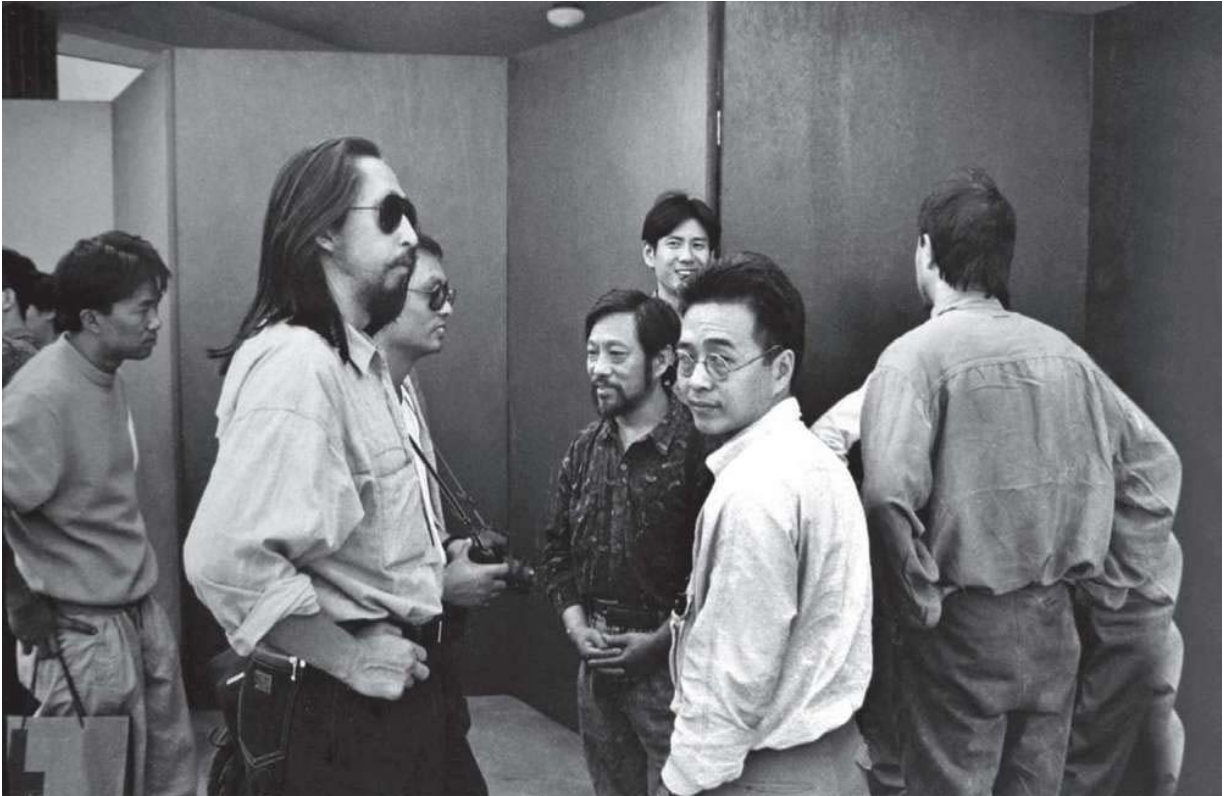
圆明园艺术村 九十年代初，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村落陆续聚集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追求自由创作的青年艺术家。1995年后，圆明园艺术村的画家陆续离开，搬往宋庄艺术村，宋庄成为艺术家的新聚居地。

/ Z /

政治波普 指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相继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潮流。这种艺术潮流采用西方波普的艺术语言形式，结合人们熟知的商业符号和政治形象来表达某种幽默、荒诞、嘲笑与反讽的意味。王广义、李山、余友涵、魏光庆等艺术家是中国政治波普的代表。

中国美术学院 1993年，“浙江美术学院”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它是中国唯一一个美术学国家重点学科所在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学历的中国美术类大学。该校建于1928年，时称“国立艺术院”；1929年，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8年，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

（本文部分语义解析参考吕澎著《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及邹跃进著《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



1992年“广州双年展”开展前，左起：曾浩、王广义、张晓刚、栗宪庭、周春芽、魏光庆、叶永青。（图/肖全）



1992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票抽签表。(图/陈远忠）

九十年代
经济

谁在黄金海岸

谁在烽烟彼岸

你我在回望那一刹

彼此慰问境况

——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代打工族的青春与爱情

文｜**赵渌汀**

1994年年初，黎永汉第一次见到火车站。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兴奋之余，他拉着湖南同乡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一气之下，他和两个同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走了一夜，到顺德后却停留了十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里借了200块钱，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打个零工”，顺便“看看世界”。长途大巴在107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驻马店带到了东莞，“屁股蛋子都麻了”。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晁停已做足准备：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办身份证时硬是给改成了1977年。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以来，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九十年代后期，这个数字达到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湖南人黎永汉和河南人晁停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九十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实写照。

离开湖南永州蓝山的家时，黎永汉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对着神龛一通絮叨。“山里人都信这个。”黎永汉说，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出远门就得来神庙里给山神讲讲情况，“在外打工的

在走之前都来这边拜山神，走之后就有神佑啦。”那是1994年4月12日，27岁的黎永汉第一次和同乡出远门。

山神似乎并未庇佑黎永汉。平生第一次火车之旅，他和老乡的钱包就在火车站广场被偷，他的钱包里有家人凑的300块。“见识到大城市的治安了。”黎永汉笑着回忆，“没钱，不还有腿吗？”于是两人徒步走到顺德找老乡借钱，一走就是一整晚。

九十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在八十年代末率先探路工业发展，并在九十年代末将一大批乡镇企业私有化，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不找市长找市场”。

黎永汉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经老乡介绍，他得以进入厂区流水线干活。通过老乡推荐进厂，这可能是所有九十年代打工族屡试不爽的谋生技能。在一顿饭、一瓶酒和一包烟的刺激下，那些已在工厂干活的老乡往往会在微醺中拍拍胸脯。一句“包在我身上”出口后，那些刚到不久的打工者也就放下心了：进厂这事儿十拿九稳了。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的新宁路上，九十年代，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黎永汉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在装备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块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工资涨了100块。那是1996年，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老人”，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随大流”来到东莞，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市泌阳县割草、喂牛、养鸡、种地。“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问去哪里，回答都是广东，说那里机会多，钱好赚。”

从驻马店到东莞，晁停买了张长途车票和同伴一起上路。“当时虽然穷，但买车票的钱还是有的。”据他介绍，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家家户户仍是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佛山、东莞、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就沿着铁轨走。”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

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外来打工者）进行管理。九十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

“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讯。”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200元/月），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女方和他的经历类似：同样在珠三角打工，同样一人漂泊在外。晁停在东莞，对方在中山。回家后双方立刻就订婚了，晁停的父母给对方家长送了1000元的礼金。“在当时真是不小的一笔。”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

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九十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

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的东莞遍布轻纺、陶瓷、制鞋、电子产品和玩具工厂，其中大部分来自港商、台商的投资。自八十年代起，香港制造业成本上升，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

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这是他在厂里的第四个年头，不少年轻工人都信任他，他被选为职工代表前去与厂方谈判。“工厂领导态度很好，承诺下个月立刻全部补上，大家都很满意。”一个月后，黎永汉的工资果然全部补齐，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厂方辞退。


1992年，深圳，元旦期间，民工们难得有一次免费玩卡拉OK的机会，他们唱得很投入、很动情。（图/张新民/CFP）

都说“枪打出头鸟”，但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九十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被辞退的工人看到黎永汉并未受到利益损伤后，认为是厂方与黎永汉在“单线联系”。“他们骂我是内奸。”

晁停却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跟厂区谈判。入厂不久，他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晁停特别气愤，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那倒是家正经的厂，好几千号人呢。”在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厂里，他被分配至喷漆部，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待遇上去了，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寻呼机，别在腰间威风凛凛。“其实就图一好看。说实话，九十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十点钟，哪有时间玩寻呼机啊！有人呼我也没空给他回啊！”

在流转各类玩具的流水线上，晁停与一个女工，同时也是老乡产生了感情。一个周末上午，晁停带着女友“去东莞附近乱转”。“我在市场上买了副当时特流行的随身听的耳机给她，她别提多高兴啦。”

两年后，晁停和女友双双辞职，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2004年，他们重返珠三角，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而是去佛山。“快40岁了，做不动流水线啦，不过真怀念打工的九十年代，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这些都是九十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九十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黎永汉则在这一年来到东莞。1997年的那次讨薪风波后，他开始检讨自己。“九十年代给我的感觉就是，千万不能每次都做出头鸟。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换个环境，于是便想到了东莞。我要在‘世界工厂’从零开始。”

晁停计划在佛山待几年后回家。“驻马店现在发展得很快，高速修起来了，高铁也有设站。城市现在大力发展工业，机会多得很哩。”

由于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增高，珠三角在九十年代壮大起来的部分制造业企业和工厂，在近几年纷纷迁至内陆城市。那些曾经发展过慢的中部城市，则抓紧时机开始新一轮“工业大跃进”，正如九十年代的珠三角。

“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人家会看不起你哩。”晁停说。与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我看就不准确。九十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晁停说。

黎永汉不这样认为。九十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九十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总比待在老家好吧？”

“网络新闻教父”
陈彤新浪如何成为新闻门户？

文 | **邝新华**

陈彤第一次上网是在1997年2月，那一年他还在北京理工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设计早就做完，泡中关村是他的爱好。春节刚过，他来到哥们儿王川在中关村的小公司，打开一台Win95的电脑，拨号，上网。陈彤打开IE浏览器，在键盘敲入www.cnn.com，回车，几张韩国驻华大使馆周边的新闻事件照片扑面而来。

19年后，作为一个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VOA（美国之音）铁杆粉丝，陈彤清楚记得当时的震撼：“彩色清晰的照片，还有CNN鲜艳的红色logo，比以前的广播强太多了！”

互联网给陈彤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在陈彤心中种下了一个新闻理想。“我是一个极度渴望获取信息的人。”把CNN关掉，陈彤打开了第二个网站——后来让他实现新闻理想的地方——四通利方体育沙龙论坛。

当年，国内人气旺的论坛不多，因为能上网的人并不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1997年11月第一次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当年上网用户数只有62万。那时的电脑大多数还没有中文系统，四通利方的主要业务就是汉字系统。四通利方论坛最早是针对客户搭建的售后技术论坛，里面有一个体育沙龙版块，这是吸引球迷陈彤的地方。

《南方体育》一篇回忆文章称："类似四通利方体育沙龙这样的非IT专业类中文论坛，在当时的互联网上非常罕见。"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彤在网上碰到论坛的创始人之一李嵩波，陈彤给他发电子邮件说："假如我去做体育沙龙版主，访问量能增加一百倍。"

1997年4月，陈彤成为体育沙龙义务版主。"我就想办法自己编写，从国外的互联网站寻找体育信息放上来，把这个窝搭建好。"陈彤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茶馆的老板，而不是饭馆，要准备各式各样的好茶，要让客人在这喝茶聊天"。

陈彤沉浸在消息的快速传播中。1997年6月，健力宝青年队赴日本比赛，球迷们很关注这场球，但当时资讯不发达，日本晚上9点多钟已经踢完，正常来说第二天上午或者下午才能知道，陈彤就登录雅虎，查出日本各大体育论坛网址，用英文在论坛上问比赛结果。"绝大多数人不理我，后来有一个人回答：U20青年队，日本2比0干掉中国青年队。我有点儿不信，感谢的同时心里说：你吹牛吧？"只有这么一个信息源，陈彤只好加上"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把赛果公布在论坛上。信息实时传递引来球迷的追捧，这让陈彤兴奋。

兼职版主陈彤和一伙球迷做的一系列赛事互联网直播，让体育沙龙火了起来。1997年9月13日，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中国队第一场的比赛在大连金州举行。5万球迷，万面国旗，李明打进漂亮的球，但中国队还是2比4败给伊朗队。之后，一篇由网友老榕写的《大连金州没有眼泪》在48小时之内被阅读了2万多次，让当时日浏览量只有1万的四通利方论坛一举成名。

"主要是喜爱，也有一点擅长，当时这并不是一个挣大钱的行当。"刚当版主时，陈彤跟当年所有的版主一样是义务劳动，后来做出成绩了，当时的领头人、后来成为新浪网首席执行官的汪延给陈彤开了每月100多元的补助。"我的兴趣就是新闻，我大学选理工科是因为

家里不了解情况。为了表明我的兴趣，我第二志愿报了广院的国际新闻，第三志愿报的是体育学院的，这两个专业招理工科。”

大学时代的陈彤不改“资讯狂”的习性，信号清晰的时候，能听一个下午的BBC广播。“大学图书馆能看到几天前的《时代》《新闻周刊》，还能读到半个月前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

“在1994年，《美国之音》节目最后开始出现‘.com’或者‘@’之类的提示。我一听特别有挫折感，我听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跟我差得太远，怎么这么先进的东西跟我无缘，再加上此时广播信号时断时续，我一气之下就不听了。”但很快，陈彤为了收看CNN电视，自己在家里架了一个1.8米的“锅”——卫星天线，“挺贵的，1万多一个，在1996年”。“CNN的每一个电视节目都会在片尾打一个cnn.com的标记，像我这样没上过网的人都觉得这高深莫测。”

后来，陈彤承认：“我从小对信息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极度的渴求，我一直认为新浪只是我的一个爱好，而不是工作，更不是为了赚大钱，从来没那么想过。”

1998年春节以后，陈彤面临毕业选择。当时他想找一个可以随时上网的工作：“不太忙的，不用整天在外头跑着，能随时上网的，我好继续做体育沙龙的版主。”当时性格腼腆的陈彤并没有好意思向汪延提出毕业后加盟四通利方。“万一人家觉得我不合适呢？”

2月的一个周末，四通利方论坛的版主碰头会在中关村南大街当代商场旁边的饺子馆里召开，汪延问坐在身旁的陈彤：“你研究生快毕业了，要工作了吧？干脆到四通利方来吧！”

“我一听，那当然好了，省得我整天纠结着曲线救国。”这一偶然的决定，使陈彤成为中国门户网站的第一个编辑，也最终成就了不久后互联网的标志——门户网站。

1996年春，北京中关村有一个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曾经策划“72小时网络生存实验”，但当年的互联网显然不能支持一个宅男三天不出门。九十年代，上网本身就是奢侈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为5500元。在研究生后期，陈彤下血本花1万多元买了一台电脑，但当时北京理工大学宿舍上网并不容易，“比碰上系花的难度只大不小，系花每个系都有。但电脑大多数不联互联网，上网还需要票”。陈彤只用电脑来写毕业设计，做些文字处理工作，但他很庆幸当年下决心买电脑上网，“如果当年没买，不能说落后好多年，落后两年，很多机会就可能没有了”。

当年的上网费非常昂贵，“电话线拨号上网，一个小时5块钱”。陈彤有一个网友在阿尔卡特从事电信运营，给陈彤出了“不用交上网费，只需交电话费”的主意，他要走了陈彤的电话号，又给了他一个号，说：你先拨这个号，这个号拨通了出来声音，再拨上网号。陈彤满心欢喜。一个月后，“我媳妇儿交电话费说，咱们家上个月话费1000多块钱……那会儿我研究生每个月补贴才300块钱，四通利方还不给我钱”。

九十年代上网的人多是IT人士、科研人员或者外国的留学生，“持续玩网是很奢侈的”。陈彤在做四通利方论坛时，“用户一半来自海外，那会儿用户的质量非常高，来自世界各地，绝对是互联网第一个黄金时代。现在互联网平民化了，商业上有好处，但是思想、言论的高度，一去永不回了”。

当时互联网的标杆是雅虎，“大家都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最牛逼的东西”。最早的互联网创业者，都以雅虎为榜样。陈彤最佩服雅虎的

是，“它已经聚集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内容，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实时更新的图书馆”。

当时，新闻从业者们已经看到了互联网新闻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高钢在1997年10月参加了“全国电子报刊经营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他说：“在那个会上，从纽约赶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网络版主任给我们这些中国新闻工作者讲什么是网络新闻传播，讲他们怎样操作新闻网站。”

“门户网站”的概念正是从雅虎而来，1998年下半年起，互联网初创公司开始以新闻为主打项目，逐渐形成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门户——新浪、网易和搜狐。

促成这一行业发展的，正是27岁的资讯狂人陈彤。那一年毕业，他跟汪延要了3000块钱的高薪，“这一辈子没跟人为待遇讨价还价过，那是唯一一次”。2月，还没有办利落毕业手续的陈彤就直接去四通利方网站上班了。

陈彤一去，就把体育频道做起来，头炮就是6月的法国世界杯报道。早在1997年陈彤还是实习生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做新闻的八字方针：快速、全面、准确、客观。为了得到更快的资讯，陈彤与汪延一起到位于王府井灯市西口的新华社北京分社花了近一万块钱买了半年的新闻。“收录新闻还需要点对点拨号才能连通，当时的新华社电讯都是很原始的文本格式。”

“陈彤更是拿出了玩命的劲头，采用了全新的工作流程——24小时滚动更新，所有编辑24小时不间断录入、上传、更新内容。那段时间，四通利方上的世界杯足球赛消息要比很多传统媒体的消息早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据陈彤所著的《新浪之道》，这次直播创造了中

文站点访问最高纪录，日点击310万次，网站的广告收入达到了18万元，是网络新闻挖到的第一桶金。

高强度的世界杯报道后，团队休息了一个多月。陈彤回忆起世界杯的兴奋，去翻阅新华社的新闻库，发现体育之外存在更多的时政新闻，“不用可惜了”。他对汪延说：“我们上次去国贸惠普大厦，在桌上看到一个打印出来的材料，上面说国外网站最受欢迎的内容是时政新闻，其次才是体育。我隆重建议做新闻频道。”

1998年10月，四通利方收购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生活资讯网。12月1日，“新浪网”面世。陈彤不仅要做新闻，而且要做CNN一样的新闻。

12月17日，美国以“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起对伊拉克的空袭行动。陈彤怎能错过这样的机会？“第一天大家都等着轰炸，凌晨终于轰炸了，我一大早就去单位更新。第二天凌晨又开始轰炸……”为了跟上战争的节奏，第二天上午陈彤建议24小时滚动更新内容，十个人的新闻团队全部举手赞成，立刻就定了：“你们哥几个回去睡觉，晚上6点钟过来。”就这样连续直播了四天战事。

“领导也很支持我们这么玩，我当时一去就跟汪延说，你必须给我架一个卫星‘锅’，咱们做新闻不能没有‘锅’。”一开始汪延希望用网络视频代替，但那时的网速根本没法跑视频。“这就跟现在一个创业公司一上来就要求投500万买一个顶级设备，肯定没人答应的，但当时说干就干了！”陈彤很佩服汪延当年的魄力。

此后，CNN新闻台便在新浪办公室24小时播放。“CNN的成功就是因为24小时滚动直播新闻事件，这是新闻的核心灵魂。”陈彤说，“那些对新闻有执着的孩子，冲着能看CNN也来办公室上班。”24小时值班成了门户网站的固定制度，新浪网的新闻编辑也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级战备状态，陈彤说，“很带劲”。

从体育频道到新闻频道，新浪网的门户战略快速推进。1999年春天，北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大陆四地新浪网负责人在北京郊区开会探讨方向。陈彤提出“要做最大的媒体”，还统计了包括雅虎在内的国际网站的栏目，“重叠的项目有时政新闻、体育、娱乐、财经、IT，基本就是我们要做的了”。

门户网站的架构自此成型，新浪从一个频道扩展到后来的十几个频道，网络新闻也成为获取信息最快的途径。

“互联网新闻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编辑干一个人的活，你给我一万个人我都能让每个人工作很饱满，还能干得很好。”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陈彤后来被称为“互联网新闻第一人”。多年后，他离开一手创办的新浪，却仍然保持着实时在微博上转发国际重大新闻的习惯。

2016年7月，北京暴雨，新浪员工被堵在后厂村路动弹不得，老（新）浪对刚入职的小浪说：“要是老沉（陈彤的别名）还在，我这会儿已经在车上写了三篇关于HPV疫苗的快讯，更新了两遍要闻区，还配上一张马东盯着柳岩胸部看的高清大图发微博了。”

企业家张宝全
海南地产泡沫亲历记

文 | **邝新华**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再拍”，没想到这一下海就是20多年。为了挣钱拍片，张宝全开始在北京倒卖钢材，“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跑”“跑静安庄，跑六里桥”。

1992年，国内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商业周刊》在1991年写道：“年轻繁荣的深圳几乎可以与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带着他们的移动电话和寻呼机来去匆匆。深圳的人口已经从1980年的5万发展到了今天的170万。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蜂拥而至。”

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张宝全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路上都是光脚的人，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

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三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如果这个老板当时给我一个月1000元，我就给他打工了。”可惜，老板并不想要他，“一碰就知道了”。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客人中有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一个非常漂亮的陪唱女孩就坐在夫妇中间。“唱着唱着，那个老头把手从女孩的衣服后面伸进去”，当时把张宝全“吓坏了”，“他老婆就坐在旁边呢”。客人唱得差不多了，老板说：“宝兄弟唱点什么？”然后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才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好像人家说你刚从窑子里出来一样。”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

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张宝全去海南首先认识了海南民源公司的马玉和。正在筹备上市的民源后来成为深圳股市的大黑马。小学毕业的马玉和“空手套白狼”的技法，让张宝全大为惊叹。马玉和给张宝全讲了他的故事：如何刚到海南就被人骗去仅有的50万资本中的40万，又如何拿着剩下的10万跟部队合作，找了施工队垫资盖房，最后还拿到了上市指标。虽然后来“黑马”民源于1997年被迫停牌，成为证券史上的著名大案，但这种资本运作的思维，给当时的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

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全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

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后来还听说被施了酷刑，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来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三块钱，但

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到海南时借了60万，花30万买了房子，买些办公设备，最后剩下20万。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

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艺术家跟商人，都要靠敏感，艺术家是对浪漫敏感，商人是对风险敏感。”张宝全总结海南的经验，“所谓风险意识就是在做事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件事所有坏的可能。我做什么事都比较谨慎，可能和之前倒卖钢材被人骗过有关。”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三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

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1991年，海南海口市区，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图/黄一鸣/FOTOE）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早些年经济过热，张宝全的船队到后来有三条两万多吨级的船，两年下来，晋身为海南纳税前十的海运公司。“一到过年，税务局来给我们发红包。干了两年把船一卖，赚了很多钱。”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

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民政部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那几千万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对这个项目的前后情况其实也心知肚明，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经历了生死，张宝全心想，“一定要成立自己的开发公司”。这才有了后来股权结构稳定的今典集团。

“市场就是风险。”张宝全说，“你今天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明天也有可能成为百万负翁，只要睡一觉或者政策一变。”“海南就是个大课堂，在很短的时间，像演戏一样，用事实告诉你什么是市场。1993

年海南的地产调控，让地价房价一个月掉了一半，让所有人一下子崩溃。九十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榜爷”胡润
发现中国大富豪

文 | **郑依妮**

1997年，胡润第二次到上海时，他感觉中国与七年前相比有明显变化。当看到许多盖起来的大楼时，他心里想的是：谁拥有这些大楼？谁在运作这些大楼？当看到人们的服饰变得更时尚时，他不禁想知道是谁在制造这些服饰。当时，有人告诉胡润，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只有富豪。在胡润心中，富豪和企业家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胡润说：“我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些年轻企业家在做事情，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企业家与富豪的区别是，一个企业家是在运营企业，而富豪的目的是挣钱。我想找到这些企业家，了解他们创造财富的故事。”

1999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胡润要做一个中国富豪榜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开始向身边朋友寻求帮助。当时，胡润跟孙中山的孙女说出他的想法时，对方的反应是：“那没什么好玩的。”尽管如此，胡润还是找了他的中文老师，再加上两三个大学生，一组人利用私人时间，在上海图书馆待了一个暑假。他们查阅了100多份报纸、杂志及上市公司的公告报表，最终排出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50个商人。胡润回到英国后，对报告进行了完善和润色，随后传真给英国的《经济学人》和《泰晤士报》，还找了美国的《福布斯》等媒体。

1999年11月，“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国际媒体反应强烈。“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如此形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发布的情

况，并评论说“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对胡润而言，让他激动的不是富豪榜本身，而是这些富豪背后的故事。胡润说：“我对他们的财富数字不感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中国企业家的故事，他们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是如何创造财富的。我做这份榜单，是为了说明这些企业家在中国是靠头脑、靠努力、靠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去赚钱的。”因此，胡润在发布第一份榜单时，在每个上榜企业家的后面都附上了很细腻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改变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企业家的看法。

比如企业家刘永好的创业故事，胡润至今还记在脑海中。胡润说：“我至今都十分崇拜刘永好，他是第一个敢跟我说他的创富故事的人。他跟我说他第一笔财富是怎么得来的，也认真核对我发给他的资料，然后说‘你这个数字没有错’。”在胡润看来，刘永好是第一代阳光化的中国企业家，也是在九十年代抓住机遇、借改革东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富豪的一个典型例子。

刘永好曾在四川德阳机器制造学校任教，在那个时候，这个职位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然而，八十年代初，刘永好毅然丢掉“铁饭碗”，辞职下海创业。刘家开始在四川饲养鹌鹑和鸡，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者。1996年，刘永好发起成立民生银行，并任副董事长。1998年，刘永好组建的新希望集团在深交所上市A股。次年，他们就登上了胡润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榜单。2002年，刘氏家族已是中国少数财富超过80亿的家族之一。直到现在，刘永好家族仍是中外各大财富榜的常客。

相较于西方的热烈反应，胡润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原因很简单，一来是因为并未在中国内地公布，二来是当时人们尚未理解这个榜单的含义。胡润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的榜单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我对中国的媒体一点也不了解，不知道在

国内的媒体上发布榜单，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当时给我发布榜单的记者也不确定我的榜单是否靠谱，而我也很紧张。”但最终，他在2000年把自己制作的榜单交给了《南方周末》发布。

“诚信”是胡润眼中九十年代中国企业家最为突出的品质。胡润说：“现在是2016年，诚信虽然也重要，但远不如‘创新’‘速度’‘资源整合’这些来得重要。然而，在九十年代，随便去请教一个企业家，他都会告诉你，如果企业要做大，必须有诚信。那个时代，诚信是排第一的。”

胡润每做出一份榜单，都会通知上榜的人核对和确认榜单的信息。第一次上榜的人都有一点诧异和紧张，他们也弄不明白胡润究竟是干什么的。胡润说：“我记得我第二年做的榜单，任正非上榜了，排名第三。于是我们联系了华为。华为坚决反对我把任正非列入榜单。我当时不了解华为的背景，心中还是有点怕，但是我必须尊重自己的调查结果，因此尽管华为反对，我还是公布了榜单。”

不仅中国在改变，胡润自己也在改变。如今，胡润的中国富豪榜已经延伸到“胡润富豪花钱指数”“胡润留学生报告”“胡润全球华人慈善报告”“中国奢华旅游白皮书”……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发榜近20年，有人曾评价这是一份“杀猪榜”，与以前不同的是，如今许多企业家对上榜不再敏感，有些人认为上榜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甚至会主动联系胡润。

百万股民“炒”深圳

文｜**苏静**

“九十年代股市刚兴起时，那些股民才是真正的‘敢死队’，连股票是什么都搞不懂，就拼尽一切往里扎。不过，他们有些真的发大财了。”13岁时就跟着父母买股票的70后易骏鹏说。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1992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母亲也在旁边催：“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十多张身份证。

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打新”。一天，易骏鹏问什么是“打新”，父亲盯着报纸上的股市新闻，用笔圈圈画画，答：“就是排队抢抽签表，中了签就能买新股赚大钱。”这个解释大体靠谱，九十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

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

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翻了近两番；同时期的深中华、深华发也由每股3.75元、1.9元的发行价，涨到十二三元。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即沪市综合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块。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

加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鼓励股市试验，几年前无人问津以至于要去各政府单位和街头兜售的股票，一时成了抢手货。正规渠道买不到，求股心切的人还会去“黄牛市场”碰运气。那时，深圳荔枝公园北面，经常有人在月光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8月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

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块，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报纸当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加上电台广播、座机、寻呼机的畅通，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很快确定了消息。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

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深圳晚报》编委、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赵青那时二十多岁，刚到深圳几个月，在《深圳商报》任摄影记者。“8·10”事件前后，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

回忆那画面，赵青欲言又止：“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营业窗口9日上午才正式放票，大家来得早没事做，一开始还比较优哉游哉，有老人带了凳子和收音机坐着听戏，也有三四岁的孩子和十几

岁的小姑娘在那玩，边上还有叫卖饮料的小贩，各个地方来的人成群结队操着家乡方言相互寒暄。

人多起来了，氛围就变了。到8日稍晚些，营业点前面的平台已经全是人，加上天气太热，还有人插队，人群开始躁动。易骏鹏一家也在罗湖排队，他记得，越靠近8月9日，等待买认购抽签表的人群就越躁，争吵、扯皮、推搡的不在少数。好在人们都想发财，为了买新股，排上队的人忍耐着。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易骏鹏感慨。

但当时，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脑子都是懵的，浑身难受没法思考。“怎么能不难受呢？排了几天几夜，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不敢彻底睡死了，怕被别人挤出来，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块钱的报酬通宵排队。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

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有个场景，易骏鹏曾当笑话讲给现在的同事听。他说，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有消防车经过，灭火的龙头往队伍里面冲水。同事们认为

他吹牛，反问怎么可能："岂不是像养殖场里面给猪冲凉一样？"他被逗乐了，但又十分肯定："对，就这样冲，要不然太臭了，也是降温嘛。"

由于几乎没有资料提及类似场景，易骏鹏的年轻同事们更愿意相信，他13岁记忆中的画面应该是"8·10"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不得已采取的维稳措施——深圳市委原书记、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李灏曾通过媒体披露：1992年8月10日晚上9时，为了控制局面，公安防暴队曾动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来驱散失控队伍。

第一波混乱出现在9日开售之前。

几天内涌入如此多的人，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边防战士。"赵青说。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一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三十几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

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报》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导语强调："至昨晚9时许，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

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没有了，没有了。"人们不肯离开，继续围着，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人的表情很绝望，吵吵嚷嚷，但能吵些什么呢？都是骂人的话。"折腾了几天几夜却一无所获的股民们愈加愤怒，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深南中路，引发暴力事件。催泪弹和水炮便是在此时被动用。

为稳定局面，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李灏提议寅吃卯粮，把次年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事件才就此稳住。11日下午，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不眠不休。

跟着爸妈排队"打新"的易骏鹏记得，后来自己买到了抽签表也中了签，"当时只要排队能买到，都是赚了，但我排队买到的那只股票最初亏了点"。深圳股市"8·10"狂热后，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证监会因此成立，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经历了1997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又见证了2015年股市的大起大落，业余做些小投资的易骏鹏把炒股看得挺淡：可能有些人就是有发财运，比如深圳有名的"好人陈观玉"。最初"深发展"卖股票，去街上推销都没人要，"没人相信这个东西，而陈观玉呢，就因为她是好人，感恩部队和政府，单位让她去买，她就买了，然后放在那没动，一下赚了四五十万"，一如电影《华尔街》里的台词：让谁富有，那不过是一个随机的选择。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调查结果：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180人。很多亲历者相信，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易骏鹏开玩笑，他说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得手了就去享受。

“刁民”王海
那个揭市场伤疤的人

文丨**张露萌**

1995年11月24日，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的赛特俱乐部。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座谈会，名字在当时闻所未闻——“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座谈会实际上是围绕一个人展开的，他在这一年中“知假买假”，轰动了北京乃至全国，其依法购假索赔的行为被命名为“王海现象”。九十年代后期，王海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仿佛哪里有王海出现，哪里就有假货被曝光。在此之前，王海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而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使他成了“中国打假第一人”。

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王海认识了何山——他当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如今任全国人大副研究员、中国消法研究会会长。何山就是把惩罚性赔偿悄然写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人。恰恰是这条措施，改变了王海的人生轨迹。

1995年，王海读到了才颁布一年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的第49条引起了他的兴趣：“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民间所说的“退一赔一”。据王海了解到的法律知识，这一条法例在中国没有法理基础。“中国的民法赔偿原则是‘填平原则’，哪里挖了坑，填满就可以，并没有额外的赔偿，而现在是惩罚性的。这等于放权于民，所以

对于这一条例的出现我很惊讶。事情是不错，但我持怀疑态度，我想试试条例能不能兑现，是不是真的。”一试验才发现，果然不是真的。

同年4月，王海陪表弟到北京考试，住在交道口的一家旅馆。他在东四的隆福大厦（现已倒闭）以85元一副的价格买了两副索尼耳机。王海凭直觉判断自己买到了假货。于是王海开始了漫长的奔走。他先去找消协，没有找到人，又去找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给的答复是：“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得去找质监啊！”“我怀疑是假的。”“怀疑不行，你得有证据。”王海心中有数，这两副耳机的外观跟他过去买的正版索尼耳机明显不同，一定是假的。于是隔天，他又找到了质监局。王海回忆道：“他们说：我们也觉得像假的，但是厂家才能鉴定这东西是不是他们生产的，我们质监局下面的检测中心只能检测出质量是否合格。”又一天过去了。王海不死心，他找到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一番等待之后他见到了相关负责人，终于确定那两副耳机并非索尼的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王海的索赔就有了依据。“我们只对公检法，不能给个人出证明。”

转了一圈，事情好像又回到了原点。更糟的是，王海一算账，发现即便是“退一赔一”，他也收不回这些天吃住行的成本。于是他回到那家商场，把能找到的同款耳机都买了回来，总共十副，加上之前买的两副，一共花费1020元。当时北京的社会平均月薪是678.67元。

王海最初的计划，是打算跟表弟分别投诉，他考虑到了被质疑“知假买假”的可能。但是表弟不好意思去，即使王海答应索赔成功后分他一半钱。于是王海只好自己找商场索赔，一遍遍地打电话催。商场把皮球踢给了工商局，说工商局并没有批复，而工商局的说法是商场只答应赔付两副耳机的金额，剩余的十副属于“知假买假”，不算商家欺诈。为了及时止损，王海把耳机上缴到工商局之后，去商场退回了十二副耳机的货款，接着就只有回青岛老家等消息了。

那段时间王海也没闲着，他反复研究《消法》，找人讨论第49条的内容，嗅到了“商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假冒伪劣产品会泛滥，打假还真可以当一个事干。”不出半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出台。这给了欺诈行为一个客观认定的办法，法律的进步也给了王海打假的信心，他决心再试一次。

王海背着军用书包，装着5000块钱，从青岛再赴北京。他在北京的商场里逛，发现到处都是假货，服装、配饰、小电器等各种门类，多到王海随意挑挑就能发现异样。他见到假货就买，全凭直觉，有时靠闻味道——假货的材料多少会有些异味。在一家商场买完假货，就去正品的店里做鉴定，比如宾奴、皮尔·卡丹等品牌，不必开官方证明，哪怕是口头鉴定都是王海找商场谈判的筹码。赔偿并不都是“退一赔一”，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会以各自都觉得“划算”的金额成交。就这样花光了5000元，跑了几家商场，王海一周之内赚了差不多8000块。

1995年11月10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王海的一整版专访，他对记者张倩说，他计划搞一个事务所，去帮消费者打假，帮商家防假，帮厂家查假。“买假索赔是我做反欺诈工作的一个切入点。反欺诈也好，打假也好，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是个体，对方是组织，他们的资源比你多很多，你不可能总占便宜。所以搞事务所，组织对组织的博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20年后的今天再回望，王海依然走在当初的路线上。

虽然媒体上一片赞扬之声，民间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商家打出“防火防盗防王海”的标语，有的人称他为“刁民”。王海是在血泪中得到教训的。在买假索赔的一年中，他本可以有十几万元的收入，却有一半迟迟没有到账，还有8宗官司缠身。王海说，吃亏就吃亏在“地

方保护”上，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企业，甚至企业背后支持它的政府部门，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当王海犹豫是否继续在购假索赔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时候，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何山站了出来，用行动声援王海。1996年4月，何山在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徐悲鸿的画。一个月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8月，法院判决，认定两幅画为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责令被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这是中国首个依法购假索赔胜诉的案例。

在何山的鼓舞下，王海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终于在1996年12月6日成立。成立之初，公司里只有五六个人，接受客户委托及群众举报，调查造假窝点。公司成立之后，个人的购假索赔案子就做得比较少了，毕竟这是件争议比较大的事，王海只挑有价值的案子做。大部分业务是由厂家或者经销商提供资料，公司派人去调查造假情况，必要时还会卧底，相当于侦探所、顾问所、律师所三所合一。

公司挂靠在中国青年报社之下，在报社里办公，为了节省资金，公司的热线电话是报社的分机。“王海热线”最火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的总机因此而瘫痪，第二年年底公司才安装了自己的电话。

打假的方式有许多种，王海选择的“知假买假”方式，无疑是冒险而充满争议的。一路以来毁誉参半的王海，在1997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正了名，晚会从法律角度对王海“知假买假”的行为作出了肯定。那一年的“3·15”晚会现场，10部热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很多打不进电话的人，甚至把那些有质量问题的商品带到直播现场请求曝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被唤醒。正是从这届开始，“3·15”晚会有了主题，影响力遍及全国。

王海开始利用媒体，为自己的打假开辟战场。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九十年代末，王海为全国十几份地方媒体开专栏，每周一篇，一稿多投。“王海忠告”揭示造假行为，“王海观点”提供反欺诈建议。一篇稿50—100元，王海在1997年每周可以拿到1000多元稿酬。

“王海现象”传到了国外。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通过驻华大使馆联系到王海，邀请他参加上海的“构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座谈会。王海记得他在会上介绍了中国这几年在推动《消法》执行上的进步，也向克林顿夫妇请教了“吹哨人”制度和惩罚性赔偿执行难的问题。克林顿评价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从2003年开始，王海提出“退一赔十”和“500元起步价”的赔偿措施，直至2014年，新《消法》才将“退一赔三”和“500元起步价”写进条例。作为幕后推手，王海等人努力了十年，成功游说决策层开了官智，下一步更难的工作，是开启民智。

“我们从来没有把鉴别假货和寻找造假窝点当作一个事儿，这很容易识别。人们常识的匮乏和心智的蒙昧才是我们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20年来，造假的技术翻新，但本质上还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原来是卖给人假冒的索尼耳机，现在是用真的索8耳机，骗人说比索尼的还好。

1999年3月，王海状告天津伊势丹厕所乱收费的官司胜诉。他想用个案推动公益诉讼，“公益诉讼应该成为一种营利工具，这样才能鼓励更多人参与”。他始终认为对消费者来说，原有的惩罚性措施“不划算”。当初也是因为买两副耳机获得的赔偿不划算，他才又去买了十副。

“阴谋论”“动机论”患者大有人在，尤其在职业打假人如雨后春笋的今天，人们认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假就是可恶的、可耻的、错误的。“动机无须考察，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利己的，只不过有些是利己

损人，有些是利己不利人，有些是利己利人。知假买假是利己利人的事，职业打假人应该被定义成‘公民检察官’。”

如今活跃的职业打假人估计有两三千人，王海从“唯一”变成了“第一”。他说，职业打假人队伍的扩大是一件好事，越多的人监督商家，就越具备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就好比摄像头多了，交通就会变好。

王海说，他的挑战一直是人们的蒙昧。“造假和欺诈行为是很正常的，我要做的是帮助人们减少愚昧，避免被骗。”王海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乱象中一个揭伤疤的人，也是打补丁的人。

小霸王学习机
山寨中国的生意经

文 | **苏静**



提到九十年代的电视机，我们怎能忘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红白机，以及小时候天天叫嚷妈妈慷慨解囊购买的那台“学习”神器“小霸王”？

在家庭电脑不普及，PSP、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尚未发明的年代，中国市场流行起一种叫“学习机”的电子产品。1991年，广东中山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生产的“小霸王学习机”风靡全国，1994年公司产值即高达10亿元，极盛之后转衰。广告语“小霸王其乐无穷”成为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记忆。

但凡有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的人在场，谁要是提到小霸王，一定能马上听到《魂斗罗》《超级玛丽》《坦克大战》等游戏名，还有人会忍不住给你讲小时候如何和同学“决一死战”的光荣往事。

不过，当年的中国家长掏钱买学习机的目的并不是让孩子玩游戏。九十年代最新鲜的是电脑，可售价不菲，一台上万块，一个双职工家庭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便宜又万能的“小霸王学习机”因此进入他们的视野。

1993年5月，第一代小霸王电脑学习机横空出世，售价两三百块，亮点是可以“模拟”电脑体验。同时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打出的《小霸王拍手歌》新广告，强调学习电脑的功能，歌词勾起家长们的购买需求——“你拍一，我拍一，小霸王出了学习机。你拍二，我拍二，学习游戏在一块儿……你拍四，我拍四，包你三天会打字……你拍八，我拍八，电脑入门顶呱呱。你拍九，我拍九，二十一世纪在招手。”

实际上，小霸王学习机只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山寨品。两年前，有人在知乎上问“为什么没有把小霸王上的经典游戏，比如《超级玛丽》《冒险岛》等做成手游”，被网友调侃：“题主可能不知道，在遥远的东海之巅，有一个神奇的国度，那个国度有一个伟大的游戏公司，名叫任天堂。”意思是，大家在小霸王上玩得不亦乐乎的游戏，其实是盗版而来的舶来品。

在中山长大的90后金融从业者Tony（托尼）也认为，小霸王产品本身并没什么厉害之处，厉害的是它懂市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痛点营销”。Tony介绍，小霸王最初是模仿日本任天堂出的红白机，同期仿制红白机的不少，但是小霸王很聪明，在红白机的基础上一点点加了键盘、鼠标和英语词霸学习卡。这样一来，家长会想买，觉得几百块就能给小孩学电脑、学英语；小孩子也很喜欢，吵着要，因为他们可以用来玩最流行的游戏。

整个童年，Tony都被一栋大楼吸引，大楼不高，十多层，外形也很常规，一个标准的白色长方体，但九十年代只要在中山市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它顶端高高竖起的两个红色拳头，那是小霸王学习机开机时的经典画面——伴着唐老鸭配音员李扬的一声“小霸王其乐无穷”，这双红色拳头在屏幕中央碰撞到一起。

位于中山市岐关西路的小霸王大楼在1994年完工。当年小霸王产值为4亿元，比1993年翻了一番；1995年，小霸王的产值再翻一番多，高达10亿元，成为业内绝对的霸主。而小霸王创始人段永平1989年被聘任到中山市怡华集团下属的日华电子厂（小霸王前身）任厂长时，工厂账面上只有3000多元，负债200多万，连工人在内仅十来人。

Tony说，在中山商界如今很少有人提小霸王，但说起段永平，人人都想加入话题。“他是一个传奇。”Tony常听从商的长辈们对其肃然起敬，“他应该算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小霸王。”

粤商自古有名，出生在南昌的段永平凭着专业背景更胜一筹：他受邀空降中山“救火”时，时年28岁，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去人大读研之前，他是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科班出身，毕业后曾在北京电子管厂工作4年。

年轻、懂现代经济的段永平把转型的方向押在电子游戏机上，他事后并不觉得几年扭亏为盈、产值过亿有多快速，主要是刚好在游戏机风口上。八十年代末，段永平到中山时，日本任天堂的红白机（FC）正以水货形式进入中国，大量游戏爱好者迷上了这种卡带式电视游戏平台。但正品红白机价格高且货源紧（任天堂自1983年开始发售FC，到2003年9月末完全停产，仅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发行过正规行货，从未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一大批仿制品由此而生，最初的小霸王也是其中一家。

凭借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和强大的宣传策略——1994年，小霸王推出第二代电脑学习机，重金聘请成龙拍广告，广告更戳人，“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打着学习名号的小霸王很快反客为主。据统计，1991年至1999年，小霸王一直保持着学习机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的位置，累计销量高于2000万台，甚至超过任天堂红白机在日本的总销量。

段永平一直被看作小霸王的灵魂，而他在1995年的出走则被视作小霸王神话下行的转折。外界流传的说法是：1995年，在小霸王最巅峰的时刻，段永平几次向小霸王所属的怡华集团高层递交股份制改革方案却被拒，“改制”意见不合后，段永平带着6个核心员工辞职出走。

“这也是中国早期职业经理人的悲哀。”Tony分析，从段永平后来的商业路径与行事风格来看，他给小霸王设计的“改制”应该真的是从发展角度推动企业保持动力的，因为他本人一手带领企业发展，仍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跟在下面的其他高管和员工更加如此。

“怡华集团高管和其他与小霸王同级的子公司可能不这么想，他们或许认为‘空降兵’段永平若掌握股份，威胁会更大。”Tony听父辈这样推测过。1994年，段永平带领的小霸王年营收超4亿元，比怡华集团其他十几个子公司总营收还多一倍。2006年，段永平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谈及与小霸王分手的原因，他委婉地说，大老板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些不同的看法；觉得做下去自己的乐趣很小了，所以就离开了。从小霸王离开的当年9月，段永平带着原来团队的6名成员在东莞创立步步高，改做学生电脑和电话机，再次快速引领行业。

而中山这边，小霸王经历高层动荡，游戏机业务受到极大打击。九十年代末，电脑的普及让“计算机过渡替代品”小霸王学习机盛极而衰。

财经辞典

辑｜**吴玉燕**

/ B /

保八 1997年，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GDP增长率维持在8%以上。1998年，朱镕基提出中国GDP增长率要“保八”。“保八”不仅意味着保经济增长，而且意味着保障就业与稳定人心。

/ C /

彩电降价大战 中国彩电市场继1989年、1996年两次降价大战后，1999年再次由长虹带头掀起降价战。长虹的三次降价战略也成了大学教学案例。新中国经济史上，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神奇力量。

褚时健 1999年1月9日，“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引发社会对“59岁现象”的思考。褚时健案反映了普遍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

/ D /

达成入世协议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北京达成双边协议，加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

戴尔电脑 1998年，戴尔带来的“直销策略”刷新了中国人对购买途径的新认识，中国人第一次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电脑私人定制。

第五套人民币 1999年10月1日起发行，相比第四套人民币，面额取消了2角及2元的票面，增加了20元票面。199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因为“背部缺少YUAN”很快在流通市场上停用，却受到收藏市场的热捧。

点子大王 1992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何阳卖点子”，轰动全国，掀起了咨询热；何阳也被誉为“点子大王”，后因诈骗罪被判入狱。有评论认为何阳“对中国咨询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也有评论认为他“是传媒制造的一个泡沫”。

读MBA热 1990年，《关于设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通过；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9所高校开始试办MBA教育；1997年，MBA实行全国联考，报考人数从1990年的不足百人增长到上万人，全国掀起读MBA的浪潮。

/ F /

分期贷款 指先付部分款项就能取得房屋使用权，迁入居住，而其余款项在规定年限内付清的购房方式。按揭的好处是：“中国老太太”临死前才全款购得房子，而“美国老太太”临死前已还清贷款，还在大房子住了小半辈子。

分税制 1994年1月1日，《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施行，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中央与地方财政确立新的分配关系，中央财政重获活力，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

风险投资 即Venture Capital，简称VC，兴于美国，早期以投资高新科技企业为主，投十家可能只有一家存活，一旦上市就可能赚几十倍。1999年，第一届高交会上，腾讯拿到了第一笔来自IDG的风险投资，自此一路高歌猛进。风险投资成为未来十多年中国科技创业的主要推动力。

福利彩票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同意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1995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正式与国际接轨；1998年4月，“上海风采”福利彩票套票首次发行，开创地方风采系列套票之先河。“彩民”也逐渐被社会认可。

/ G /

股份制 1980年，厉以宁教授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概念；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对于股份制，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说：“股份制概念的引入，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向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管金生 1988年出任万国证券总经理，有“中国证券教父”之称；1995年因“327国债事件”从万国辞职；1997年被判入狱。在筹建万国过程中，他的两个坚持——“坚持公司实行股份制”“坚持与银行脱离”，均领当时中国风气之先。

/ H /

海南地产泡沫 1992年，全国资金疯狂涌入海南，岛上一时间出现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1993年上半年，海南的房产价格达到峰值。1993年6月，我国针对投资膨胀采取紧缩银根的金融政策，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急转直下，海南地产泡沫开始破裂。

/ J /

假日经济 1994年以前，我国法定劳动者只有一天休息；1994年3月1日，“1+2”休假制度实行；1995年3月25日，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即星期六和星期日为休息日。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新工时制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催生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假日经济。

92派企业家 指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影响，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的知识分子“辞官下海”创业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其代表有冯仑、陈东升、王功权等。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是最早具有明确股东意识的企业家。

/ M /

民工潮 农民纷纷外出打工形成的潮流，最初被媒体称为“盲流”。九十年代，沿海地区经济成长，劳动密集型工厂产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内地省份劳动力纷纷涌向珠三角、长三角，形成“民工潮”。

牟其中 1999年1月7日，最富争议的民营企业家牟其中被逮捕入狱。牟其中曾经以罐头换飞机赚取上亿元，是九十年代显赫一时的企业家。有评论认为他是最早进入私营经济的切身实践者。

/ P /

拍卖 199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拍卖业进入市场化。“拍卖是一种市场状态，此市场状态在市场参入者标价基础上具有决定资源配置和资源价格的明确规则。”

/ Q /

72小时网络生存实验 1999年9月3日至6日，台湾“梦想家中文网”联合大陆十家新闻媒体举办的一场网络实验，12名参与者封闭在独立的房间内，通过网络来满足生存需求。这是中国电子商务的第一次测试，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网络界第一闹剧”。四年后，“梦想家”网站不复存在。

/ R /

软着陆 1993年，中国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过热，以朱镕基为主导的决策层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双紧缩”策略，到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平稳地回到适度成长区间，顺利“软着陆”，创造了高速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行的增长奇迹。

/ S /

三角债 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企业互相拖欠债务，引起债权债务关系混乱，影响企业发展的现象。1990年3月26日，国务院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1992年，清理“三角债”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经济重新启动。





1993年，上海。（图/Marc Riboud/Magnum)

商品房 1998年，福利性分房停止，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1999年，作为过渡，“双轨制”实行，但一年后居民购房只有“一个轨”，即到市场购买。商品房成为居民购买住宅的主要途径，也成为中国人的最大消费。

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11月2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同年12月19日正式营业。证券交易大厅则由上海浦江饭店的远东最大玻璃天棚舞厅改建而来，开业当日只有八只股票上市交易，“杨百万”杨怀定是其第一批股民。

/ T /

停薪留职 1983年，《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出台；九十年代初，在“政策兜底”下，近乎全民下海；1999年开始，该政策被越来越多省份取消。它曾是“下海发财”的代名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产物。

通货膨胀 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历史最高”。这次通货膨胀的起因有人形象地总结为“四热”“四高”“四紧”“一乱”。

/ W /

外来妹 指从异地到城镇务工的年轻女子。1991年，央视和广州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外来妹》，形象地浓缩了外来妹背后数千万年轻男女外出打工的命运，轰动全国。“外来妹”成为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语。

王海 1995年，王海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国内开始购假索赔，成为“打假第一人”，同时引发“王海现象”。这一年被媒体评为“消费者维权元年”。但“王海现象”带着鲜明的牟利动机，被质疑“是不是一种不道德行为”。

维纳斯计划 把Windows CE操作系统（即所谓“维纳斯”）置入机顶盒，连上电视就变成电脑，售价只需电脑的五分之一，拥有3.2亿台电视机的中国也能迅速进入互联网时代。该计划微软耗资数十亿美元，却以失败告终。

物价闯关 1988年8月，“物价闯关”失败后，领导者吸取教训，在价格双轨制的机制下缓步调整物价。到1992年年底，中央放开了一直未敢动作的粮食价格，至此，“物价闯关”正式成功，价格双轨制也走向了尾声，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初步建立。

/ Y /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局势，导致亚洲各国纷纷进入大萧条时期，并造成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定。这场危机持续到1999年才结束。

瀛海威 1995年5月，“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商业项目”瀛海威成立。它建立网络系统“瀛海威时空”，开了第一家民营科教馆，是第一个形成公众品牌效应的网络公司。后逐渐衰落。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它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和领跑者的角色。

禹作敏 曾将大邱庄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1993年，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等被判入狱。禹作敏案“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

/ Z /

砸三铁 1992年，举国砸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试图用皮鞭加饥饿的办法搞活国营企业。几个月后，这种简单粗暴的改革措施戛然而止，代之以“三项制度改革”。工人老大哥也有了新称谓：下岗职工。

知识经济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并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知识经济”概念被广泛使用并流行起来。



滑旱冰的广州市民。这项运动在九十年代的许多南方城市非常盛行。（图/叶健强/FOTOE）

九十年代
生活

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

宁愿让乐极忘形的我

离时代远远

没人间烟火

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

——歌曲《我的快乐时代》

潇洒走一回

文｜**邓娟**

二三十年前，就像被画上一个生硬的句号，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结束了。还没有回过神的人们，被抛到生活观念急剧变化的九十年代。

这是最直白的年代，也是最模糊的年代。情感和物欲撕扯，迷惘与狂热交织。

关锦鹏监制的《纽约纽约》讲了一个典型的九十年代故事：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年轻领班将担任纽约新酒店的负责人，当时恰逢移民潮，各色人等纷纷与他搭关系，包括他喜欢的高冷女郎。“你和我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美国？”“是。”

电影2016年4月上映后不温不火，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本来也不指望有太多观众。影片本身，甚至不如它翻唱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来得有话题性。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1991年，叶倩文发行这首金曲，铿锵的旋律与意气风发的歌词，透露着那个年代的色彩；尤其一个“赌”字，形象地传达出一代人的姿态。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极大繁荣了物质生活，人们甩脱了必需品，享受着消费品。货架上琳琅满目，舞厅里光影迷离。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也解放了个体意识，钱包鼓起来了，休闲时间也多起来。日常生活一点点地从体制中分离，回到个人手中。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欲望苏醒的年代，九十年代就是欲望释放的年代。从计划经济时代挺过来的人们，已经饥饿了太久，压抑了太久。

欲望泄闸，如猛虎下山。学者王一川谈到九十年代曾说，没想到八十年代的诗意性诉求，在九十年代完全转换成了“感官愉悦”。

价值观碰撞之下，九十年代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都洋溢着一种奉行享乐主义、追逐感官刺激的“何不潇洒走一回”的气质。

“服装很像九十年代。”2016年，歌手邓紫棋登台献唱，紫色胸衣加白色热裤、外罩一件渔网装的装扮被网友群嘲，其中一条评价说道。

在2016年尚且显得出格的叛逆小天后，被形容穿得像九十年代——这当然有对那个年代的调侃，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是肯定。

我们可以嘲讽那个年代的审美，却必须承认它的勇敢——至少在时尚这件事情上。

1991年，麦当娜使内衣外穿成为时髦，这一次，中国很快与世界接轨，曲线毕露成为整个九十年代最吸引眼球的衣品。

1994年夏天，露肩、露背的连衣裙或短上衣搭配短裙，成为上海街头的摩登时尚。1998年流行的吊带衫、吊带裙，是内衣外穿的典型。而露得更彻底的“三点式”，最早在1986年由女健美运动员陈静在深圳一穿成名，虽然是应国际协会的要求，于当时的中国仍惊世骇

俗；而在九十年代，比基尼全面进入，像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游泳池里也可以瞥见清凉美女。

敢穿、敢露，九十年代的女人铆足了劲儿跟随时尚的脉搏律动，一往无前地表达着挣脱传统束缚的决心。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北京宣言”为平权运动注入了活力。

追赶时髦的道路上当然也有过误区。

1992年1月23日的《文汇报》报道：让冬季也能展示时装的魅力，一种内裤外穿的踏脚裤（健美裤）开始流行于今冬街市，街道上男男女女大都穿着这种款式别致，无论站立走动都显得十分挺拔的踏脚裤。

原本对身材要求极高的裤型成为全民爆款，全盘接受并迅速普及是那个时代对所谓时尚的本能反应。一篇毒舌的文章写道：“这是多么惨痛的记忆，好多大娘大妈大婶子都来穿健美裤，一眼看去就是一个个倒三角，从腰到脚脖子都是被健美裤束缚成锥形支撑。”

品位有待提高，但勇气毕竟可嘉，一个男女老少都追求美的年代总是进步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

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乐此不疲地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美学实验，偶有触动传统神经之时，也温柔地推动了社会接受度。

“古今胸罩，一戴添娇。”1996年，古今内衣公司的广告词传遍大江南北，次年出现在高架桥上的广告牌，还引发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论战。

在《解放日报》上，署名方良的文章写道：“环高架立交桥上，不是一般的食品、家电、机械产品广告，而是妇女用品——胸罩广告，

总觉得过于形象而直露……如果胸罩广告可上高架环线，那么其他妇女卫生用品也可占领高架立交的广告阵地了，岂不是更贻笑大方？”

另一篇署名司马心的文章回应：“若是为了扑灭该一类的联想与想象，于是草木皆兵的话，那么岂但一个胸罩，便是短衫、裙子等，但凡妇女用品，因为均有引发想象之嫌，不是一概不能广而告之了么？而淮海路上那偌大一家古今胸罩商店，不是也应当封门打烊了吗？”

到了1998年，古今大张旗鼓以16万年薪在全国招聘形象代言人，已经没有人再纠结“露不露”的问题了——比起胸脯，更让人们感到刺激的是金钱。

仿佛一个巨大的展销会，上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社会，无数新兴事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意从海外舶来，各种前卫角色粉墨登场。

最让人目眩神迷的当数性用品。

安全套、壮阳药、仿真器械……1993年3月23日，北京赵登禹路143号，30平方米的店堂内，“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开业了。35岁的店主文经风，江湖人称“套爷”。

这一年离他从国家机关“下海”已经7年。他开过减肥用品专卖店，鼓捣过婚庆公司和跳蚤市场，屡屡挫败，最后在一部法国电影中看到女主角身后的“sex shop”招牌，他决定再赌一把运气。

找店面时，房东一问用途，张口就骂“流氓”。好在计生委的领导说：“和谐性生活是优生优育的基础，我们将全力支持你们闯这个禁区。”

开张大吉，门可罗雀。过了16天才等来第一笔9.6元的生意。文经风到处拨打媒体热线，终于有家报纸派来一个女实习生，采访过程中小姑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那条新闻稿短短二十几个字，“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开业”的标题却像扔出去的石头，激起无数水花。央视、CNN、《纽约时报》、法新社接踵而至。

传播效应带来了人潮。每天店铺开门前就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像“看怪物一样”指指点点，把玻璃都挤破了好几次。有人半夜里过来贴上“淫店”的大字报，也有人留言支持“你们的勇敢将被写入史册”。

顾客有的黑超遮面进店，还有的并不亲自登门，而是电话通知店员送到马路边上，匆匆摇下私家车窗口，甩出钞票，不等找零就绝尘而去。

还有一类特殊的访客，从全国各地来讨“生意经”。在“亚当夏娃”顶着压力首尝禁果后，两年后的北京有了上百家性用品商店，市民早已见怪不怪。

社会不再谈性色变，管理者也开始有意疏导。美国人理查德·伯格曾经观察中国人的生活，在一本英文书中他提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提供性问题咨询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兴起。“你的反应可能是‘哦，有人打进这些热线电话来聊自己的性和感情生活’。据此，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电话那头的顾问都是正规单位工作人员，节目也是由政府发起，其目的只是为了强化家庭观念。”

1998年3月，一种叫Viagra的药物搅动了全世界的春心，中国人既暧昧又直白地叫它“伟哥”。那年夏天，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李宗盛、周华健、品冠合唱的《最近比较烦》：“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这颗小药丸在世界各地引发的风波都有些喜感：一名77岁的美国老翁要求卖给他1000粒，以补回他多年的性福；一群台湾老太太在其上市后投诉说，她们清晨在公园里锻炼时，有老先生对她们毛手毛脚。

而在大陆，有关“伟哥”的焦点是商标之争，沈阳飞龙集团因鱼目混珠地销售“伟哥开泰胶囊”而被查处。

精明的中国人首先嗅到的不是春情而是钞票的气息——套一句今天的句式：可以，这很九十年代。

前所未有地，中国人普遍拥有了更多的钱，以及更多的时间。

1994年之前，法定劳动者每周工作六天，上班族好不容易盼来周日，还要解决堆积下来的家务。冯巩的相声调侃，谁星期天不去帮丈母娘扛煤气瓶、当义务勤杂工？当时一种说法叫“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1994年3月，休息制改为大小周，即逢大礼拜休息两天，逢小礼拜休息一天。但人们对此并不适应。新规定实行的第一个大礼拜，某城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记休息，如常赶去上班。

一年后，姗姗来迟的双休日总算正式进入人们的日程表，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的一则文章记载：双休日一到，北京的商场人山人海，商家紧急制定“双休日计划”以应对“星期六客流”；有人开始盘算利用两天时间干一点“工作之余的工作”，于是有了“第二职业”的新说法；电视台也调整安排，新增周末的综艺节目；社会上的双休日娱乐以及业务学习花样繁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从中得到了改善。

生活从未如此有滋有味。越来越多的人自掏腰包下馆子。一张1994年摄于北京某餐馆的照片上，三个女人围坐在摆着空碗碟和啤酒瓶的饭桌边，举着小镜子，给刚餍足的嘴巴涂口红。

生活也从未如此有声有色。卡拉OK和夜总会承接了旺盛的荷尔蒙，人们摇头晃脑、鬼哭狼嚎，不在乎歌曲意义也不讲究演唱技巧，只要自己过瘾就好。由长虹率先打响的价格战，让更多中国家庭买得起彩色电视机，部分经济宽裕的还率先享受了家庭影院。

女人们扮靓的手段越来越新潮。1995年被称为"美容元年"，时髦女性的美丽事业又多了一项"上美容院"，可以去做脸，去减肥，还可以顺便美发。1996年欧莱雅带着五彩斑斓的染发膏来了，中国人的头发不再只有黑白两色，最时兴的是染成酒红色。

享受生活成为共识，旅游休闲蔚然成风。九十年代的开端，1992年，5个在年三十结伴去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成为新闻人物；而九十年代的尾声，1999年，国务院用政令确保了"黄金周"，长假休闲开始大范围形成传统。

一篇《浅谈九十年代中国审美时尚》的论文谈到当时的休闲风："它不仅是对紧张生活压力的自我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感性生存利益的一种制度化方式，以及满足这种利益的美学合法性。"

"当'风景名胜游览''双休日郊游''新马泰国际旅行'等名目繁多的旅游形式蔓延为九十年代中国大众的文化时髦之后，便具有了'让生活美丽'的审美性质，由富裕生活带来的娱乐享受正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往外流淌着美妙的情绪。"

整个九十年代，对生活方式最大的冲击来自价值观。

“跟着感觉走”“我是流氓我怕谁”“挣钱真累”“别理我，烦着呢”……那时候小范围兴起的文化衫，简明扼要地传达着人们的心理动态；王朔式的语言又占据着文化衫的半壁江山。

更能反映九十年代价值趋向骤变的是王朔的另一句名言：“大家喜欢刘慧芳那样的人物，吃多大的苦都得自己扛着，多虚伪的价值观，我不伺候了。”

刘慧芳是国产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在1990年让国人狠狠感动了一把——但这不过是奉献精神在九十年代初的回光返照，很快就被人们抛进历史里，个人主义才是新一个十年的主流。

清醒过来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摆脱他人和社会的干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将之上升到公民权利的高度。因为噪音与污染问题，1995年成为北京居民向建筑施工单位追讨“安宁权”的“诉讼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私人空间不容侵犯。此外，九十年代的高频词还有“隐私权”，个人要求更多自由的同时，也越来越尊重他人的自由。

中国人依然重视家庭观念，但这并不妨碍丁克家庭的数量稳步上升。“丁克”这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婚姻时尚”，在九十年代发展中的中国开始有了市场。

九十年代中期一份对丁克家庭的问卷调查显示，不生育的理由一类是出于对中国人口过多的忧虑——这听起来有些堂而皇之，另一类就显得真诚许多——为了让生活更轻松一些，第三类原因在那个年代则颇有些超前——为了自我实现。

无论如何，在传统思想最根深蒂固的家庭领域，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开始在阳光下获得了多元选择。

新生活潮猛烈的冲刷之中，不免泥沙俱下。除了电影和流行金曲，香港文化也输送了“傍大款”“养小蜜”“包二奶”。

讲述婚外情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1996年火爆中国，令许多中年男女心如撞鹿、浮想联翩，婚外情因此升温。作家梁晓声写的一篇对《廊桥遗梦》的评论，副标题就叫“中国性爱备忘录”。

好好坏坏，是是非非，恩怨情仇和财富梦想就这样在九十年代仓促上演又匆匆谢幕了。

那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必须认领的年代。

瞿颖、胡兵、吕燕
中国第一代名模的乐与路

文｜**阿饼**

“颖姐”“兵哥”和“燕姐”，这是助理们对瞿颖、胡兵和吕燕的称呼。

这些称呼亲切之余也无比贴切。在他们成名的九十年代，在不同阶段里，他们都曾是中国模特界真正意义上的一哥一姐，也如他们所说，“见证了整个中国时尚行业的发展”。

瞿颖和胡兵，应该是中国模特界的第一对国民CP，当时流行的叫法是“金童玉女”。

他们也的确“门当户对”——都在九十年代初出道，都来自体制内，差不多同一时期成为内地首席名模，签约了同一间公司，一同出演了好几部当时大热的电视剧，成为内地第一代偶像明星。在各自隐退多年后，如今他们又一同回到大众视线，每次他们在微博互动时，还会有网友在评论里撮合：“在一起！”

回望过去的20多年，瞿颖感慨时间过得特别快、变化特别大。20年前，模特还是新兴职业，家长们都不愿自家孩子去做模特，感觉太不正规、太不稳定了。

瞿颖从相对稳定的湖南省话剧团出走，进入模特行业，初衷只是因为一张照片——那是获得“1988年今日新模特国际大奖赛”冠军的彭

莉，披着一面五星红旗在长城上拍照。

“原来模特这个职业能为国争光，挺神圣的。”瞿颖看到时心里想。后来机缘巧合，她就真的进入了模特行业，不仅获得了国际模特大奖，也被华伦天奴和费雷选中在长城上与外国名模一齐拍时装大片，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夙愿。

1993年，华伦天奴和费雷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那场秀，是瞿颖和胡兵第一次走上这么高级的舞台。在那之前，中国最高大上的外国品牌还是皮尔·卡丹。当时有首炫富的歌是这么唱的：“皮尔·卡丹买两套，一套撕烂一套补洞。”

瞿颖还记得，那天的开场是由一个皮肤有点黑的女模特穿着旱冰鞋从两侧站立的男模特中间滑出来的，全场人都看呆了，之前完全没见过这样的亮相方式。

在走秀前，詹弗兰科·费雷——也是当时迪奥的总设计师、华伦天奴的瓦伦蒂诺在后台亲自给每个模特做搭配、整理衣服。这些细节都在瞿颖和胡兵的记忆里。

外国品牌不断进入中国的九十年代，这些站在国内市场尖端的首席名模，第一拨感受到了风向的变化。

那速度如此迅猛。胡兵说：“我感受到了一种新生的东西，让我的审美、工作和工作方法发生了变化，但当时我没有时间去思考这种变化，而是在想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短短几年里，整个中国都在发生巨变。

瞿颖还记得李东田第一次看她化妆的情形。当时李东田刚从蒙妮坦化妆培训学校毕业，现场还有一个台湾来的女化妆师，带了一堆他

们完全没见过的专业化妆品。“东田在旁边看她干活看得目瞪口呆，完全开眼界的感觉。”

那个拍摄活儿结束后，台湾化妆师还送了两盒粉底给这个张着嘴看她工作的小男孩。李东田把这两盒粉底视如珍宝，一定要给重要的人化妆时才拿出来用。

没想到，过了六七年，这位台湾女化妆师嫁到上海，成为家庭主妇。有一天她逛商场，看见有个年轻人在中庭演示自有品牌的化妆品，旁边围了很多记者和观众。那个人居然是当年张着嘴看她化妆的小男孩李东田——后来的“彩妆教父”。她远远看着，不敢上前打招呼。

讲到这段插曲，瞿颖说：“多么戏剧性啊！”

戏剧性在九十年代的个体际遇中并不稀奇。太多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批年轻人身上发生了。

比如，1.89米的胡兵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化上烟熏妆、以性感形象呈现在镜头里，也没敢想过自己会成为国际舞台上受人瞩目的亚洲面孔。然而，进入模特行业的短短两年，各种各样的变化都扑进他的生活里。

李东田和摄影师冯海为胡兵炮制的一组性感写真，至今还挑战着大众的审美极限。有的人说恶心，有的人说色情，有的人说以胡兵的名气和资质没必要这样出卖色相。胡兵当时是第一次尝试那么前卫的性感风格摄影。

时隔20多年聊起这件往事，胡兵依然是坦然且大方的：“那些写真是当时一种革新的思潮、创新的渴望。我确实是付出了一些代价，但

这些代价是好的，是成长的经验，是不可破灭的。我不觉得那些照片有什么问题，或许有人利用了这样的说法去达到目的，但它挡不住我要大步伐向前走的速度。”

瞿颖力挺老友，她认为无论是李东田还是胡兵，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他们的努力一如既往——还是不断在进取，不断在改变，不断在奋斗。“是那个年代让他们看起来前卫。大众也在成长变化，只是跟现在相比有一个延时。大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而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前卫’。”

对瞿颖的模特生涯影响特别大的，还有“中国模特之父”张舰和“中国模特教母”汪桂花。他们经常在走秀的编排中，针对每个人的才能和特点来设计出场方式，打破了以往很死板的走秀套路。像瞿颖以前读表演专业，他们就让她提个小花篮，转着圈儿假装追蝴蝶就出场了，别的模特没有这个素质还演不了。后来，有个模特有舞蹈基础，他们就为她设计了舞蹈形式的开场，用追光灯打在她身上。

而张舰创办的“新丝路大赛”也挖掘并培养了更多中国超模：叶继红、柏青、姚佩芳、陈娟红、谢东娜、路易、岳梅等——这些名字在九十年代前后红透中国。“新丝路大赛”也成了那些年里最受观众欢迎的娱乐节目之一。

当时国内设计师也开始崛起。广州新锐设计师刘洋邀请瞿颖走秀，让她穿上一条游泳圈似的裙子开场，那塑料裙里有水，养着活鱼。“当时一出来大家都觉得神奇得不得了，居然在服装里有金鱼在游来游去！”那场走秀给瞿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革新、创新，在胡兵看来，这是九十年代时尚圈特有的思想浪潮，要倾尽全力去不断跟进。而无论是李东田、冯海、张舰、汪桂花、胡兵还是瞿颖，他们都是时代潮流中的一分子，他们渴望着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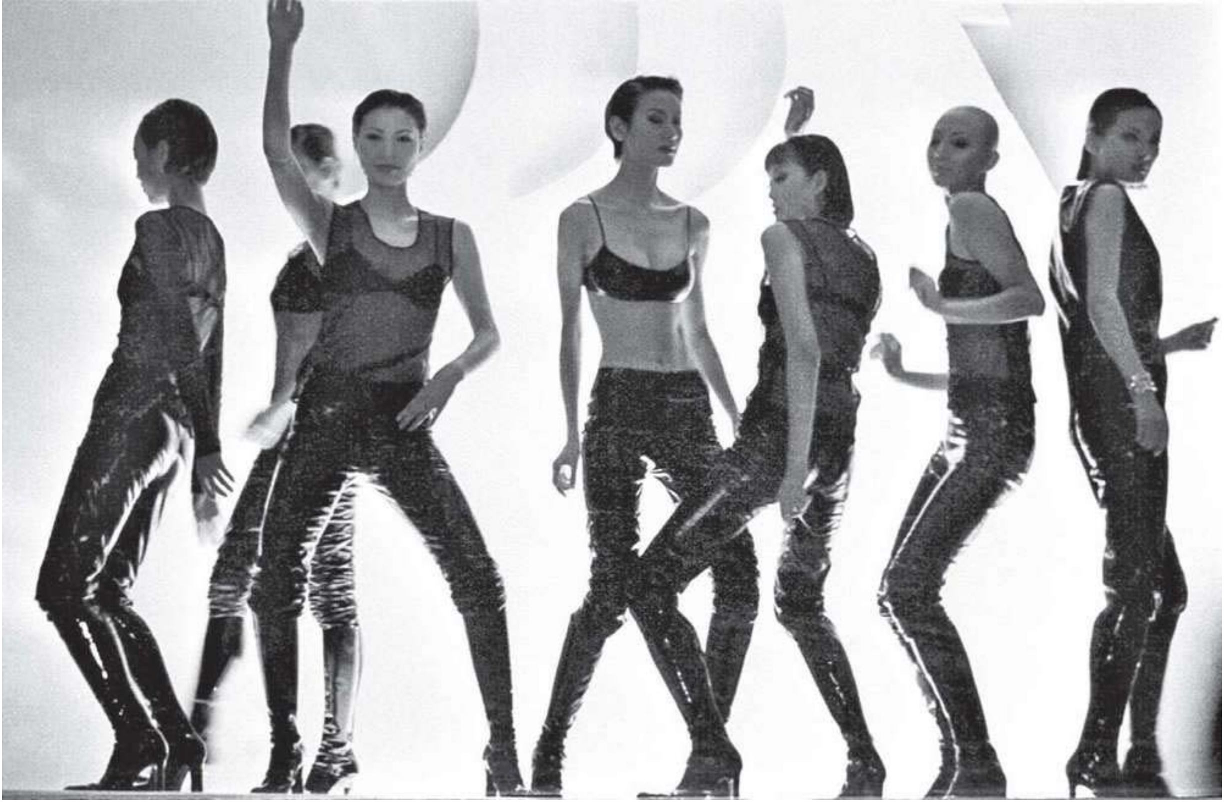
革，对新事物的追求已达到了极致。甚至可以说，作为时尚弄潮儿，他们本身就是九十年代的新鲜事物。

24年来，从模特做到演员再到《芭莎男装》的主编，再到如今第一位时装周国际男装大使，胡兵依然走在行业前沿，他的名字从来都与各种时尚名词紧密关联。

“你们看我，就能看到整个中国时装的变化。”胡兵说。

“十年前我也曾经五颜六色，什么东西都可以在我身上出现，头发梳到天上去，再挂一堆珠宝首饰。我一点也不为这样的自己感到难过，因为你也可以看看你十年前的样子，这只是时尚的一种变化、一种升级而已。这种变化若在我身上看不到，中国的时尚业就没有发展。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区别有多大，中国时尚业的发展就有多大。在中国，这十年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变化，而我的变化可能更具代表性，因为我就身在时尚行业里。”

在中国女明星里，瞿颖是第一位登上国际杂志VOGUE及《时尚COSMO》封面的。九十年代，除了模特本行，她还是“影、视、歌、主持”多栖大明星，那时她的身材就是教科书，凭着一副大气的长相和一双大长腿纵横名利场。



1998年9月20日，设计师王新元、张肇达的大型时装展“不是我，是风”在南京举行。40多名中外模特在10个场景中展示了218款服装。（图/高林胜/新华社）

瞿颖记起当年流行的是大垫肩，而且还是活动的，可以随时抽出，实用、百搭；大行其道的还有宽腰带和高腰萝卜裤。时尚就像轮回，如今，那些反而成了复古范儿的装备，又重新回到流行风潮的河流里。

她还记得在国外时尚杂志进入中国之前，给《现代服装》《上海服饰》《中外服装》这样的本土时装杂志拍片的“窘况”——除了摄影师，没有造型编辑，没有化妆师，都是被拍摄对象自己化妆、自己带鞋带包上阵，“眉毛和眼睛画得跟被人打了似的，乌青乌青，嘴巴也跟刚喝完血一样”。

这样的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期吕燕出道时依然没有太多改变。当时香奈儿、迪奥这些大牌已经进驻中国市场。“品牌也没有给杂志提供样

衣，都是由编辑去品牌店里借，要特别小心，不能弄脏弄破，我穿着也是小心翼翼的。而且店员也很不待见这些编辑。”吕燕回忆说。

不过，这批时尚宠儿开始陆陆续续走出国门看世界了。吕燕就是其中的翘楚。

这个出生于1981年的女孩子，以黑马的姿态让国际舞台为之惊艳。她小眼睛，厚嘴唇，有着蒙古人种特有的稍微内缩的下颌，这张特立独行的面孔，加上李东田的打造，以及冯海标新立异的拍摄风格，种种杂糅，形成了九十年代末大放异彩的“吕燕风潮”。

在瞿颖这种“老一辈”模特看来，她这一代所接受的教育比较传统和保守，面对时尚行业里的新鲜事物需要更强的适应能力去消化、吸收和接纳，所以面对冲突和变化的能力也会强一些。而像九十年代末的吕燕及更晚一些的新生代模特，则更自我和自信，生存能力更强。

“比如我们以前去国外接活儿，都是跟着组织走的，而她们都是一个人背着行囊就跑出国去签公司了。她们也会更科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自己，比如健康的饮食、定期健身、系统地学外语等。”瞿颖说。

1999年出道的吕燕像一颗幸运的棋子，恰如其分地嵌在世纪交接的转折点上，那个节点正好是中国时尚蒙昧之初。最后，她改写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念。

长江后浪推前浪，吕燕也成了时尚圈的“老一辈”。和瞿颖一样，她也留意到时代在这个圈子里的变化：“之前的模特走的都是国内品牌，现在的模特可以走世界各地的品牌，各种好衣服都能穿，各种大牌摄影师都能合作，见识更广了，平台更大了，也体会不到以前模特的艰辛。”

“记得我刚刚到巴黎发展时，中国的时装编辑想去参加时装周，是没有邀请函的，我趁着去走秀的机会把她们从后台带进来，全场站着看，那都是很激动、很享受的。现在呢？她们坐秀场第一排，坐商务舱，却没有了当初老编辑们那种苦中作乐的很珍惜的心情。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才会特别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2000年是一个纪元，对于国际时尚圈来说，中国还是一个“0”。而吕燕在跨纪元的年份，将自己从“0”变成了“1”。不管这个“1”带有多大的争议，她的出现昭示了中国时尚的潜力。

回忆很美，故事很长，然而十几年如今看来不过是指缝间的事。吕燕已经转型做时装设计师，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她取了个有趣的名字叫作Comme Moi，英文是like me，翻译成中文就是“似我”，意思就是专做吕燕自己喜欢的风格的衣服。

相对于科班出身的设计师，她有着一如既往走T台的自信与坚持，相信自己多年的模特经验有更多优势。“因为设计只是经营整个品牌的一小部分，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面料，什么是好的版型、好的搭配，以及以一个消费群的角度来体验这些衣服。”

在为自己的品牌走秀选模特时，她也会选择跟自己气质相仿的女孩——不是那种特俗的美丽，一定是年轻、有活力、健康、开心的那种。

而她给年轻女孩们的建议——“多到处走走，多去看看博物馆，多结识朋友，把眼界放宽一点”——听起来很“九十年代”。

逻辑清晰、表达精确的胡兵，总结了那个共同属于他们的九十年代：“这个时代不允许你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能连蹦带跳地去追赶，来不及回味，就已经去到了那个时代。就跟现在一样，我以前接

受报纸、杂志、电视的访问，后来接受网络的访问，现在都是直播了。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你来不及想就已经过去了。”

胡兵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的“被时代淘汰”，或许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这第一代名模同样焦灼的。“我是一个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每一秒都有危机感的人。每一秒都在更新自己的思想，勇往直前。‘被时代淘汰’这个词，是我对自己的提醒。”

“新锐设计师”刘洋
一夜之间，中国男人变帅了

文｜**曹园**

“刘裁缝回来咯！”刘洋一到家，表弟就大声喊起来。

1983年，广州美术学院在中南五省只招了8名新生，刘洋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广东第一批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当时整个中国服装业都是刚起步，我们的服装教学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光宗耀祖的活计，曾有大半年没和他通信。

他不服气：“谁说我是裁缝！”听说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得过法国总统颁发的勋章，“我一下子就有个冲动念头，要让人们感觉到设计师也是一个明星职业”。

年纪轻，胆也大，刘洋一头长发，装扮前卫。后来他把女装做出了名气，名字上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女友》等，“也有了些偶像气质”。他经常收到来信，有大学生、工人和农民的，也有受他鼓舞的残疾人士的。

这时他发现，中国还没有人关注男装。“我想我应该为中国男人做点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在九十年代大获成功。1994年春天，刘洋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场大型男装发布会。

早年，刘洋在广州做“走鬼”（粤语，无牌流动小贩）卖衣服，8平方米的出租屋，没有风扇的夏夜，自己画画裁裁，出口转内销。那时，香港拉来的布头在广州堆了一地，他淘宝似地蹲在那里，为发现的图案兴奋至极。

九十年代从一开始就是刘洋的收获季。

1990年，他在广州举办个人处女秀，第一次将性感风格的服装展现在内地的服装舞台上。一组挂在女模特胸部的草编装，尖锐得像雪糕筒，有点像那年麦当娜演唱会上的锥形胸衣造型。

“在1990年，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的模特也不能接受，刘洋花了很大精力才说服她们。往台上一亮，舆论哗然，争议不断。没有人留意到，刘洋为了求东莞老农用传统手艺一点点编织莞草，主动去帮忙照顾对方的孩子。

之后，当时国内最优秀的第一代女模特借走刘洋设计的服装，在珠海和深圳演出。一边是高级的西餐美食，一边是女模的时尚表演，“时装佐餐文化”其实是由刘洋开始的。

男模特的春天也来了。为了1994年的男装秀，刘洋多日不睡，熬夜画图。没有电脑操作的年代，很多步骤靠纯手工去完成。

60分钟的发布会，展示了200多套男装。猛一看，他的作品很“洋气”；再细看，又包含着民族特色。

其中有以京剧脸谱和印章为灵感做成的赛车服，也有传统麻布和草编鞋的搭配。出道至今，刘洋一直标榜“将东方的娟秀和西方的浪漫融为一体”。“东西方融合的设计才有灵魂”，他认为，民族特色不一定要表现在明面上，不一定要龙凤呈祥、绣花鞋和旗袍。

这场破天荒的男装秀也激活了国人的时尚触觉。当年有媒体称：“刘洋不断以他前卫的形象和作品，刺伤人们的眼睛，满地是血。”还有人总结：“无疑，刘洋是第一个填补了中国裁缝与明星之间空白的人。”

现在的大把“鲜肉”男模，放在1994年却是稀有物种。刘洋在北京寻遍了医院和学校里的高个子男人，最终挑选出几十个。张巍、程峻、胡兵等后来的一线男模都得益于他慧眼识珠的挖掘。

发布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上千人摩肩接踵地涌进这个当时最高级的接待场所，刘洋倚着保安构成的人墙才能走动。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很多人进不去，他还因此得罪了一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

中国男装表演的新纪元就此开辟。央视曾有4个频道同时播放刘洋的男装发布会。他也出现在《东方之子》里——当时央视这个金牌访谈节目的人选需要30多位专家来评审以及台长签字确认，刘洋算设计师中的第一人。



九十年代的刘洋硕果累累，不但举办了多场有影响力的发布会，还获得多个业内奖项。(图/陈学思/新华社)

甚至几年后范伟在春晚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中戴的头饰，还让人一眼就想起刘洋包头巾的造型。

在那个时代做了一些大胆的事情，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追捧，刘洋说，他很感恩。

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国内有行业评论员猛烈抨击道：男人怎么都穿上彩色衣服了？他们认为男人应该像高仓健那样，绝对不能穿粉色。但刘洋已经开始做那样的设计了。“对色彩和美来说，男人有一天可以和女人平分秋色。”他说。

1997年，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在整幅海报上用了刘洋的头像，这标志着中国设计师真正作为主角在国际上亮相。刘洋带着超模陈娟红奔赴秀场，外媒一边戒备地说“要警惕来自远东国

家的竞争对手”，一边服气地赞叹“刘洋的时装像当晚的烟花一样美丽，中国设计师让人大开眼界”。

2010年，刘洋和钟南山、张丹丹等一起为广州亚运会拍摄形象宣传片。对他来说，这比在专业上获得无数肯定更让人自豪。

流行时尚通常10年一个周期。回望九十年代，刘洋记得老百姓对时装秀最直观的想法是，为什么舞台上表演的服装在生活中都不能穿?

“大家懵懵懂懂，却也爱欣赏，毕竟舞台上的音乐和装束是美的东西。”人们对服装依旧好奇，甚至很多人认为“时装”就是“奇装异服”，冠以贬义。但刘洋认为，九十年代的时尚生活已经比八十年代进步很多，人们已经知道模特这个职业，知道国外每年会发布流行时装。

“那个酝酿和摸索的年代，在朦胧中探寻时尚和美。苗头已经出现，但更多的是迷惘。爱美之心与生俱来且人皆有之，人们一边渴望，一边也怀有害怕和恐惧。”

从染发、烫发到佩戴饰品和欣赏流行音乐，女士越来越追求时髦。男人还略显滞后，不敢越雷池一步，怕被认为不正经。刘洋还记得当年领导要求他“穿得文明大方”，标配就是白衬衣、红领带和蓝裤子。

1998年，社会的时尚观有了转变。刘洋在获得中国时装设计“金顶奖”的那场大秀上，第一次给所有男模化了妆，以前只有女模才需要浓妆艳抹。当时刘洋亲自给所有男模画了眼窝、眼线、眉毛和腮红，使他们的五官变得立体。艺人张咪对刘洋说：“怎么发现一夜之间中国男模都那么帅！”

也是从这开始，男模上妆成为行业习惯。

与刘洋前卫的审美意识和设计天赋相对应，他本人的造型长期被认为“出格”。八十年代，除了喷古龙水，上大学的他还染了一头黄发。“当时老师给我写了一个纸条说，宁愿眼瞎掉。”他在学校食堂吃饭，所有人敲着饭盆一起喊“崇洋媚外”。到了1999年，刘洋获得“广州十大杰出青年”时，他又顶着个非洲爆炸头去领了奖。

如今，刘洋意识到，前卫不需要一次走很多步，否则人们都不能理解。“一大步再往后退一点点，这样更适合中国男人。”

二十多年来，中国男士的形象在他眼里进步巨大。“到今天，男人也可以染发、扎马尾、戴耳环、文身、微整形以及尝试中性装扮，这是时代的进步。现在的男人穿什么你会很奇怪呢？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回想起自己在九十年代时尚圈的“开天辟地”，他淡然视之：“我一直觉得刘洋只是一名设计师而已，时势造英雄，时代成就了一些所谓成绩。”

摄影师赵钢
上万张底片记录《我的大学》

文 | **于靖园、罗屿**

下着小雨的北京，刚刚从郊区赶到市中心的赵钢坐下来。他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T恤，这是从九十年代大学生开始流行起来的打扮。

赵钢和那个年代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此。他曾经用摄影师特有的第三只“眼睛”——镜头，记录了那段命名为《我的大学》的光阴。

《我的大学》是赵钢摄影生涯的第一部作品，上万张底片，从1992年拍到1998年，记录了他的大学生活。1996年赵钢毕业后，他的学妹、后来的夫人丁凤园继续拍摄女生宿舍的生活，也让这部关于九十年代大学生的“青春纪念册”更加完整。

在许多人生际遇里，大学生活往往是最适合拿来追忆和回味的部分，所有话题都适合用“那些年我们一起……”的句式来开启。

1992年，背着一台相机的赵钢，走进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相机是赵钢的父亲1985年买的理光单反，价格2000元，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奢侈品——但它的价值后来被证明远远高于此，因为它承担的是记录时代细节的任务。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兴起。这次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快对大学产生了影响，虽然大规模的扩招尚未开始，考大学依然不亚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业分配工作的“铁饭碗”已被打破——这无疑是个微妙的转折点。

迫不及待拥抱大学生活的赵钢，很快组织了大学第一次集体郊游，理由就是帮大家免费拍照——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简直求之不得。没有QQ，没有微博，没有微信，那时候影像传播得慢，相片也冲洗得慢——一张照片会打印出纸质版，装进相框珍藏。

那次郊游的照片，成为赵钢的影集《我的大学》里最早收录的一批图片。但赵钢显然预谋已久，早在高四复读的学习间隙，他就已经决定上大学后将点点滴滴用相机记录下来。

这个念头来自另一位摄影师的影响。“1991年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王福春，他当时在拍《火车上的中国人》。”赵钢记得王福春告诉他：“你如果真的喜欢摄影，就不要去拍那些花花草草，要拍些有价值的东西，记录身边的生活。”

上大学后，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赵钢对摄影的热情更大了，他已经有拍摄图片专题的意识。

头两年里，赵钢每一两个月就从长春回一次哈尔滨。那时周末只有一天休息，他周六中午奔到火车站，坐4小时的车回家，晚饭后在家里的门厅摆上放大机，连夜把前段时间在学校冲洗好的胶卷放大，第二天上午去王福春老师家请他点评，下午再返校。

1994年，赵钢又添置了一台CR5，镜头是28mm、50mm以及70—200mm。

当时周围的很多人，认为拥有这些设备的赵钢是个“富二代”。其实，赵钢的家庭条件不算富裕，父母都是铁路职工，支持他拍摄实属不易。“我每学期会从生活费里挤出一些钱买胶片，当年400度乐凯60米的盘片卖90元，可以缠35个胶卷。每年新生入学，我还能从拍合影中赚点外快。大四那年，我甚至没有买新教科书，向学长要二手的教材。”赵钢回忆。

九十年代的高校氛围在《我的大学》里有最真实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赵钢既是这部图集的创作者，同时也是影像里的主人公。早早成熟的摄影技艺，使他能够以双重身份介入拍摄。这也是此部作品的特色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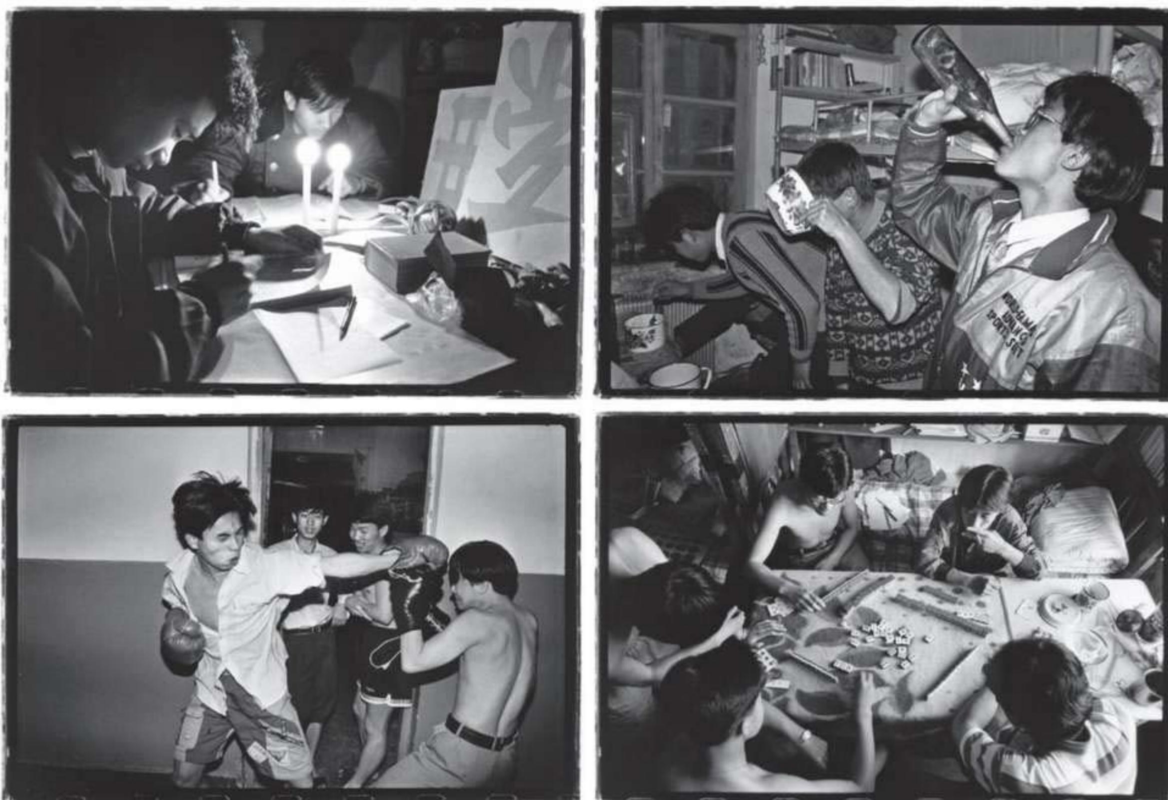
完整的叙事结构，细致入微的观察，成熟的视觉语言，与生俱来的“不合群”感赋予他敏锐的直觉，捕捉到了转折年代投射在大学生活中的种种变化。

那些画面中，十几张表情各异的脸、不合时宜的装束、密集的构图有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大学新生跨下中巴车的那一瞥怯生生的眼神，无所事事地站在暖气片上等着母亲替自己铺床的同学，暴风雪中监督同学晨跑考勤的班干部，上半身衬衣领带下半身短裤拖鞋拍简历照的毕业生，大学学费上涨后围着窗口缴费的家长，取消分配工作后人山人海的招聘会等，都被赵钢犀利地捕捉下来。

九十年代的大学生，爱唱《小草》，喜欢看《高山下的花环》。学校的露天影场播放着《爱情故事》《走出非洲》《罗马假日》等一大批经典电影，总有女同学被电影情节感动得掉泪。

从大二起，赵钢开始为摄影协会的朋友传授拍摄技巧。师弟师妹们坚持下来的人不多，丁凤园是一个，两人后来成为伴侣。这其中是否有什么浪漫故事，赵钢总是不愿谈，但摄影本身就是一件最浪漫的事。

1995年，赵钢的镜头拍下了学生宿舍里的电脑——一个计算机系的、来自南方的同学，花了两万多元买的486，全校第一台学生自己的电脑，还是彩色显示屏的。赵钢特意过去拍了照片。



组图：《我的大学》系列作品。挑灯夜读、喝啤酒、玩拳击、打麻将……赵钢呈现了九十年代大学男生宿舍的原生态。（图/赵钢）

“那是一个开始。”他感慨。事实也是如此。电脑和逐步兴起的互联网使当时的很多人获得机会，丁磊、马化腾、雷军、李彦宏等都是那个年代的毕业生。

赵钢在1996年夏天毕业。他将一台相机留给丁凤园继续拍摄《我的大学》。

“当时我拍身边的同学、朋友，他们都可以接受。但要进女生宿舍拍，对我来说就比较困难，主要是学校不允许。后来我毕业了，我就把相机给我太太丁丁，她也喜欢拍照。我跟她说，这个作品缺了一个女生宿舍生活的部分，让她拍一下。她拍的照片不多，但影像都很好。”赵钢说，他不认为这对丁丁来说是困难的，他觉得真正的困难在于下定决心。

丁丁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大四那年她慢慢找到感觉，完全进入创作者的角色，她拍摄那些化妆的、健身的、在走廊复习的女生，把那个年代女大学生的羞涩、自由、憧憬等状态记录得非常细腻。

赵钢认为自己记录的部分刚好是中国大学转型前的状态。1996年他毕业时，学校的自习室已经人满为患，而在他大学生涯的前三年，他从来没有去自习室占位这种意识，因为无论如何，那里都会有空位。

赵钢毕业后，学校开始大规模转变，主教学楼贴上瓷砖，宿舍重新装修、加高，校区增添了许多新楼，学校变得很大，名字也改叫长春理工大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毕业那一年，学费已经从300元一年涨到2000元一年。”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是个过渡年代，统分和并轨收费并存，这个年代的大学生既不受统分制的拘束，也不像市场化后那么有压力。

“双向选择”政策是1988年开始的，与之前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企、民企，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都会放行。

1994年是另一个历史节点。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1999年大学扩招后，各个大学人满为患，开始在各地建“分校别院”，大学学费也一路飞涨，大学生被批量生产，“就业难”成为社会话题。

但这也是时代的一种进步。市场经济改变了九十年代这一批大学生。

赵钢的一个浙江同学，最初由于家境贫苦，从军训开始就一直穿着军服，从不换新衣服，而在大三时，赵钢发现他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家开始做服装厂，从南方的小乡镇企业做起来，然后到大四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穿西装了。快毕业之前，他跟我说，他也想学摄影，要买个相机，于是家里拿了两千多块钱给他买了个相机。”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时代是不可替代的，是最美好的，我也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赵钢说道。

就像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描述的一样，他们大概是最后一拨开会时有事没事就开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学生，他们或许也是最后一拨看着露天电影、跳着交际舞的高校学子……电影中那穿过长长的宿舍走廊打到的热水、随处可见的帆布鞋、流行的喇叭裤和红白游戏机，无一不在提醒着这群九十年代大学校园里走出的学生，这是让他们备感亲切的大学生活。

2006年，赵钢正好毕业十年，他在一个开学的日子回到母校，那里的变化让他吃惊——校园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到处是崭新高大的楼房，在校学生从他们当时的四千多人增加到了两万。高年级学生向新生叫卖手机卡。

面对赵钢的镜头，摄影协会的小师弟一脸严肃地和他说起肖像权的问题。宿舍里人手一台电脑，恋人在旁若无人地亲热，摩托车呼啸

而过；除了还未拆除的几栋老楼，赵钢几乎分辨不出这里曾经的面貌。

“薄薄的照片，经过时间的累积而变得厚重起来，和我年龄相近的人，都能从我的照片中追忆起可爱的大学时光。”赵钢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这组照片，上面还写有公告：“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校友，如果你在我的照片中发现了自己，请与我联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赵钢找回了十几个校友。“有些同学在国外，有些说很怀念那段日子，觉得这些影像非常珍贵。”赵钢抿了一口咖啡。如今，这些珍贵正以另一种形式在延续，从黑白相片跳到彩色现实：采访结束后，等候他的是另一场久别的同学聚会。

九十年代洋品牌
中国人的“生活导师”

文｜**曹园**

柔软的沙发座位，有情调的露天藤椅，时尚的墙面装饰，还有免费Wi-Fi……自从几年前彻底重装后，深圳市东门的光华餐厅已经看不出二三十年前的气息，标准咖啡厅风格的室内设计，很容易让人忽略这是一家麦当劳。

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

第一批员工、时任餐厅见习经理的梁翠英，对1990年10月8日那天的盛况依然印象极深。

怀着巨大好奇的人群从光华楼二楼排到一楼，又延伸到外广场。男女老少穿得整整齐齐，仿佛面对一个郑重其事的仪式。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这称得上奇特的一瞥。比香港晚15年、比台北晚6年后，麦当劳选择从中国经济特区深圳着手，进入这个庞大的市场。

在市领导出席的开业典礼后，上午11点，餐厅开始营业，20台收银机全部打开，500个座位很快挤满。除了在深圳招聘的几百名员工，麦当劳还临时从香港抽调人手支援。

那天，光华餐厅刷新了麦当劳单日营业额与顾客光临人数的全球纪录。

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当时已经在深圳国际旅行社工作的梁翠英，是从6000多封应聘信里脱颖而出、经过3轮面试、见过7位考官，前后用了半年，才终于被选为麦当劳见习经理的。那一批见习经理一共10人：8个本科生，2个硕士生。

“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炸薯条、做汉堡、端餐盘这样的‘技术活’。”餐厅初具规模，但设备还未安装好，开业前的培训，他们制作了一些产品道具，把木块当成“牛肉饼”，把吸管当作“薯条”，拿来反复练习。

那时光华餐厅用港元标价。第一个周日，有人揣着千元面值的港币，一口气点了10个巨无霸。

中国人面对新事物的热情不难理解。虽然许多人已经解决了肚子问题，但在精神上，面对充满诱惑和想象空间的洋品牌——尤其是它所象征的生活方式，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人还是饥饿的，跃跃欲试的，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地盘上尝尝鲜。

一切都是新的。梁翠英形容麦当劳在当时受欢迎的原因是“新的食品、新的就餐形式、新的环境所营造的新的饮食文化”。

麦当劳和肯德基教会国人文雅地排队，也不介意成为公共的WC（厕所），还为深夜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片刻的温暖。这样的尊重感前所未有。那个年代，洋品牌无形中充当了一位生活方式的老师。

到了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那些在麦当劳休憩、约会或谈正事的人，开始转去体验更为新鲜的星巴克——1999年1月11日，内地第一家星巴克在北京国贸中心开门迎客。

国贸店的首批员工梁涛记得，在装修筹备期间，经常有好奇的路人进来打听星巴克究竟是干什么的。

吴晓雷就是“顺着浓郁的咖啡香味，抱着强烈的好奇心”走进星巴克的。店员给他调制了橙香拿铁，并热情地带他到展览墙，介绍一杯咖啡从原豆到烘焙的全过程。

这让在中国大饭店西餐部工作的吴晓雷大开眼界。“原来咖啡里有大学问。”

十分钟时间，他决定加入这个陌生领域。在1999年，舍中国大饭店而选择星巴克，这还是一个冒险的选择。

当时，两杯卡布奇诺的价钱，约等于普通工薪族几天的饮食开销。中国人并不懂咖啡，但也恰恰因此，追逐时尚的年轻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星巴克的洗礼。

不同于快餐连锁，星巴克从进入中国就被打上了“小资”的耀眼标签，成为一种暗示。对小白领和文青来说，手握一杯星巴克，快速行走在商业街路口，有一种都市精英的错觉和优越感。

曾任长江商学院营销学副教授的赵昊说：“美国星巴克的装修很注重顾客的隐私，而国内星巴克最喜欢的就是大落地窗。”行人可以瞥见坐在星巴克里的人，他们喝着30块一杯的咖啡，在苹果电脑上敲击，与生意伙伴侃侃而谈。“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虚荣心，也是星巴克进入中国以来能这么火爆的原因。”

得到白领与中产青睐的还有来自瑞典的宜家。虽然宜家店面积的标准是28000—35000平方米之间，但仅有8000平方米的上海徐汇店还是在1998年开业了，这是内地的第一家。

人们渐渐对这个以“为普通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每一天”为定位的“家居便利店”趋之若鹜，接近新世纪，中国人的家里不再是原汁原

味的中式设计或者干脆无设计。逛宜家甚至成为一种休闲方式，即使人们家里没在装修。

九十年代中后期，从吃、穿、住各个方面，中国人越来越习惯在生活中与洋品牌为伴。真维斯和班尼路等一些挂靠国外名头的服装，开始把专卖店开进各大城市的商业地段。而耐克、阿迪达斯等欧美运动品牌，也与本土服装展开了正面角斗。

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舒适的变化，也体现在交通方式上。

九十年代初，能挤下10人的黄色“面的”还是北京街头常见的场景。1998年，北京市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扫黄”，以“砸面”回收的方式，完成了出租车的第一次更新。

代替“黄虫”出现的是红色夏利，当时有人戏称“祖国江山一片红”，严格来说这是合资品牌。第二年，出租车市场又引入了富康和捷达。

淘金热的九十年代，私家轿车也受到越来越多先富人士的追捧，北京、深圳、广州和温州等地的购买量日益增长。

1992年，法拉利在北京亚运村举行展卖，当时的北京首富李晓华以13.888万美元成交，成为中国第一位法拉利车主。

1994年，国家明文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干预个人购买和使用正当来源的汽车。”

随着上海通用和广州本田成立，“中高档轿车”的概念进入中国家庭生活。国外的售后服务也在1998年后舶来，本田、通用和奥迪先后开设4S店，中国车主第一次尝到了“顾客即上帝”的滋味。

生活辞典

辑｜**邓娟**

/ B /

白领 1995年1月，上海《青年报》刊出《大陆首次白领公众调查》，“白领”一词引发关注。这个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指代技术人员，以区别于干体力活的“蓝领”。而自九十年代进入中国后，“白领”的内涵进一步演化为高收入、优雅的工作环境以及时尚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人追捧的概念、大学生最向往的职业类型。

保健品 自851口服液在八十年代末开启国内保健品营销的历史，这股热潮方兴未艾，整个九十年代各种保健品粉墨登场：中华鳖精因为“马家军”的推荐风靡一时，太阳神如日中天，三株口服液重振市场，红桃K成为王牌，脑白金“咸鱼翻身”，纽崔莱后来居上。2000年，国家决定整顿保健食品行业。

/ C /

超市 1994年，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驻中国，真正的超市出现了。第二年，家乐福等欧美外资企业也开始进入，应有尽有的商品，天天优惠的折扣，自选自取的方式，使得顾客不用再看售货员的脸色，超市成了国人最喜爱的购物场所。

/ D /

大哥大 曾经的港片里，摩托罗拉3200作为江湖大佬的标配，获得“大哥大”这个接地气的美称。1987年，广东开通了首个模拟移动电话网，但因为价格和使用费昂贵，大哥大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土豪色彩。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谈及，1993年北京举行十大流行语的评选，第四名即为“大哥大”。

大宝 1993年，伴随着“大宝天天见”的广告在央视二套出现，大宝的经典产品SOD系列深入人心，成为雪花膏之后最大众化的“国货”护肤品。它以稳定的质量和朴实的品牌调性，连续多年保持销量冠军。2008年，大宝被强生收购，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名字永远属于九十年代的温情回忆。

/ E /

二奶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政策进入成熟阶段，吸引了大批港台商人前来投资。对一些风流人士来说，在内地金屋藏娇比在港台需要的开销和承担的责任都小很多，于是出现了许多人包养一个“小老婆”的不良风气，人们戏谑地称为“包二奶”。

/ H /

呼啦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曾经风靡又很快淡出的呼啦圈，因为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在中国火得铺天盖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房门后挂着一两个。1994年，创造了旋转98个呼啦圈吉尼斯世界

纪录的上海小姑娘欧阳贝妮亮相春晚，更使得这股“呼啦圈热”如日中天。

韩流 1993年，韩剧《嫉妒》第一次登陆内地。1997年，韩剧《爱情是什么》在央视热播，带动了韩国娱乐文化大规模涌入。《星梦奇缘》令男星安在旭成为许多人的白马王子，HOT组合更是掀起少男少女竞相追逐的街舞旋风。哈韩风潮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

黄金周 1999年，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长假。中国人的假期多起来了。这一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令全国旅游业狠狠惊喜了一把，综合收入达141亿元，假日旅游热从此经久不衰。

/ I /

ICQ 1996年，以色列Mirabillis（米拉比利斯）公司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让人们能够在网络上快速交流，开发出一款支持发送消息和文件的即时聊天工具，取名ICQ，意为“I Seek You（我寻找你）”。软件一经推出，很快创下最高下载纪录。1998年，美国在线斥巨资收购了ICQ。

/ J /

健美裤 九十年代爆款裤型，贴身、踩脚，穿起来像个倒三角，被视为健康美丽的象征，小学女生、工厂女工、广场大妈几乎人手一

条。有句顺口溜“不管多大官，都穿夹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调侃了这种一拥而上的全民审美。

甲A 1989年，甲A联赛正式建立；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全面推行俱乐部制，第一届甲A足球联赛正式打响。足球职业化改革给球员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代球星高峰、郝海东等崛起。尽管甲A后来深陷假球、黑哨等丑闻，但它在最初几年确实给中国球迷带来了欢乐。

金嗓子 卡拉OK从日本传至港台，一度如火如荼。1991年7月1日，金嗓子卡拉OK夜总会在广州吉祥路开业，被认为是大陆第一家卡拉OK，也是第一家夜总会。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娱乐业迅速发展，从沿海到内陆，从大城市到小市县，夜总会大量涌现，卡拉OK劲风猛吹。

/ K /

康师傅 1992年，台湾顶新集团在天津生产出第一包康师傅方便面，这是顶新为了进军大陆市场而特别研发的品牌。此前虽然已有大陆企业引进了方便面，但市场一直未能热起来。顶新为了标榜健康食品，将其命名为“康师傅”，“师傅”入乡随俗，迎合了北方人的惯用称谓。

扩招 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大批人满怀憧憬地走进大学。第一年的招生增幅达到42%，被评为1999年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教育政策之一。但因为速度过快，扩招从一开始广受欢迎到后来陷入争议。人大前校长纪宝成说：“从1999年至2005年每年递增25%左右，远远超出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这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科学发展。”

/ L /

礼仪小姐 1992年，上海市文化局主办“文化礼仪小姐先生暨上海国际艺术节主持人选拔赛”，虽然官方同时强调“文化”“艺术”“国际”，但人们只记住了“礼仪小姐”。《明报》称这年开始的选美是一场“温柔的角斗”。后来，“礼仪小姐”更多活跃在机构和项目的开业、竣工的剪彩现场。

旅游度假区 1992年，为了促使国内旅游“从观光型向观光度假型转变”，国务院决定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并开发优惠，鼓励港澳台和国外企业及个人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同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包括江苏太湖、上海横沙岛在内的11处国家旅游度假区。

六神 1993年，上海家化推出了以“去痱止痒、提神醒脑”为明确定位的六神花露水。从诞生之日起，这支小绿瓶就与中国人的夏天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为九十年代的鲜明标志之一。小清新气息的六神花露水，还被戏称为本土版的香水，有着“six god”的花名，在兰蔻、迪奥等洋香水品牌的衬托下，别有一番风味。

/ M /

马艳丽 九十年代中国“第一名模”。1995年，从运动员转型的马艳丽获得上海国际模特大赛冠军，身高1.78米的她，无论走秀还是后期创办个人品牌，都带着强大的气场和迷人的自信。陈娟红、马艳丽、谢东娜，以及1999年出道的姜培琳、吕燕等第一代女名模、超模，以东方面孔出现在国际T台。

毛戈平 1995年，电视剧《武则天》中刘晓庆的妆容，让化妆师毛戈平一夜成名。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尚界，毛戈平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除了影视舞台剧造型，他也涉足时装、广告等领域，并创办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形象设计学校和彩妆品牌，影响了一代人的美容观念。

/ N /

内衣外穿 1990年，麦当娜世界巡演时的金色胸罩装造型，使得内衣外穿概念开始流行。随后，在巴黎春夏女装发布会上，花边、吊带等传统内衣元素大量出现。内衣化的时装、外露的性感，成为整个九十年代经久不衰的潮流。

农家乐 九十年代在国内兴起的一种旅游与休闲娱乐形式，为农民增收的同时，也满足都市人回归自然的需求。虽然听起来乡土味道浓郁，但“农家乐”其实是舶来品，雏形是西方的乡村旅游。最早，西班牙人把乡村城堡改造成饭店，留宿客人，同时改建农场和庄园，提供游乐和农事项目体验。

/ O /

OICQ 1999年，腾讯推出即时聊天软件，并模仿ICQ命名为OICQ，意为“Opening I Seek You（开放的ICQ）”。2000年，因为被美国ICQ公司起诉侵权，OICQ改名为QQ，并很快席卷国内市场。那只跳动的企鹅头像开启了一代人的网络社交。

/ S /

SOHO族 九十年代，电脑和网络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SOHO（Small Office，Home Office）概念，选择在家里办公。但与其说SOHO是一种工作方式，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SOHO作为一种住宅类型的名词，九十年代初由日本首先提出。

奢侈品 1990年，卡地亚以拓荒者姿态进入中国大陆奢侈品市场。1992年，LV专门店在北京开业，因为Logo辨识度极高，迅速成为新富阶层的身份标识。同年，北京燕莎商城在一片麦田中落成，天价商品令人咋舌，坊间流传“想了解世界富豪的生活，就去燕莎商城看看”。巴宝莉、香奈儿、古驰、阿玛尼等国际大牌纷纷在九十年代入驻中国。

施拉普纳 1992年，中国足球决议实行职业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洋教头施拉普纳来了。这个德国人带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打入亚洲杯足球赛半决赛，后来因未能帮助球队取得1994年世界杯参赛资格而下课。担任足球经纪人后，施拉普纳促成杨晨、谢晖等国脚转会德国俱乐部。

双休日 1995年，国务院第174号令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制度，星期六和星期日为法定休息日。中国成为全球第145个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国家，双休日正式走进人们的生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

世纪结婚潮 中国人喜欢吉利数字，逢节日或“九九”之类的特殊日期尤其受新人追捧。赶在千禧年之前，1999年9月9日，这“五连九”的好日子，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适合结婚的一天”，许多70后选择在当天走进婚姻殿堂。

/ W /

网吧 1995年，国内第一家网吧“3C+T”在上海开业。此后，网吧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大街小巷，每小时的收费约10—15元——虽然不算便宜，但在那十几年里，网吧对许多人来说，仍然称得上是相对廉价的重要娱乐场所，更是80后青春里不可或缺的回忆。

伟哥 1998年，Viagra在美国上市，3位科学家因此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医学奖。这颗蓝色的小药丸使全球为之躁动。台湾称它为“威尔刚”，而香港及内地使用的“伟哥”则带有一种暧昧感。由于尚未引进，人们到处托关系从国外代购，直到2000年它才获准在中国上市，命名万艾可。

/ X /

休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1992年，“休闲”这个词在国务院文件中出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当时新兴的经济形态和服务业态，“休闲旅游”成为舒缓压力的途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新东方 1990年，北大教师俞敏洪因“私自办学”受到北大处分；第二年，俞敏洪辞职，在社会上的培训学校打工，出于教学理念的分歧，萌生了自立门户的念头；1993年，俞敏洪创立北京新东方外语学校；1995年，徐小平和王强加盟，与俞敏洪并称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作为九十年代最大的商业化民间外语学校，新东方鼓舞了许多人的出国梦。

小灵通 1996年，浙江余杭电信局的徐福新提出把固定网络和无线电话结合的想法，并就此与UT斯达康公司开展合作，他们还得到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作者叶永烈的授权，使用这个本土色彩的名字来命名产品。1998年1月，小灵通在杭州余杭区开通。作为中国电信在没有移动牌照时期的特殊产物，功耗小、待机时间长的小灵通曾经深受老年用户欢迎。

写真 "写真"是个"先出口再进口"的词语，在汉语中是中国肖像画的统称，在日本语中指代摄影或照片，这个用法随着日本文化的进入，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流行开来。因为一些明星情色写真的误导，起初人们对写真的概念等同于人体摄影，后来逐渐改观，爱美人士纷纷留影。1999年，"拍写真"进入"十大娱乐流行语"。

/ Y /

洋酒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黄霑这句广告词朗朗上口，开启了九十年代中国人对洋酒的想象。1992年6月，轩尼诗XO也打入中国市场。因为价格昂贵，高端洋酒的消费者主要是特权阶级和成功人士。到了九十年代末，红酒、雪茄等更多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越来越普遍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 Z /

专卖店 从品类到品牌，从九十年代初期的"西装专卖""女装专卖"到中后期的"雅戈尔专卖""杉杉专卖"，再从服装到其他行业，专卖店抢占了大街小巷。这是实体商业最风光的时期，人们在与"品牌"的初级对话中，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

直销 在1990年雅芳进入中国几年后，完美和安利也纷纷加入，拉开了直销混战的序幕。许多人梦想着一夜暴富，许多人因此损失不小。直到1998年国家开始对直传销一刀切，才令这个疯狂的行业逐渐冷静。